

话说中国

百年记忆

卷三

主 编 李 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中国政治舞台进入新阶段	(1)
毛泽东从实践中得到锻炼	(9)
各地党的早期领导人	(19)
一大陈独秀当选书记	(37)
国共合作开创国民革命	(46)
孙中山离开广州	(46)
陈炯明由后台跳到前台	(52)
孙中山的“北伐梦”	(63)
陈炯明兵变	(70)
蒋介石在广东起家	(76)
腥风血雨中建立的蒋家王朝	(88)
蒋介石双喜临门：美人与权力	(88)
张作霖被换马已势在必行	(100)
日本人放弃了张作霖，东北问题是个隐患	(104)
国民党三大：蒋家天下陈家党	(109)
蒋介石削藩	(114)
蒋、冯中原大战	(121)

黄埔建军	(129)
南昌起义,打向反动派的第一枪.....	(145)
南昌起义	(145)
南昌起义造就的中共领导人	(150)
蒋介石的认识	(156)
中共和蒋介石各请军事顾问	(161)
五四运动的回忆	(169)
回忆李大钊先生	(180)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政治舞台进入新阶段

陈独秀从北京逃到上海后，上海便成了南方共产主义的中心。

上海当时宣传社会主义影响较大的有三股力量：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二是国民党创办的星期评论社、觉悟社。星期评论社出版《星期评论》原刊，编辑是戴季陶、沈玄庐和李汉俊，撰稿人有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觉悟社出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是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左派邵力子；三是研究系张东荪等人组织的共学社，出版《时事新报》。

三股力量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建立了联系，陈独秀的住所变得热闹起来。经常坐黄包车来的是《国民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邵力子住在法租界，离陈独秀的住所不远。陈独秀在《觉悟》的上发表过文章，与邵力于是“文友”。

住在三益里 17 号的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也是陈独秀家的常客。李书城是老革命党人，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对军阀混战和国民党退让深感失望，与外界往来甚少，整天在家看书，但对陈独秀颇友好。比李书城小 9 岁的李汉俊，12 岁东渡日本留学。他极为聪明，不仅日语讲得很好，而且精通英语、德语、法语。他在日本拜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学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精通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与陈独秀自然是志同道合。

不论是陈独秀、戴季陶，也不论是邵力子、李书城，都曾在日本留学，程度不同地都懂得些马克思的学说。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已成新潮。1919 年 8 月，年仅 19 岁的张闻天，竟在《南京学生联合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文末节录了《共产党宣言》第 2 章的 10 条纲领。然而，《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由于翻译难度大，一直没有人能够完成。

戴季陶是较早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人。他把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带回国内，曾想翻译它，但细细看后，便放下了，翻此书不但要有相当高的中文修养，而且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戴季陶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便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

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一个人，即杭州的陈望道。

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中学毕业后到上海进修英语，准备去欧美留学。但未能去欧美，却去了日本。他在日本

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1919年5月回到杭州，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他常为《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成为邵力子的密友。

陈望道与浙江第一师范语文教师夏丐尊、刘大白等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四大金刚”。戴季陶给陈望道寄去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寄去了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翻译时对照之用。这本英文版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弄来的。陈望道带着这两本《共产党宣言》和《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回到义乌县农村的家里，躲进柴屋，搭起铺板作书桌，又找来一盏油灯，日夜不停地翻译起来。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译完《共产党宣言》寄给戴季陶。这时，他接到《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他到上海担任编辑的信，便提着皮箱来到上海。

《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已交给了李汉俊，由李汉俊和陈独秀校阅译文。陈望道住进了三益里《星期评论》编辑部，即李汉俊的家里。

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了《共产党宣言》，再经陈望道改定，准备发表，这时突然发生意外，《星期评论》被当局查禁而停刊。陈独秀邀请陈望道来渔阳里2号，编辑《新青年》。于是，陈望道便成了陈独秀的助手。

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可能会有麻烦，陈独秀决定出版单行本。初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印了1000册，不胫而走，紧接着又印了1000册。

成立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必然产物。李大钊在用骡车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时，两人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当时只是提出北京由李大钊负责，上海由陈独秀负责。从此，他们两个各自留心，物色人物，创建共产党。

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之后，没有立即回北京，他在天津设法与苏俄友人取得联系。他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南开中学学监姜般若、南开中学学生胡维宪等一起到天津原帝俄租界，会见苏俄友人伯特曼，相互交谈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伯特曼是苏联共产党派来了解中国情况的。由于敌人监视甚严，他们的会见被密探发觉。次日，天津《益世报》上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急忙通知与会者注意防范，随后即搭车返回北京。

李大钊和伯特曼交谈的情况，很快传到了苏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

3月，俄共远东局维金斯基率代表团来华，列宁对代表团下达3项任务：

（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

（3）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妻子），

马马耶夫和妻子马马耶娃以及翻译杨明斋。杨明斋是山东省乎度，他童年入私塾，16岁因家贫而失学务农，不久成了亲，19岁那年，妻子病逝。村里有人去闯俄罗斯，他在苦闷之中，便随人去海参崴。海参崴原本是大清帝国的领土，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从此那里便成了俄国的领地，并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控制东方”。因为那里原是中国领土，居民中有1/3是华人。杨明斋在那里一边做工，一边学习俄语。以后又进西伯利亚做工，并参加俄国工人运动，加入布尔什维克。

十月革命后，杨明斋组织华工参加红军。不久，他被派往海参崴，公开身份是华侨联合会负责人，做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占领之下。1919年秋冬，海参崴被苏联红军占领。

俄共远东地区委员会向俄共中央报告，成立俄共远东局，作为俄共专门负责同远东各国革命者联系的机构。1920年3月，俄共在海参崴成立分局，要求海参崴分局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杨明斋因而被选人代表团。

5位代表成员于4月抵达北京，首先结识了李大钊，经过多次交谈，表示愿意帮助中国成立共产党。李大钊向他们推荐了陈独秀，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

4月的一天，陈独秀在寓所里，正在给李大钊写信商讨有关建党的事，突然妻子高君曼通报道：

“仲甫，有一男一女两位俄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说是

从北京特地来拜访你的。”三位客人一走进门来，那位个子高、鼻子大、卷头发的俄国男人，忙递给陈独秀一封信。陈独秀凭那信封上刚劲有力而熟悉的笔迹，判定这是李大钊的亲笔信。他拆开一看，果然是李大钊的引荐信。顿时，脸上露出了笑容。

杨明斋向独秀介绍说：“维金斯基一行在北京访问，通过在北大任教的两位俄籍教授，结识了李大钊先生，经过多次恳切交谈，他们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所以，维金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及其夫人萨赫雅诺娃留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先生在北方建党，今又介绍维金斯基及其夫人来上海访问陈先生，了解上海建党的情况。”

陈独秀高兴地说：“我同李大钊相约，南北方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你们来访正是求之不得。”

维金斯基说：“希望陈先生在上海，像李先生在北京一样，尽快着手在南方建党。”

陈独秀这次同维金斯基见面，加快了在上海及至南方建党的步伐。接着，他又介绍维金斯基会见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举行多次座谈会，了解中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那时，这批思想激进活跃的知识分子，大都住在法租界，一有人招呼，便聚集在一起，热烈交谈讨论，边谈边讨论，越感到中国有组织共产党的必要。

5月的一天，陈独秀见时机成熟，便秘密召集沈雁冰、

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戴季陶、张东荪等开会。他开宗明义地说：“守常在北京已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们也不能落后。我提议，上海是不是先组织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共产党的建立作好组织准备，你们意见如何？”

众人一致赞同，这也是众人所愿。陈独秀被推选为研究会的负责人。

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历史巨人，一南一北相继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历史的进程中，已成了共产党发起组织的前身。中国共产党的组建，是中国社会矛盾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的自觉要求与行动，因而筹建进程日益加快。到了6月中旬，天气渐热，人心更热，形势需要，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正式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党纲十余条，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

8月的一天，天气酷热，陈独秀渔阳里的寓所门窗却紧闭着，这里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会议。参加发起的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当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众人一致推选陈独秀担任书记，由于他在当时的声誉，决定由他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这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吴延康也参加了，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约李大钊在北京组织，通过国民党人、山东省议会秘书长、曾经销《新青年》的王

乐平，约常去购阅《新青年》的王尽美和邓思铭在济南组织，约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武汉组织除陈独秀派刘伯垂去外，李汉俊也去做了工作。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了一个总部，各地组织是支部。组织名称开始叫“社会党”，陈独秀致函李大钊，询问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李、张商量后明确回答：“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

“好！叫共产党就叫共产党，旗帜鲜明，中国要走俄国革命道路！”陈独秀接到李大钊复信后，高兴地说。

8月底，来上海躲避北京反动势力麻烦的张国焘，在陈独秀家里住了近一个月，由沪返回北京。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 development”，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听了张国杰的转达意见后，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认为上海所拟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从此，南陈北李高举大旗，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共写“开天辟地”的雄文。

在南陈北李两只巨手推动之下，建党工作进展迅速，到了1921年初，除担负临时中央任务的上海发起组外，有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和济南等五个支部，先后相继成立。后不久，北方数省和内蒙地区的党组织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之下，也纷纷建立起来。

陈独秀在筹建共产党时，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但著作的中文译本太缺乏了。为此，1920年初他亲自抓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工作，他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李汉俊翻译了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书。11月，又出版了新青年丛书第一种，即李季译的柯卡普《社会主义史》。这些著作，在社会各阶层的底下秘密流传，到处被人传阅，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对创建中国共产党以及对于共产党员及青年团员确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起了极大的作用。后来，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还谈到当时“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

毛泽东从实践中得到锻炼

1914年至1918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受到新文化运动新思潮的深刻影响，成为一个坚定的激进民主主义者。1918年4月14日，他和志趣相投的朋友蔡和森、肖子升等人发起成立新民学会。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领导了湖南民众的爱国运动。在这段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积极认真的探索。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成立的第一个团体新民学会，在

较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团体。

新民学会的酝酿，“远在民国四五两年”，即 1915 到 1916 年期间。毛泽东、肖子升、蔡和森等志同道合的朋友 15 人左右，围绕人生观、社会历史观进行了 100 多次极其频繁的讨论。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讨论的结果，是把个人的改造和人类的改造，归结为“自己品行要改造，学问要进步”；方法是将“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改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通过“求友互助”达到创造新民和新生活目的。

毛泽东读书期间，湖南督军是张敬尧，张敬尧统治湖南，罪行累累。湖南人把和他的前任督军汤萝铭并称为“汤屠”、“张毒”。他在湘统治期间，刮削湘民膏脂，掠夺土地等，罪大恶极，湖南人民无不切齿痛恨。

1919 年 12 月 2 日，长沙各校数千人焚毁日货，举行游街大会。张敬尧之弟张敬汤，率兵强行驱赶学生，打伤学生多人，逮捕五人，并辱骂学生是土匪，谓“当痛剿”，激起学生的无比愤怒。长沙学生决定罢学，揭起驱张旗帜，宣布：“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时日局丧，誓与偕亡！”

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组织教育界、商界支持学生正义行动。他指派学联骨干分子，赴湖南各地发动罢课，声援长沙学生。他和彭璜等领导新民学会和学联，组成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等地开展请愿活动，揭露张敬尧罪恶行径，掀起声势浩大的驱

张运动。

12月上旬，毛泽东率领赴北京驱张代表团出发。途经武汉，在汉口毛泽东亲自草拟《驱张宣言》，向全国慷慨陈辞，全面揭露张敬尧的罪恶。

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他和各界立即研究驱张办法，决定统一湖南在京各种驱张组织的行动。

为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和扩大驱张运动，“旅京公民毛泽东、张百龄等”，“组织平民通讯社，每日发出稿件百五十余分，送登京、津、沪、汉各报”。毛泽东亲自草拟的平民通讯社稿件15件。

湖南驱张代表团在北京造成浩大声势。北京各界群众及舆论界纷纷支持湖南人民正义行动。毛泽东等代表不畏艰险，为民请命，奔走呼号，呕心沥血，其事迹传颂一时，声名大噪，为各界所认识。

正当驱张运动继续深入之际，军阀之间内讧爆发，吴佩孚的北军从湖南撤防，谭延闿的湖南军乘机进入湖南。6月11日，张敬尧由长沙败走岳州，6月26日又退出岳州。接着张敬尧被北洋政府宣布撤职查办。9月11日，其弟张敬汤在湖南被高等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至此，湖南驱张运动告一段落。

驱张运动是一次和平请愿活动，并没有超越毛泽东过去主张的“温和革命”、“无血革命”和“呼声革命”的范围，它的最后胜利，显然也不是“呼声革命”的胜利，而

是军阀内讧之使然。但是，驱张运动对于毛泽东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却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新民学会会员对毛泽东和蔡和森有一个比较，毛泽东是一个实践家，蔡和森是一个理论家。说毛泽东是一个实践家，并不是说他轻视理论，只知实践。而是说，他获得了某种理论便总要拿去实践。毛泽东对理论的热心，并不亚于蔡和森。他总是以探索真理为依归，对理论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这一时期也是他在理论上“脱毛”的时期。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蔡元培、李石曾等便发起留法勤工俭学活动。1918年6月下旬，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等在第一师范附小开会，集中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一致认为湖南政局极乱，教育摧残殆尽，几无学可求，“对于留法运动认为必要，应尽力进行”。会后，蔡和森于6月23日离开长沙，25日到达北京，具体联系留法勤工俭学事宜。他具体与蔡元培、李石曾接洽，又与湖南籍名流章士钊、熊希龄接洽，请其设法支持。8月19日，毛泽东等25人也到达北京。1919年11月25日，蔡和森同母亲及向警予、蔡畅等乘船赴巴黎。毛泽东决定暂不出国，留在国内对国情作调查研究。

中共和国民党早期的领导人，如蒋介石、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曾出国留洋。中共早期还有一批领导人则是到俄国学习。在这种大环境下的毛泽东，却独独一人留在中国，土生土长，这对他后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1920年2月2日，蔡和森抵达巴黎。随后住到近郊的

蒙达尔尼公学。因水土不服，上吐下泻。他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决定不上课，“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啖看报章杂志为事”。每天看《人道报》、《共产党人刊》、《俄事评论》等，共产主义知识大增猛进。5月28日，他从巴黎给长沙的毛泽东发出第一封信，开始了“巴黎——长沙”的共产主义思想讨论和建党问题的讨论。

蔡和森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被毛泽东标以“研究社会主义”的！小标题，收入《新民学会通讯集》第三集，作为首封刊出。毛泽东在本集提要中注明：“这一集以讨论‘共产主义’和‘会务’为两个重要点。信的封数不多，而颇有精义。”

在信中，蔡和森告诉毛泽东他在法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打算：“我在法大约顿五年，开首一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一面将社会，工团，无政府，德漠格拉西（基尔特社会主义，即纵〔综〕合此四者而成一调和，近德国多数社会党，显然立足于二个主义之上（社会主义与德漠克拉西），以与中产阶级联盟，加番研究。”其时，蔡和森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情况，还缺乏明晰的了解，他把弄清这一问题作为第一要务。这与毛泽东当时对于种种主义，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吸取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的情况和想法大致相同。

不过，蔡和森和毛泽东的条件毕竟大不相同。法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思潮云涌的地方，蔡和森以勇猛精进的精神，短时间便收集了上百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和小册子，并且择其急需者“猛看猛译”。

7月5日，新民学会在法会员13人，齐集蒙达尔尼公学，6日至10日召开了五天会。一些外省的工学励进会会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由于蔡和森的多方努力，全体会员一致同意改变学会成立时确定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一致造成把“改造中国与世界”确定为学会的根本方针。但是，多数会员对蔡和森提出立即建立共产党，走俄式革命道路还难以接受。

毛泽东这时的思想大致和在法多数会员的思想相同。他在北京阅读了不少有关介绍共产主义的书报杂志，在上海又和陈独秀进行了关于共产主义的谈话，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像俄国那样“彻底的总革命”，他也赞成，但认为现在实行还“不行”。他的思想发展还稍落于蔡和森。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再次与毛泽东通信，交换他对共产主义和建党的认识。蔡和森在这封信中详细谈了对一系列关系革命成败的根本指导思想。

1920年9月中旬，肖子升启程回国。16日，蔡和森再与毛泽东一封信，着重谈在国内建党问题，托肖子升带

回，毛泽东于12月底从肖子升处得到这封信。信中，蔡和森着重介绍了俄国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社会党的情形，并着重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以及如何在中国建党的具体步骤。

蔡和森强调，搞俄国式的革命，就要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启发工人，坚持政治与经济结合，把工人经济运动提高到政治斗争的水平。

关于在中国具体建党的步骤，蔡和森提出：

（1）物色赞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俄国革命的同志“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

（2）普遍联络全国各地，发起“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政治斗争，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检查条例；

（3）严格物色和发展可靠的党员，使他们分布于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从事秘密工作；

（4）出版一种机关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凡一切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相矛盾的东西一概不登。

在以上各项工作就绪的情况下，便可以成立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收到蔡和森上述信时，已经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俄国道路的信心，虽在毛泽东并不是因为受到这封信的促进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但这封信的内容确使毛泽东再次受到鼓舞，更加坚信自己的正确选择。

毛泽东和蔡和森的通信，表现出他已经具有共产主义信仰。毛、蔡的“巴黎——长沙通信”，其根本意义不是

蔡和森促使了毛泽东政治立场的转变，而是通过通信使毛、蔡对未来的中国革命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和具体问题，都有了一致的认识。这就为他们揭开中国革命的新篇章作了思想准备。

毛泽东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促使他强烈地要求把新民学会改造成一个革命的团体。他力图按照蔡和森在蒙达尔尼会议上所做的那样，把长沙的新民学会也来一番彻底地改造，使之革命化。1921年1月1日，大雪满城，寒光绚烂，景象簇新，新民学会会员在朝宗街文化书社举行会议，何叔衡主席。

1月1—3日的讨论，经过激烈的辩论和毛泽东、何叔衡、彭磷等人的细致工作及大量的分析说服，达到了预期目的。

至此，新民学会长沙本部，在学会宗旨、实现宗旨的根本办法和具体办法等方面发生了根本转变。学会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从组织上着手建党建团，以注重发动和组织劳农为工作重点。在五四时期的社团中，没有其他任何社团，经历了这样一个完整的转变，许多社团或是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原地踏步，最终统一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这还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这是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自己的坚定信仰和大量细致的工作分不开的。毛泽东从组织一个学会的工作中，学到了组织和领导一个党的经验。

早在1920年6月，陈独秀在上海谋划成立中国共产

党时，长沙是筹备组织的计划地点。那时，毛泽东也在上海，他和陈独秀关于共产主义信仰问题，有过很热烈的谈话。在毛泽东回湖南之后，陈独秀也很快写信委托毛泽东从事建党工作，当时陈独秀与毛泽东有密切的书信联系。据张国森回忆：“湖南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1920年11月间成立的。”“那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组成”，“他之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令鼓励。”武汉筹备小组成员包惠僧也回忆，长沙小组成立的时间与武汉小组大致相同，也就是在九十月间。毛泽东为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与当时湖北小组的包惠僧有书信联系。肖子升1921年3月回到长沙后，发现“1920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这个小组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等。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开展了许多工作。

毛泽东不仅在第一师范物色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而且还尽量把新民学会中的优秀分子都吸收到青年团里。据肖子升回忆，他1921年3月初到长沙见到毛泽东时，“他是第一师范附小的主事，但他大多数活动是秘密地指挥共青团的组织”。新民学会的很多成员都成了共青团的团员，“共青团的诞生使原来的新民学会走到了尽头”。肖子升不赞成这种作法，他希望新民学会仍能成为一个实行无政府主张的团体。毛泽东的朋友、新民学会会员陈昌尖锐地批评肖子升说：“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已秘密

成为共青团的成员了，把他们拉回来是很难的。你知道，新民学会的目的是用一种抽象的方法改造中国，它既无政治观点又无固定的行动计划。他们现在认为，要达到实际效果只有一条出路，就是遵循俄国的榜样，努力宣传列宁的学说。”毛泽东也直截了当地向肖子升指出：“很多人都不满现状，如果我们要进行改造，就必须来场革命！如果我们要革命成功，上策便是俄国！列宁的共产主义是最适合我们的制度，而且是取容易学习的。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

经过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组成的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艰苦努力，湖南建党工作和各方面的工作开展得生气勃勃，很有特色。在党的“一大”会议上，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得到肯定。据李达回忆，在“一大”开会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经验。当时党的工作，很注意宣传与工人运动两项……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

经过秘密筹备，在中国建党的时机已经成熟。1921年6月中旬，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和尼可洛夫到上海，建议中共筹备组织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共成立。随后，由上海党组织书记李达发信给各地党组织，各派二人到上海开会。长沙方面通知了毛泽东和何叔衡。

6月29日下午，毛泽东、何叔衡从长沙动身赴沪参加中共“一大”，同行的有肖子升。肖子升顺路去武汉，他

并不知道毛泽东、何叔衡去上海干什么。据谢觉哉 1921 年 6 月 29 日日记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借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谢觉哉 1952 年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到今天恰恰是三十一周年。”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回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

各地党的早期领导人

维金斯基和代表团成员先是住在上海大东旅社，为了便于联系，便迁往法租界霞飞路 716 号，又在英租界爱华德路挂出了俄国《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

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首先吓跑了张东荪。张是研究系的首领之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术”进行研究，而要他参加共产党，便是介入了政治活动，那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研究系是“不过问政治”而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

张东荪退出后，便有俞秀松、施存统等参加。俞秀松

和施存统都是浙江第一师范在校生，即陈望道的门生，他们和其他同学一起，在五四运动后创办了《浙江新潮》，主编是俞秀松。

这个刊物刚出版两期便被警察查封。

俞秀松在《浙江新潮》被查禁后，于1919年底到北京大学，见到陈独秀，经陈独秀介绍，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在北大哲学系旁听。1920年3月27日，他离京回沪，找到了老师沈玄庐，便留在《星期评论》社工作。这时施存统也来到上海。

在讨论起草党纲时，决定由戴季陶起草。戴很快动手写好纲领草案，交给陈独秀，由陈独秀拿给大家讨论。这时戴季陶宣布退出，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我不能加入别党。”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主要干部，孙中山需要戴季陶协助他工作，反对戴季陶参加组织共产党。戴季陶离去时声言：“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

戴季陶从新渔阳里6号搬走了，杨明斋租下了这所房子，搬了进来，这里便成了维金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

不久，座谈会又增加了一员，即从日本归来的李达。

李达，号鹤鸣，是湖南零陵县一产佃农的儿子，在1913年考取湖南留日自费生，去日本学理工科。他在留日学生中，是留学生救国领袖人物之一，曾在1918年5月率100多人回国抵达北京，并与北京大学学生一起向政府示

威请愿。

这次请愿没有取得多大效果。李达回到日本之后，便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他译出数十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计有：《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常学说》、《社会问题总览》。他成了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理论有较深了解的人物。

李达回国后同陈独秀见过一次面，陈独秀便邀请他搬到他那里去，帮助他编辑《新青年》。

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有些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发起活动之后，不久便离开上海。周佛海、施存统先后去日本继续留学；陈公培和赵世炎先后到了法国求学，李季稍后又去了欧洲，刘伯垂到了武汉，林伯渠、袁振英、沈玄庐到了广州。这些人到各地后，大都成为各地党组织的发起人。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立即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陈独秀、沈玄庐、施存统、袁振英、金家风、叶天底等人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聚会。维金斯基作为苏共（布）远东局代表、杨明斋作翻译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指定21岁的俞秀松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俞秀松、杨明斋、袁振英首先在外国语学社的先进青年中发展青年团员，他们吸收了刘少奇、罗亦农、任弼

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习、许之桢、傅大庆、柯庆施、周兆秋、梁柏台、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廖化平等人为团员。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开展了各种活动，积极指导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上海党组织决定把《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9月1日，《新青年》便以崭新的面目，公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李大钊发表了《俄罗斯革命之过去及现在》，李汉俊、杨明斋、袁振英、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等人都发表了有关俄国革命理论和实际情况的译文，如列宁小传及其若干著作的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等。新青年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批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的著作。

11月7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创办了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主编是李达。陈独秀为《共产党》创刊号写了《短言》，作为发刊词。《共产党》月刊发行量达5000份，通过各种渠道撒向全国，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20年暑假，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举办了外国语学社，目的是培养干部。社址设在渔阳里6号，社长杨明斋，秘书俞秀松；俄文教员是杨明斋、库兹涅佐娃，以及王元龄，王是张作霖驻莫斯科公使李家骥的外甥女，思想十分进步；日文教员是李达，法文教员是李汉俊，英文教员是

袁振英。有时陈独秀也去讲课。

学员大都是各地革命团体选送来的，也有些青年因受新思潮影响，自己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投奔陈独秀或《觉悟》副刊邵力子，被送进外国语学社学习的。

学员少时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这些学员毕业之后，一部分人被送往苏联学习。不少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如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任作民、柯庆施、罗亦农、肖劲光等。

陈独秀在南方上海，在维金斯基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十分红火；而李大钊在北方的北京第一个热烈响应，这便是“南陈北李”携手建党。

最初，北京的共产党员只有李大钊和张申府两人。

9月间，张申府因迎接罗素而来到上海，住在陈独秀的家中。他们对建党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把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由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张申府从上海回到北京后，立即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李大钊。李大钊决定立即发展党员。这时，女学生刘清扬同张国焘去南洋募捐刚回北京，李大钊和张申府把她找到北大图书馆主任室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但刘清扬说，她要出国留学，不想立即参加。于是便吸收了张国焘入党。这样，便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即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

10月，张申府离开北京，前往法国里昂大学教书，北京党组织由3人变成了2人。李大钊便做黄凌霜的工作，黄是北大学生、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革命。于是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王竟林等6人加入了北京小组。

紧接着，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了北京小组，扩大为10小组。罗章龙和刘仁静都是北大学生。罗章龙来自湖南，刘仁静来自湖北，他们又是李大钊领导的北大马克思研究会的成员。

6名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等人不久便发生分歧，11月间退出北京小组，他们主编的《劳动者》周刊由罗章龙等人接办。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组织之后，又有一批先进分子加入北京党组织，他们是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纓伯英、张太雷、宋介等。除纓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宋介是北京中国大学学生外，其他人都是北大学生。

11月底，北京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陈独秀在1920年秋让共产党员刘伯垂回湖北，找董必武和张国恩联系，在那里建立共产党组织。

刘伯垂是湖北鄂城县人，在清末年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科。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是同盟会老会

员，曾在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陈独秀在日本与他结识，友情颇笃。刘伯垂从广州回湖北途经上海时，被陈独秀发展为共产党员。

刘伯垂带着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文件回到武汉，约董必武、张国恩在武汉关附近的一家小茶馆见面，转达陈独秀的意见。

董必武，湖北黄安县人。他17岁那年考中秀才，28岁东渡日本，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在那里加入同盟会，见到孙中山。

董必武从日本回国后，即开始革命活动，1918年3月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秘书。次年春天，蔡济民突遭靖国军唐克明部枪杀。董必武逃往上海，向孙中山报告事件经过。

此时，湖北省善后公会在上海成立，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路南租了一处房子作会址，并邀董必武、张国恩主持会务。董必武、张国恩便在这所房子内住下。

张国恩（又名张眉宜）是董必武的同乡好友，和董必武一起赴日留学，一起加入同盟会，一起从鄂西来到上海。董必武结识了同在渔阳里居住的李汉俊。他们一见如故，谈马克思主义，谈列宁，谈十月革命，谈社会主义，董必武从此也读起马克思主义著作来，并转向社会主义。

1919年，董必武和张国恩回到武汉，准备办报，因资金困难未成。董必武遂利用湖北教育会的旧址，办起了武汉中学。武汉中学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人

才的地方。

张国恩回武汉后，担任了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学监，他以前曾在该校当过教师。张有律师资格，又在武昌抚院街开了律师事务所。

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都曾在日本留学，均为同盟会会员。他们在茶馆相会后，便着手建立党组织。

董必武、张国恩在当年夏天曾接到李汉俊来信，希望武汉建立共产党小组。两个建立小组，人数太少，董必武便介绍了陈潭秋，张国恩介绍了包惠僧。

陈潭秋曾积极支持董必武创办武汉中学，并被董聘为英语教师，担任第一届乙班班主任，是董必武的密友。

陈潭秋是湖北克冈县人，祖父是清朝举人，16岁考入湖北第一中学，毕业后又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英语部，1919年毕业后，他通过同班同学倪则天的介绍，认识了董必武，倪是董的同乡。

包惠僧也是湖北黄冈县人，湖北第一师范毕业生，是张国恩的学生。他在1917年从湖北第一师范毕业之后，在武昌教了半年书，便失业了，于是他改行担任了《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的外勤记者，四处活动，到过上海、广州、北京。陈独秀在1920年到武汉讲学，包惠僧作为记者向陈独秀进行采访，作过一些交谈，因而相识。

刘伯垂在武昌抚院街张国恩律师事务所主持召开第一次会议、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等人参加。他

们首先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党纲草案。接着刘伯垂介绍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研究了武汉建立党组织后的活动计划，最后，刘伯垂提议推选包惠僧担任武汉共产党支部书记，众人表示同意。会议决定了张国恩负责管理财务，陈潭秋负责组织。

刘伯垂有律师资格，他为了掩护党的秘密活动，索性在“老虎口”下——湖北警察厅背后的武昌多公祠5号，设立党的机关，挂起了“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

武汉共产党支部成立不久，便发展了湖北一师学生赵子健、失业工人赵子俊、进步教员刘子通和黄负生等人入党。

张国恩由于忙碌于律师工作，且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兴趣，在党组织成立3个月后退出了。

1921年春，包惠僧带头几名青年团员离开武汉去上海，准备去苏俄留学，后因海路中断，加之经费困难，未能成行。包惠僧就留在上海，参与上海党组织的工作，他在离开武汉时，党的工作由陈潭秋负责。陈潭秋、董必武等在武汉教职员和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并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在武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还有恽代英，他从五四运动直到武汉党支部成立，一直是武汉地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领袖。他发起组织了“互助社”等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1920年初又在武昌横街创办了著名的利群书社，该社致力于介绍新文化，出版进步书

报杂志，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利群书社的工作人员实行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对中华大学学生有很大影响。

恽代英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不少文章。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李汉俊、袁振英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马耶夫都曾先后到过利群书社，想同恽代英以及利群书社成员林育南、项英（项德隆）、李书渠、李求实、卢斌、施洋等，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使他们早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武汉党支部的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等，也曾同恽代英交换过意见。1921年夏，利群书社召开大会，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布尔什维克式的党，组织共存社。1921年冬至1922年春，恽代英、林育南、卢斌、项英、李求实大多数成员加入了共产党。

山东济南最早传播新文化的是山东省议员、中华革命党人王乐平。王乐平是山东政界和文化界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与陈独秀相识，彼此保持密切的联系，陈独秀在上海建立共产党发起组后，致函王东平，约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

王东平虽然赞成社会主义，却不愿加入共产党，他把在山东建立共产党的任务让给他的乡亲、同乡王尽美。

1920年9月，王尽美在济南教育会成立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者最初10人，后来发展到50余人。山东省一中学生邓恩铭、育英中学的国文教师王翔千都是积极分子。

邓恩铭是贵州荔波县人，是水族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医生。他6岁进私塾，10岁入荔泉书院，16岁离开贵州来到济南。他从西南来到山东，依仗叔父的帮助。这样，邓恩铭于1917年10月来到济南，进一中学习。五四运动中，邓恩铭被推选为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与一师学生领袖王尽美结识。

王翔千比王尽美大10岁，是山东诸城人，是王尽美的远亲，因而相识。

王尽美、邓恩铭等又组织了励新学会。这是一个学术团体，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宗旨，主要活动是发行报刊杂志，举办学术讲坛活动，并以《励新》半月刊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会员发展到60余人。

王尽美、邓恩铭时常去北京，向李大钊请教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建立共产主义的组织。

1920年冬，李大钊派人来济南帮助王尽美、邓恩铭建立共产党组织。次年初，济南共产党小组秘密成立，王尽美、邓恩铭吸收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励新学会的进步分子参加。最初的党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象午、王复元、王用章、贾甫等。

广东是新思潮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广州引起了强烈反响。1919年春，一个叫郑苍生的人在广州建立了“共和工党”，出版《共和工党》月刊，虽然这个组织在1921年秋停止了活动，但其主要成员后来参加了广东党的早期活动，有些人加入

了共产党。

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州组织了学联和进步团社，出版进步书刊，涌现出一些群众领袖，如彭湃、杨匏安、刘尔崧、阮啸仙、周其鉴等。杨匏安是最早在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

1920年10月，北京大学毕业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3人，从北京经上海回到广州，他们都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学生。

陈公博的父亲陈致美曾任广西提督，因参加反清活动于1907年被捕入狱，辛亥革命后任省议会议员、都督府军事顾问。陈公博从小受到文武两方面的训练，擅长写作、武术、骑马，身强力壮。他从15岁起学习英语，在父亲入狱后，他靠当家庭英语教师糊口。父亲担任省议会议员时，陈公博刚刚20岁，居然当上了县议会议长，同父亲一荣俱荣。但是，父亲要求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儿子去求学，他便在父亲去世后担任两年教员，于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同陈公博在北大同一宿舍的广东老乡谭平山，比陈公博年长4岁，俩人同一年进入北京大学。谭平山看上去比较老练，且具有名士风度，充满浪漫气息。

谭植棠是谭平山的族侄，比谭平山小7岁。他朴实无华，忠诚待人，也是1917年考进北京大学的。

这3人回到广州后，便和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等

取得联系，创办了广东《群报》，并把《群报》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在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 3 人回广州的十几天以前，有两个俄国人来到广州，一个叫米涅尔，一个叫别斯林。他们以苏联政府代表的名义，在广州设立了罗斯塔（塔斯社前身）分社。他们到广州前，先到北京大学找李大钊，通过李大钊又认识了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黄凌霜带他们到广州来，介绍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黄鹂声、区声白、刘石心、梁一余、梁雨川、谭祖荫 7 人与他们见面，俄国人同他们交谈了几次，他们欢迎俄国人帮助他们搞革命活动，于是，他们创办了《劳动者》周刊，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并且建立了广东共产党组织。

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没有参加由 7 个无政府主义者和两个俄国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共产党，他们认为：这个广东共产党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

1920 年，广州好戏连台。粤军攻克广州，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国民政府，担任省长的陈炯明于 11 月写信给陈独秀，邀请去广州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陈独秀接到邀请之后，写信给李大钊商量是否去广州的问题。李大钊认为，领导广州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

（1）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

去；

(2) 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

陈独秀对广东寄有较大希望，认为广东有革命的光荣传统，很想去那里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一面从事教育改革。于是，他向陈炯明提出广州任职的 3 项条件：

(1) 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

(2) 以广东全省财政收入的 1/10 拨充教育经费；

(3) 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

陈炯明答应陈独秀的条件，并电促他来粤。陈独秀离开上海之前，把上海发起组书记职务交给李汉俊代理，于 12 月 17 日乘船去广州，同行的有袁振英、李季等人。

12 月 25 日，陈独秀等抵达广州。他首先和米涅尔、别斯林取得联系，接着同梁冰弦、区声白等 7 位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开会，研究党组织问题。陈独秀在会上把他起草的一份党纲拿出来讨论，7 位无政府主义者见内有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表示不愿接受。虽经陈独秀再三说明，他们仍然反对。于是陈独秀提出：大家主义不同，终究是要分开的，联合起来，会因活动手段、策略不同，引起争论，不如现在就分开，各走各的路好。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共产党，北京、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相继退出了共产党组织。

已在广州的 3 位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在陈独秀出现在大东酒店时，便赶来欢迎。陈独秀对他们办的

《群报》很是称赞，要他们不尚空谈，切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踏实的工作，并和他们商谈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经过几次酝酿，在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不久，他们重新建立了广东共产党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

陈独秀不久定居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他在门口贴着上书“看云楼”的白纸。陈独秀在“看云楼”安营扎寨，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推荐谭平山任副委员长，委托陈公博办宣传员养成所，培养革命骨干。宣传员养成所不久改为宣传员学校，陈公博任校长，谭植棠任教导主任，是一所培养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理论知识，向广大工农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校。

广州党组织的成员除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外，从上海来到广州的原上海发起组成员沈玄庐、李季、袁振英等也参加了广州支部的活动。1921年5月，李达、李汉俊派包惠僧到广州，要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包惠僧也暂时留在广州，参加支部的活动。

在留洋学生中，除参加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成立日本小组外，张申府在留法学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从1919年春到1920年底，中国有1600余名青年涌入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中间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向警予、李维汉、刘清扬、周恩来、陈公培、赵世炎、王若飞、李立三、徐特立、陈毅、聂荣臻、邓小平、

傅钟、萧三、陈延年、陈乔年等等。

张申府在 1920 年秋加入北京支部后，同蔡元培一起来到法国。张应里昂中法大学的聘请担任逻辑学教授。

张申府在法国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并结为夫妻。张申府、刘清扬发展了法国留学的周恩来入党。

1921 年春，有两名青年手持陈独秀的介绍信找到张申府，参加巴黎小组的活动。他们是赵世炎和陈公培。这两位留学生分别在 1920 年 5 月和 7 月由北京经上海赴法国，他们在上海与陈独秀会面，经陈独秀介绍入党。这样一来，巴黎小组便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 5 人小组，张申府是小组负责人。

既然上海、北京、广州、政治、长沙、济南，以及旅日留学生、旅欧留学生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臻成熟。1921 年 2 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这份党章由广州寄给李汉俊，李看后甚为不满，认为陈独秀要在党内搞个人独裁，他也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使中央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并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看后，大发雷霆。他们两人本来就有分歧，现在的关系更加恶化。但陈独秀的威信远在李之上，李无法与陈抗衡，于是不愿再担任代理书记，把党的工作交给了李达，李达便成了上海党组织的代理书记。

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极为关切，1920 年 8 月，根据列宁的推荐，共产国际

委任马林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于1921年3月从莫斯科动身，取道欧洲赴上海，当年6月3日到达上海。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可尔斯基也来到上海。此时维金斯基已回俄国。

马林、尼可尔斯基立即同李达、李汉俊接头。二李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马林会讲英语。他们通过交谈，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决定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来上海开会。马林拿出带来的经费，寄给每位代表路费100元，回去时再给50元。

李达分别与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同意后，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学生中的党组织或党员，通知他们各派2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至于法国留学生的党组织，因路途遥远，已经来不及，故未通知。

北京党组织接到通知后，立即开会讨论谁去上海的问题。李大钊是当然代表，但他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北大教授，又是北京8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时值学年终结，公务繁忙，不能亲自去上海。会议推选张国杰、刘仁静为代表。李大钊指定张国焘参与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因此，张国焘会后便动身南下。

张国焘途经济南时停留一天，约王尽美、邓恩铭等济南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确定王尽美、邓恩铭为济南党组织代表。

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

李达、李汉俊在5月中旬派包惠僧去广州。包惠僧当时已无固定职业，陈独秀就通过友人把他介绍到报馆工作。陈独秀接到上海来信要他本人和2名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陈独秀召集广州党员在谭植棠家开会。陈在会上说：“第一，我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我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我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人都忙，离不开。”

陈公博很想去上海，他当时有点中暑，很想转地疗养；他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此机会去办个手续；再者，他去年和李励庄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又是其他人的老师，他讲的话，众人都同意了。于是，陈公博便偕妻子由广州出发，经香港转赴上海。包惠僧则从广州乘海轮直赴上海。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党员代表周佛海，于7月中旬到达上海。

上海党组的代表是李达、李汉俊。

一大陈独秀当选书记

各地代表于7月23日前都来到了上海。因上海负有发起之责，又是开会所在地，所以，李达、李汉俊承担了会议的联络、筹备和会务工作。

李达交代他的妻子王会悟安排代表住宿的地方。王会悟在上海女界活动中，结识了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校长黄兆兰。因博文女校离开会地址较近，行动方便，博大女校师生因暑假均已离校，代表住在那里便于保密。王会悟就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向黄兆兰租借了房间。外地代表除陈公博夫妇住在大东旅社外，均住进了博文女校。代表们住在陈设简单的房间，有的房间内有简易板床，有的没有床铺，便在地板上铺了草席。他们寄宿在这简朴而清静的校舍内，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

中共“一大”会议的地址选择在李书城的公馆里。李书城与李汉俊兄弟已由三益里”号迁往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106、108号，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106、108号内部打通，共用106号斜度较大的大楼梯。上楼之后，便是李汉俊的房间，朝西走，则是李书城的卧室。李书城此时在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会场设在楼下客堂中间。

1921年7月23日晚8时，出席会议的代表三三两两

来到会场，他们是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广东代表包惠僧、陈公博，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共 13 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年龄最大的何叔衡 45 岁，其次是马林 38 岁，董必武 35 岁，李汉俊、陈公博、李达 31 岁，毛泽东 28 岁，包惠僧 27 岁，陈潭秋 25 岁，周佛海、张国焘 24 岁，王尽美、尼可尔斯基 23 岁，邓恩铭 20 岁，刘仁静 19 岁。

代表们围坐在一张长形餐桌的四周。

因陈独秀、李大钊未能出席会议，李达、李汉俊虽然做了会议准备，但他们都不喜欢交往，是学者型的人物，不轻易附和别人，爱坦率地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喜怒形于色。他们与马林之间关系不太融洽。马林毫不客气地要他们报告工作情况，又要他们的工作计划和预算。他们便坦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未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实际情况自由支配。二李与李林差一点吵了起来。

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 7 岁，但显得圆滑，他既与马林谈得来，又与二李亲密，他成了马林与二李间的协调人。虽然二李为中共“一大”，做了筹备工作，张国焘来后，反客为主，筹备工作便落到他的手里，他被推选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周佛海为记录。

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和会议的议程，提出应讨论的具体问题。接着马林、尼可尔斯基热情地致词，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

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工作情况，并交流了经验，讨论和起草党的纲领，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讨论党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的方针、任务和方法，制定工作计划。

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会议选出的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委员会委员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利用这两天时间起草会议文件。

7月27日至29日，集中讨论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文件草案。7月30日晚，继续举行会议，但不料发生了意外事件。

7月30日晚上的会议刚刚开始，一个身穿灰色中长衫的中年男子，从那扇虚掩的后门，突然闯入会场，朝着室内的人环视一周。众人对这个陌生人的闯入，感到诧异。

房主李汉俊问这个不速之客：“你找谁？”

“我找社联王主席。”那人答道。

附近有一个“社联”，但那个组织没有人姓王，也不设主席。李汉俊颇警觉：“这不是社联，社联也没有什么王主席。”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哈了哈腰，然后匆匆退了出去。

马林具有秘密工作的经验，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

“这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马林用手猛击桌子，桌子“砰”的一声。马林站起来果断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立即站了起来，纷纷离开。房子里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他们两个上楼，在李汉俊的书房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的神经过敏，还是真有包打听的密探作祟。

十几分钟以后，果然有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兵、三个翻译进入室内。侦探和法国兵横眉怒目，像是马上要拿人的样子。先将李汉俊、陈公博监视起来，接着翻箱倒柜地搜查，足足骚扰了两个钟头。只是查到一些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抽屉内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字迹模糊，又涂改得很乱，未引起他们的注意。

代表们离开会场之后，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便穿过小巷，来到渔阳里2号，那是陈独秀的住所，现在住着李达夫妇和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他们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见外面没有异常动静，牵挂着李公馆究竟如何，包惠僧自告奋勇前去打探。

包惠僧来到李公馆，李汉俊、陈公博简要地向他介绍了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包惠僧临走时，李汉俊要他多转几个圈子再回去。

包惠僧返回渔阳里2号，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李达提出：“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离开上海，躲开法

国巡捕。”

众人赞同。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智果寺去开会，他曾在那住过，愿作向导。但众人觉得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李达的妻子王会悟道：“我有一个主意：我是浙江桐乡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不多，湖上有游船可以租，而且距离较近。到南湖开会比去杭州更为适宜。”

众人称善。当即决定，会议不应拖延，要抓紧进行，明天就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当晚，王会悟去上海车站，了解次日开往嘉兴的客车班次与时刻。

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因为过于引人注目，不便去嘉兴，李汉俊因受到监视，也就留在上海。陈公博先在李汉俊寓所受了一场虚惊，从那里出来时又有暗探跟踪，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尾巴”丢掉，回到大东旅社睡下，次日黎明，就在他的房间隔壁发生了一起骇人的凶杀案，把他夫妇吓得魂不附体。

一夜之间两次受惊，吓得陈公博不敢再在上海停留，31日晚即与妻子一起乘车去杭州。所以，陈公博也未出席南湖会议。

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了嘉兴车站。王会悟在南湖附近的鸳鸯旅馆，为代表们开了房间。准备工作就绪后，王会悟领着众人来到湖畔，通过摆渡的小舢板，登上了事先租好的画舫。

11时许，下起了小雨，游人渐渐散去，湖面上更为清

静。会议开始了，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纲领和决议、党的成立宣言，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党的纲领和决议，已在前几次会议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因而获得一致通过。在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时，对南北政府的看法有分歧和争论，便决定把成立宣言交即将组成的中央局处理。

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众人认为，全国党员人数不过 50 人，各地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总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陈独秀未出席会议而被选为总书记，一则因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并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起了主导作用，享有很高的声望；二则列宁要马林向中国共产党传达他的意见：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

下午 6 时左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当晚，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

中共“一大”闭幕以后，马林多次提出要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沪任总书记，又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请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陈独秀在广州还同汪精卫、戴季陶等人一起兼任政务员职务。他南来广州，目的是推进广东革命事业，现在需

要他回上海，他立即致函陈炯明要求辞去职务。陈炯明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并劝陈独秀：“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

陈独秀辞职不获，只得借口医治胃病请假离粤。

9月中旬，陈独秀回到上海，仍住在渔阳里2号。

陈独秀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马林见面会谈，他们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争论，马林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制定。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必要国际的经济援助。因此，谈了几次都谈不成。

陈独秀认为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³人，别无工作人员。³人聚会常在陈独秀的住所楼下的客堂间或统厢房里。他们商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独秀自己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15种共产主义读物。

10月4日下午4时许，有3位“白相人”突然从陈独秀的前门闯了进来。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加以阻拦，那3人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

陈独秀从楼上下来，见此情形甚是惊疑，想从后门出去，但见后门已有人把守，无法脱身。不一会，来了两部汽车，随车来的巡捕把陈独秀、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共 5 人逮捕，《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

李达为了营救陈独秀，通报各地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并电请孙中山先生设法营救。孙中山打了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各大报纷纷登载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10 月 9 日，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也被假释出来。

马林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10 月 19 日，法庭判决：陈独秀获释。26 日，法庭结案：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 100 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等出狱以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 5 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这才顺利结案。马林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共患难、使陈独秀这位很重感情的人，顿时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以前的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解决，从此，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

1921 年底，蔡和森、李立三从法国回到上海，立即被批准吸收为党员。陈独秀留蔡和森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南从事工作。

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过程中，中共早期的领导

人集团便诞生了。在此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有的人沉了下去，又有新的人浮了上来，但是他们中的中坚力量，如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董必武等，一直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坎坷进程，并成为开创新国家的一代伟人。

国共合作开创国民革命

孙中山离开广州

广州军政府成立不久，政学系头子岑春煊就极力鼓吹成立西南各省联合会。孙中山鉴于军政府无法行使职权，也一度赞成通过设一机构，以便“联西南各省为一大团体”，但这个机构仅是作为军事联合机关，隶属于军政府之下的。孙中山的想法当然与西南军阀的想法不同，自然不会为他们所接受。后来经过西南军阀谋士们的“推敲”，使拟成立的联合会只是“隐然与军政府取对峙之势”。1918年1月15日，在广东督署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并议定由岑春煊担任议和总代表。很显然，这是拆孙中山和军政府的台，而且公然主张南北妥协，抛弃武装护法事业。孙中山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坚持联合会只能隶属于军政府，否则，就“不能赞同”。以联合会取代军政府的企图，终因孙中山及各方人士的反对和滇、桂军间内部后来意见分歧而未得逞。

1918年2月，冯国璋在北洋主战各督的压力下，下令

对南方护法各省进行“讨伐”。3月初，北洋军又向湖南进攻。孙中山于3月9日发生《鼓励义军作战电》，指出北洋军“今复启衅岳州，以重兵相陵，和平已属绝望”，希望义军将士“本厥初志，一致进讨，务完成护法之天职”。原由李根源统率的驻粤滇军，这时由李烈钧统帅，准备出师北伐，但桂系军阀却在军饷上卡滇军的脖子，拖延不给，这支滇军因粮饷军火不继，只好按兵不动。

到此时，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和护法运动，已经越来越存在问题了，他呼吁的北伐，更是曲高而和寡了。“湘、桂义师，终形单薄”，岳州、长沙，相继陷于北军之手。到4月，孙中山义愤填膺地指出，这完全是“误于议和之说”，“主张议和之人，实难辞误国之责”。

就是在北军再次向南方发动进攻的1918年2月到3月的这一危急时刻，当孙中山还在为北伐而竭尽全力之时，桂、滇系军阀、政学系政客、国民党中的不坚定分子却公开合流，加快了反对孙中山的步伐。他们频频密议，要求改组军政府，改大元帅制为合议制，实际上就是要取消孙中山对护法运动的领导，通过军阀、政客的“合议”，以南北妥协（实即以南方屈从北京政府）来消除护法运动。

孙中山坚决反对军政府改组。他于4月2日在致唐继尧的电报中，郑重声明：“护法之唯一主张，在恢复旧国会，并使之完全行使职权，无论改组内容如何，此主张绝对不能有所牺牲，必须一致坚约，始可共议改组。”他指出：如果军政府现在改组，必然是“军府朝撤，粤局夕

变；滇、黔、川军未出武汉，而桂军或已言和，有始无终，能不寒心！”

可是，改组军政府之议甚嚣尘上，孙中山已经无法改变局势。4月10日，罗家衡在国会非常会议上指出了改组军政府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要求将大元帅一长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后，赞成改组军政府者达51人。居正等反对改组者数次起立发言，竟遭到赞成改组者的“挠乱”。因为争论过于激烈，结果由议长指定20人为审查员，对此议案再行审查。改组军政府一事关系到军政府本身的存亡问题，这样的大事在事先竟未征求作为军政府首脑的孙中山的意见，这是显然悖情逆理的。

4月11日，孙中山会见全体国会议员时，义正辞严地谴责这种无理做法。他表示：“余个人对于改组一事，根本反对。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余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惟有洁身引退也。4月13日，孙中山再次接见国会非常会议代表，重申他反对改组军政府，并表示：“现在最要紧者是令陆干卿（荣廷）对大局表示决心，对民国表示诚意。若彼能来梧州，……（予）即可亲赴梧州与之面商一切，……万一彼不能来梧，即到南宁亦可，予亦能亲赴彼访之。若彼愿任大元帅，则吾让之于彼，亦无不可。……今日办法只有以人就法，不可以法就人。以人就法，则予个人去位可也；以法就人，则改组万不可也。”对孙中山这些肺腑之言，军阀、政客们仍置之罔闻，更加快了改组军

政府的活动。

5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再次就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即改组军政府案进行讨论，孙中山派居正作为代表出席，议员出席者共80余人。讨论后表决，赞成改组军政府案者达40余人，多数通过，议案有效。孙中山得知这一消息，即命居正将大元帅辞职咨文送交会议，他已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方式了。

孙中山终于认识到：唐继尧、陆荣廷和北洋军阀一样，都是护法运动的大敌，“其所以治兵西南者，迹彼用心，只欲分中央专制全国之权，俾彼得专制于二三行省。”形势的变化已不允许再和他们和稀泥了。孙中山愤然拒绝非常国会对他的挽留，于5月4日向国会提出了大元帅的辞呈。他在辞职通电中，追述了近一年来的护法坎坷历程后，沉痛地指出：

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本文匹夫，无拳无勇，所以用其全力以拥护非常会议者，其效果亦既如是，庶乎可告无罪于国人。孙中山的辞职通电在护法军政府内外都引起了震荡。拥戴孙中山之人颇多愤激，张开儒甚至通电反对，认为“某派为此，惟有同归于尽”。连反孙政客也感到有些棘手，因为孙中山提出辞职后，社会颇多议论，说军政府改组的目的就是“排去中山”，以便“专为议和”，“将牺牲护法主义，置国会于不顾”。国会在讨论孙中山辞职时，有些人主张拒绝孙中山辞职，并恢复其原职，有些人则强烈反对此主张，

因而引起激烈争吵，整个会场一片混乱。

孙中山知得这些情况，仍想若能委曲求全，便继续把护法事业进行下去。5月5日、6日，孙中山继续与陈炯明、张鲁藩电商北伐之事。5月8日，孙中山致电汪精卫，一方面表示“国会决议挽留，暂不离粤。政治活动，恐无补于国家，此后当待机以图根本之解决耳”。另一方面也在考虑下一步的活动，“沪上我能居否？从各方面细查详复”。

5月10日，陈炯明正式通电反对改组军政府，孙洪伊亦致电广东非常国会反对改组军政府。桂、滇军阀及政学系的政客们决定尽快逼孙中山下台，以便结束这次“改组”。5月10日，莫荣新悍然解散军政府陆军部的警卫队，12日，莫荣新“命令部队日夜巡逻”，以防“动乱”，还唆使桂军将领马济通电攻击孙中山，封闭广州的比较主持公道的报纸。同时，在唐继尧的默许下，桂系军阀和李根源、李烈钧等人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剥夺了由孙中山任命的军政府陆军总长张开儒的兵权，随后又拘捕了他，还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坚决拥护军政府的滇军将领崔文藻不经审讯，即予枪杀。这些活动实际上已是桂系军阀解除卫护军政府的武装和动力驱逐孙中山的信号了。唐继尧虽和桂系夙有矛盾，但他对于桂系军阀的这种残暴行径却表示同意，称赞莫荣新“处理甚为适宜”，并密电李根源，派人将张开儒解送回滇“依法处办”。

面对桂系军阀的淫威，孙中山没有屈服，他在5月15

日与记者的谈话中，凛然表示：逮捕张开儒、枪杀崔文藻为非法，“予以张、崔二君实深惜之”。

不过改组军政府的决议案既已通过，且正在实施，孙中山在广州的处境更为困难了。5月18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并宣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在大纲中，规定广州政府的名称仍用军政府，其主持者改称总裁，其主席总裁则由政务会议推定。20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懌、陆荣廷、岑春煊及孙中山等7人为军政府总裁。岑春煊得到政学系的拥戴，又为主席总裁。孙中山名义上虽是七总裁之一，却处处要听从于桂、滇军阀。孙中山终于明白，西南军阀之所以要密谋改组军政府，完全是为了和北洋军阀议和，而决不是为了护法。护法的旗帜已被砍倒，护法的权力再度被夺走，孙中山在广州再也呆不下去了，他想依靠军阀的力量来重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希望又告破灭。

5月21日，孙中山离开广州，随行的有胡汉民、朱执信、戴季陶、叶夏声等人。临行前，孙中山发布了《辞大元帅职临行通电》和《留别粤中父老昆弟书》。

孙中山领导的首次护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军阀不可靠，南北皆貉，孙中山开始对“民力”有所认识，他在《留别粤中父老昆弟书》中，希望粤中父老昆弟“致力于培养民力，增进民智，扶持风俗，发展自治”，“以发扬我粤之光荣，永为全国之仪型”。

孙中山的这一初步认识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在护法运动的艰难进程中，人民群众的爱憎情绪是很分明的。奉孙中山之命到湖南慰荣湘军的林祖涵回到广东后曾报告说：湘军将士对驻湘桂军暴行十分不满，多“愤愤不平”，因而“心理上实愿军府发展势力，以稍伸郁气”，“上下士兵对于大元帅莫不各具一种信仰钦敬之意。”

陈炯明由后台跳到前台

孙中山到上海后，一直准备重新奋起，但是，对于如何奋起，如何打倒军阀，暂时是一愁莫展的。不过，他毕竟有着长期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十分重视枪杆和地盘。所以，他在上海一面发奋著书，希望以此来“启发国民”，“唤醒社会”，一面对保存和扩张自己的实力以极大关注。孙中山当时所持有的实力，就是他竭力培植的粤军。

还在第一次护法斗争时，孙中山除了依靠西南原有的武装力量和南下海军外，鉴于这些西南地方军阀并不很听从指挥，就很想建立一支可以直接指挥的军队。当时，广东省长朱庆澜见桂系统军阀对自己倾轧无已，难以再在广东呆下去，便提出将省防军 20 营交给大元帅府直接统辖。广东督军陈炯明横加阻挠，准备将这 20 营军队强行纳入督军管辖之下。经过孙中山反复力争，到 1917 年 11 月，在北军压境、桂系治面临危机的情况下，继任广东督军的

莫荣新才勉强同意由孙中山提出的陈炯明接管。

陈炯明当时是孙中山颇为信任的护法将领，虽然他在历史上与孙中山有过数次分，合的经历。他很早就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有密切交往，但直到1909年11月才毅然加入同盟会。之后，他为同盟会做了两件值得称道的工作。一个是在香港设立“乐群书报社”，作为策动清军的联络机关，为发动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作准备。另一个是利用咨议局这个合法论坛开展斗争，充当咨议局中“遇事反对政府，尤为露骨”的激进派的实际带头人。在轰动当时的是否要禁赌的议案中，他是激烈反对广东地方政府纵容赌博的“可派”领袖。他创办《可派》，并免费输送到新军中，显然具有藉此鼓励人民革命情绪、配合发动武装起义的意图。

武昌起义爆发后，陈炯明和邓铿等于1911年11月1日发动淡水起义，促成了广东独立。当孙中山从欧洲回国路经香港时，挚胡汉民北上主持大计，所遗广东都督一职，由陈炯明代替，主持广东军政。陈炯明以军事能力见长。他在代理广东都督，首次全权治理广东的四个月中，其所作为和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施政措施大体相符。但是，他在除了实行军政统一的正当要求外，还含有乘机扩张个人势力的企图。他通过组编正式陆军，建立了以“循军”为主的直辖于他的25000人的军队，然后凭借这支武装，镇压裁撤其他民军达9万余人，并剿办各地民军，以逐步实现他独尊广东的目的。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解职之后，于1912年4月25日偕胡汉民南来广东。当时孙中山想把广东建设成为模范省和民主基地，对胡汉民自是更为倚重。而陈炯明此时的个人权力欲虽处于急剧上升时期，但其时广东各界对都督人选议论纷纷，地位已很不稳，难以继续担任广东都督。陈炯明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他于孙中山、胡汉民到达广州的当晚，就留书辞职去香港。这实际上是给无法掌握广东军队、安靖地方的胡汉民出难题，迫使胡汉民派朱执信到香港把他请回来，担任军统，后来又委任为广东绥靖处经略、广东警卫军总司令，掌握全部军权。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耍弄手段夺去了陈炯明的军队和地盘。反袁高潮到来后，陈炯明于1916年在惠州淡水誓师讨袁，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他怀有个人野心。因而和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似合仍离，他始终打着讨逆共和军的旗号，与广东中华革命军异帜并立。他很想凭借自己的武装和据有的地盘，以及他和西南实力派、欧事研究会成员的历史联系，争得广东的地盘。可是，陈炯明当时的力量毕竟太小，当不了南方护国军抚院的抚军，而西南实力派却很快和当时比陈炯明更具有实力的龙济光达成妥协，陈炯明遭到摒弃，其讨逆共和军亦被迫改编。

恰在此时，反对北洋军阀毁弃国会、约法的护法运动兴起，陈炯明乘机想依托护法，再次拥兵据地。于是主动向孙中山“认错”，表示愿竭力拥法护法。孙中山以为陈

炯明“认错”是真心，还认为陈炯朋在广东军政界仍有影响，可以倚以建立护法政权，组织护法武装。所以，当他千方百计地从桂系军阀手中争得 20 营的省长亲军时，就把它拨给陈炯明指挥，使之成为军政府直接指挥的武装。这是孙中山和护法军政府当时所唯一拥有的主要陆军，此举表明了孙中山对陈炯明的信赖和倚重。

桂系军阀深恐陈炯明这支军队留在广州，危及它的统治，因此在拨交时就讲明这支军队不能留在广东。孙中山便把这支军队组成“援闽粤军”，又集合惠州等 12 营，先后出发东江，准备援闽。后来，孙中山又抽调革命党人中的一些军事骨干，分任这支军队的各级领导。1917 年 12 月 2 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1918 年 3 月，陈炯明率军移驻湖梅地区，续有扩充。莫荣新对这支部队仍甚忌恨，扣发饷械，使之无法向前进军。为此，孙中山又一次经过力争，收回盐余款项，才使援闽粤军勉强维持下来。

孙中山辞去军政府大元帅之职后，为了重建护法根据地，以便再举护法旗帜，孙中山力图保存和发展护法武装力量，而其为寄与殷切希望的，就是陈炯明的援闽粤军。

在孙中山未离粤赴沪前，他就写信给陈炯明、许崇智、邓铿等人，商议援闽粤军如何与海军、李福林的福军相提挈，以除后顾之忧，创建闽南根据地的问題，希望他们努力进取，并说如粤军攻入闽境，当即以陈炯明为福建督军。后因海军与福军拒不应命，滇军又因受桂系军阀唆

使在后面牵制，这一筹划未能实现。

孙中山离粤赴沪途中，又专程绕道汕头、梅县，以视察援闽粤军，督促陈炯明向福建进攻。适有“永定已下，河州望风而降，下洋亦经占领，所获子弹甚多”的捷报传来，孙中山与谭人凤、胡汉民竟高兴得“拍掌称快”。

孙中山回到上海之后，除闭门撰写《建国大纲》外，一直未停止过对援闽粤军和陈炯明的关怀和指导，他多次给陈炯明去函去电，甚至两次抵押上海住宅，以在经济上接济援闽粤军。还派朱执信、蒋介石、戴委陶等人前去陈炯明处予以协助。

总结第一次护法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孙中山决定选择时机打垮桂系军阀，夺取广东，作为革命活动的立足点和根据地，然后挥师北伐，打倒北洋军阀，统一全国。所以，孙中山在上海时，一面观察形势，等待时机，一面竭力培植粤军，准备重返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

1920年初，滇、桂军阀为争夺驻粤滇军兵权而大战于粤北。孙中山乘机向云南的唐继完、贵州的刘显世、湖南的张敬尧、谭延周等加强联系，敦促他们分头从云、贵、湘三方面围攻两广，“剿平桂系，奠定西南”。各方就此取得了协议。同时，由于桂系专横跋扈，原附从广州军政府和国会的一些成员亦不堪其压迫，原广州军政府总裁伍廷芳、唐继尧、唐绍仪，广州国会参、众两院议长林森、王延廷、吴景濂、褚辅成相继离开广州，通电宣布脱离军政府。

6月3日，孙中山和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以四总裁名义发表联合宣言，声明否定桂系军阀所把持的军政府，继续贯彻护法主张，将军政府移往云南。

与此同时，孙中山加紧在广东策划讨桂起义。他派徐绍桢为讨贼军总司令，回粤策划了7月中旬在江门、新会一带爆发的讨桂武装起义，部众数千人，号称“救粤军”。救粤军分五路袭击广州。同时，广州省河江防舰队江大、江固两舰逃出广州，加入讨桂行列。

正是在讨桂序幕已经揭开的情况下，孙中山下令陈炯明率军回师广州。8月12日，陈炯明在漳州誓师讨桂后立即出发。兵分三路：左路军由邓铿指挥，自诏安直趋潮安、汕头；中路军由陈炯明率领，进攻饶平、高坡；右路军由许崇智第二军组成，直指梅县、兴宁。

由于粤军屡受桂军团抑制，思乡心切，战斗力很强，攻势凌厉；而桂军则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大有一触即溃之势，故所向皆克。孙中山闻讯大为欣喜，即致函表示祝贺，指示妥善处理降军，抓住时机，快速进攻，又急汇款35000元，以供粤军使用。

从9月到10月，陈炯明与桂军在惠州相持月余。桂系集中40营兵力于惠州，以作困兽之斗。为支持陈炯明歼灭桂军主力，孙中山极力争取各路军队的支援和响应。在孙中山的号召和各地革命党人的活动下，义军蜂起，依附桂军的也纷纷反戈。10月22日，陈炯明率粤军攻克惠州；乘胜进军，28日进占广州；到11月底，桂军残部退

回广西，旧桂系在广东近五年的残暴统治至此宣告结束。

对陈炯明率军攻克惠州、进占广东，驱走桂军的贡献，孙中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交给他广东军政大权。

孙中山以为，盘踞广州多年的桂系军阀已被逐出广东，南方已为革命势力，既可重组一个贯彻革命主张的正式政府，再推倒北方，以求统一。

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偕伍廷芳、唐绍仪及胡汉民、戴委陶、宋庆龄等，乘“中国号”邮船从上海抵达香港，再转乘专车到广州。在香港和广州，孙中山都受到了各界的热烈欢迎，沿途商店悬旗放炮，市民群众表示欢迎者，不绝于道。

当晚，陈炯明在广东省署举行欢迎宴会，孙中山即席发表演说，除对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率粤军回粤赶走桂军表示感谢外，更强调指出他这次回粤是为了重组军政府，然后建设广东，作为统一中国的革命基地。他说：“吾国必须统一，唯以民治为统一方法，然后可期永久；武力不过辅助民治之不及，非不得已，不宜轻用。……此次归来，……提倡民生主义，厉行民治精神，务使社会财产，渐趋平均。……于广东实行建设，以树全国之模范，而立和平统一之基础。粤省为护法根本策源地。此行与各总裁回粤主持军府，发扬民治主义，于根本策源地，务须实行保护，使粤省民治发达，足为各省之模范。”

29日，孙中山决定以广州观音山旧督署为军政府府第，并召开重组军政府的第一次政务会议。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被推为军政府总裁。

军政府重建后，广州市民连日举行大会和游行，祝贺军政府重建，并深盼孙中山早日着手实行振兴工商业政策以及建筑南方大港计划。孙中山也在重组军政府的工作就绪后，连日视察广州、韶关等军事要地，收编民军，并续开政务会议，研究刷新吏治，实行建设等问题。

陈炯明为独霸广东，在粤军回粤后，利用广东人民团桂系军阀和其他各军长期蹂躏广东而激起的“粤人治粤”的地方主义情绪，以及不让广东财政收入外流，以求自保的愿望，大张旗鼓地宣扬“联省自治”。所谓“联省自治”，本是湖南、四川、云南、广西等南方各省军阀，在南北对峙，武力已难以统一中国的情况下，出于维护自身权力、地盘的需要，而划地为域，谋求独霸的一种思潮。就在孙中山已任非常大总统一年以后，陈炯明抛出了《联省自治运动》一文。这是一个以各省“省宪法自定”、“省长民选”等的行政纲领。

针对陈炯明关于“联省自治”的鼓吹，孙中山反复进行了告诫。他在1922年8月17日的对外宣言中指出：“我既反对那些衷于把省作为地方自治基本单位的人，也反对那些提倡将联邦制的原则应用于各省的政府的人。我极力主张地方自治，但也极力认为，在现在条件下的中国，联邦制将起离心力的作用；它最终只能导致我国分裂成为许

多小的国家，让无原则的猜忌和敌视来决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而联邦制则必将削弱这种意识。”然而，陈炯明并没有接受孙中山的告诫，仍然一意孤行。

在陈炯明的主持下，广东制定了所谓的《广东省宪法草案》，规定由省长掌握全省军政大权。广东作为一个省，竟单独制宪，而且以割据一方的内容为制宪主旨，立即遭到了普遍的反反对。廖仲恺、邹鲁、古应芬等对此都进行了揭露和针砭，他们认为省宪意在“将中国划为二十多个小国，省宪本身，全是地方割据，没有统一国家，各省若按此自治，省自为谋，各行其是，势必陷中国于支离破碎，予眈眈虎视之外强以绝大机会。”陈炯明不仅在广东借推行自治，鼓吹“保境息民”来对抗孙中山的北伐统一，而且还与当时主张“省自治”的湖南军阀赵恒惕、浙江军阀卢永祥、江西军阀陈光远紧相联系，此呼彼应，由各省自治进到数省自治。对此，孙中山在1921年4月与美国记者辛默的谈话中公开指出：长江七省都督联盟，“仅各该省份之督军等为保护个人私利起见，而缔结之盟约耳。……盖无一武人不欲扩弃其势力于最高之限度，以为保持地位之计”。但陈炯明仍分派其亲信继续与湘、浙、赣、川、滇等地军阀密商，并一再发布通电，声称要在上海举行各种代表会议，商定联省大法和“建设大纲”。

陈炯明与孙中山在“省自治”问题上的思想分歧，导致了在政治军事活动中的一系列尖锐对立。特别是在护法

政治建立之后，孙中山欲先统一两广，进而出兵北伐，实现全国民主统一的主张，旨在消灭南北军阀，更招南北军阀之大忌。

孙中山搞革命的一个重要战略考虑，就是先南后北，从南到北。孙中山之所以多次催促陈炯明回师广东。随后又坚主进军广西，就是他当时一再表示的“当今急务，在先灭桂贼而统一南方，然后乃能北向讨贼耳”。为此，还在粤军回师广东的过程中，孙中山就一再促请川、湘、滇等军首领乘桂系集重兵于广东之际，进军广西。真 1920 年 11 月上旬，当陈炯明攻克惠州、广州之后，孙中山就致电陈炯明，指出：北方即将借统一为名，出师援桂，“粤局此时犹未得以为安也。”必然乘桂军惊魂未定，“使民军速进桂边，以扰彼归路，然后以大军临之，一溯西江以取梧、浔，一由海道集中钦州，以取邕、龙，则桂贼可全灭矣”。但陈炯明拒不听命。

陈炯明之所以反对进军广西，不是他没有扩张的野心，主要是想保有广东这块富庶地盘和现有实力。他认为：如果自己率兵攻桂，则广东将为他人所有，岂不是得不偿失？如果让孙中山率兵攻桂，必将带走部分粤军，而饷械仍要广东负担，也有害无利。

陈炯明虽然反对并阻挠进攻广西，但北京政府和桂系军阀却不愿让他独占广东。1921 年 6 月 13 日，陆荣廷在北京政府的授意下，率桂军进犯广东。陈炯明无奈，只得应战，迅速击败桂系军阀的进攻。孙中山再次信任了陈炯

明，对他奖励有加，先后任命他为援桂军总司令，全权办理桂省军事、广西善后督办，还拟任命他兼任广西总司令。但陈炯明认为这是孙中山的调虎离山之计，拒不接受孙中山的任命。

讨桂战争结束后，孙中山立即组织北伐军。孙中山同样对陈炯明寄予很大希望。1921年10月17日，孙中山率军舰上溯到梧州后，立即电召陈炯明来格商量北伐事宜，但陈炯明又拒不应命，还扬言：“北伐今非时机。”孙中山为争取陈炯明，于10月24日专程抵南宁与陈炯明会晤，他诚恳地对陈炯明表示：“吾北伐而胜，在事势上固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再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及切实接济饷械而已。”陈炯明被迫伪允供应北伐饷械。

但是，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判断在这里是失误了。因为孙中山的北伐，矛头所指向的正是与陈炯明相勾结的直系军阀，北伐的对象也必然会拼命地拉拢陈炯明，让他从中进行破坏。吴佩孚与陈炯明双方密使频频往返，陈炯明决意降北联吴，达成了吴佩孚在北方驱逐徐世昌，陈炯明在南方驱逐孙中山的秘密协议。陈炯明于是加紧策划破坏孙中山北伐与驱逐孙中山的活动。

孙中山的“北伐梦”

军政府重建后，孙中山还多次声称：军政府的责任在继续护法，虽然孙中山已经明白，“护法不过是矫正北京政府之非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若何裨益”。但是，为“共和”理想而奋斗的孙中山更明白，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民国政府。他认为，没有一个正式政府，不仅没有一个讨价还价的“凭藉”，而且“非行权不能济变”。所以，孙中山有一个重要的战略考虑，就是先南后北。从南到北。他之所以多次催促陈炯明回师广东，随后又坚主进军广西，其原因也就是他当时一再表示的“当今急务，在先灭桂贼而统一南方，然后仍能北向讨伐。”

尽管护法的军政府重新建立起来了，但是，孙中山和他的这届军政府一开始就面临着较上届军政府更为严峻的情势。

当时，北洋政府在桂系逃离广州前，已宣布撤消广东军政府和取消广东自主，并大言不惭地宣布全国已经“统一”。此着是相当厉害的。因为北洋军阀毕竟占着“中央政府”的位置，国际上也只与它发生效力。而川、湘、滇、黔四省军阀为谋求自保，也宣布“自治”，即南北政府都不承认，在局外中立的幌子下各自称雄一方。军政府

名义上有四个总裁，但唐继尧于1921年2月7日被其将领顾品珍赶下台，唐绍仪因与孙中山意见参差而持消极观望的态度，主持军政府者仅孙中山和伍廷芳。加之过去一段时间，由桂系主持的军政府已弄得声名狼藉，在人民中不复有威信。

外交和财政上的困窘更重压着孙中山和军政府。帝国主义借口北洋政府已实现“统一”，完全无视军政府的存在。在这之前，外交团与中国南北两政府曾协议将关税余额的13%付与军政府，而此时的外交团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悍然以军政府的权力仅及广东一省为借口，停止这笔原定拨款，并将应拨交军政府的关税余款250余万元划归北京政府。军政府财政总长伍廷芳曾为此向驻粤领事团多次提出抗议，最后一次声称，如果不按协议付款与军政府，则派人接收海关。帝国主义对军政府的抗议毫不理会，还动以武力相威胁，同时，又成立新的银行团，不断借款给北洋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认为，必须尽快成立正式政府，以资抗衡，并藉此争得对内对外的代表权。

1921年元旦，孙中山在军政府举行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九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主张建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他说：中华民国成立9年来，由于袁世凯、张勋、段祺瑞、吴佩孚、岑春煊等“奸人”的破坏，中华民国徒有虚名，而无其实，因此，此次军政府回粤，“其责任固在巩固继续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

解决根本问题。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法。……方针为何？即建设正式政府是也。”孙中山在演说中，希望留沪国会议员南来广州，“仿南京政府办法在广东设立一正式政府，以为对内对外之总机关。”

为联络西南宣布“自治”之各省参加孙中山拟建的南方政府，孙中山在元旦的演说中还强调“欲以自治之基造就巩固不拔之统一政府”，并实行“废督裁兵”主张。但是孙中山的这一主张受到了西南地方军阀的联合抵制。直系、研究系、政学系知孙中山有建立南方政府的打算后，抢在3月份孙中山在广东成立正式政府之前，组织“六省联防”，并声言“勿为孙文所惑”。孙中山知道，如果这一阴谋得逞，西南诸省势必分裂，粤局顿时孤立，其危险实不堪言，于是加快了成立正式政府的步伐。

应孙中山之邀，许多国会议员陆续抵粤。4月2日，广州国会召开会议，赞同孙中山的主张，决议取消军政府。4月4日，孙中山在广州举行宴会，招待国会议员和广东省显要人士，孙中山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外交团将关税余款交北京政府，不管是对广州军政府宣告了死刑，“唯有立即选出总统，组成正式政府，使西南各省能取得同外国进行谈判的合法地位。”4月7日，非常国会参、众两院在广州召开两院联合会，由参议院议长林森主持，大会随即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出席议员220名，孙中山以218票当选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职，设总统府于广

州观音山南麓，组建了中华民国政府。孙中山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将军政府属下的 8 个部改为 5 个部。任命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汤廷光为海军总长、徐谦为大理院院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徐绍桢为总统府参军处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唐绍仪未接受任命，由财政次长廖仲恺代行。

孙中山要以武力统一中国，而陈炯明则劝他实行“联省自治”。在他的理想里，所谓联省自治，就是“以广东为中国的普鲁士，把中国变为德意志式的联邦”。孙中山为了推行统一大业，他急于成立正式政府。陈炯明对此反对最力。

当时陈炯明身居军政府陆军部长、内政部长、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四个要职，一心“想作一个永久的南粤王”。就在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的同时，他一口气颁布了《广东省自治条例》、《县自治暂行条例》和《广东省宪法草案》等法例。

4 月 8 日，粤军将领举行秘密会议，商量阻挠选举总统的办法。当天，由湖南首先发难，以省教育会、农会和工会名义，通电反对广州选举总统；4 月 10 日，湘军将领通电指责选举为非法行为，敦促孙中山严辞拒绝。13 日，湖南省议会也通电反对。在广东省政府中，持异议者也大有人在。

在一片反对声中，孙中山毫不动摇。他沉着地回答：

“此次军政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予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公开对“护法”这面旗帜提出质疑。

既然合法与非法问题不能阻止孙中山，陈炯明只有亲自出面了。他直接了当地建议，孙中山最好暂不就职，即便就职，也可以大总统名义赴欧美各国作政治活动，不必留在国内。这是明目张胆的放逐。

孙中山向陈炯明保证，一旦当选总统，立即出师北伐，即使失败了，也不返回广东，广东就完全交给陈炯明。

这次谈话是在粤军总部进行。天色黯淡，暮云四合，窗外渐渐沥沥地下着春雨。陈炯明始终满面愁容，心事重重。他很少说话，只是低头听着孙中山激动地谈论北伐，谈论中国的统一。一切都不可改变了。“既然如此，”陈炯明抬起头，轻轻地说，“就请先生5月5日举行就职典礼吧。”

“我是广东总统，你是广东皇帝，”孙中山兴高采烈地说，“皇帝开了金口，我尊旨就是了。”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然而，孙中山和地方军阀的蜜月，从此结束了。

广州护法政府的正式组织以及孙中山出任总统，与北洋军阀操纵的北京政府鲜明对立。广州人民组织放爆竹的汽车环市游行以示庆祝，海外华侨拍来祝贺孙中山当选总

统的贺电达 200 余件。

然而，北京政府不仅没有同孙中山谈判和平统一中国的半点诚意，而且还怂恿广西军阀陆荣廷祸犯广东，企图颠覆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徐世昌的挑唆下，广西军阀陈炯明集兵梧州，借孙中山当选总统事对广东通电对其蓄意启衅，准备打到广州推翻民国政府。陆荣廷则同北洋政府勾结，希望北京政府指派陈光远从江西出兵，李厚基从福建出兵，另派南军南来，准备分三路进攻广东，搞垮孙中山为总统的广州国民政府。

为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解除北伐后顾之忧，孙中山于 5 月 28 日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准备讨伐陆荣廷，消灭广西反动势力。6 月 20 日，陈炯明出兵广东肇庆，准备出台广西。26 日，孙中山命令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此时，陈炯明部将刘震寰响应粤军号召，宣布独立，陈炯明逃往浔州，粤军占领梧州。27 日，孙中山正式下令讨伐陆荣廷等，要求粤军“荡平群盗，扶植广西人民，使得完成自治。”由梧州西进的粤军以破竹之势打击桂军，7 月克南宁；8 月，滇、黔、湘、赣各军攻入桂军；10 月，粤军复克龙州，陆荣廷、谭浩明等逃往越南河内。

时局的发展增强了孙中山打败北洋军阀的勇气和信心，他决定出师北伐。10 月 13 日，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孙中山即率胡汉民、许崇智、汪精卫、廖仲恺、陈少白等人，乘宝璧舰出巡广西，准备取道湖南北伐。北伐军 3 万人亦于当日开拔。12 月 4 日，孙

中山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1922年2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颁发动员令，以李烈钧率滇、黔、赣各军为第一路，兼攻赣南和鄂东；以许崇智率本部粤军为第二路，联全湘军出湖南，直攻武汉。

然而，由于军阀的阻挠和破坏，却把孙中山的北伐统一中国的主张与此次北伐的具体措施变为泡影。而其中破坏最大的，就是陈炯明。

虽然陈炯明的援闽粤军是孙中山为其组建并一直寄予厚望和鼎力资助的。但是，羽翼已经丰满的陈炯明，早已蜕变为军阀，此时已根本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由于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已经形成，武力中心主义已发生动摇，无力问鼎中原，希图偏安一隅的南方地方军阀，企图利用人民渴望休养生息的心理，以保境安心为口实，割据一方。陈炯明就是这种思潮的主要代表，他挂起“粤人治粤”的旗号，标榜联省自治。

陈炯明虽然参加了驱逐桂军，回师广东的战斗，但他回师广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欢迎孙中山南下组织护法政府，而是为了据有广东这块富庶地盘，拥有较之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强大的军队。

陈炯明兵变

北伐义举得到了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支持，影响极大，因而筹划及准备迅速。然而，这一切却刺痛了陈炯明的神经。正当北伐军在桂林整装待发之际，他却于12月以“现当库储支绌，亟须统筹收束”为借口，发表裁撤粤军的训令，一次裁兵即达20营之多。对北伐军所需要的晌械，也软拖硬抗，拒绝支付，使北伐军“坐困桂林”。1922年3月21日，留守广州，积极支持孙中山北伐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被刺、使北伐军后方接济无人，完全失去可靠的后方依托。

邓铿被刺的消息，震惊了孙中山和桂林大本营。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军事行动。许崇智主张回兵广州，蒋介石主张讨伐陈炯明，胡汉民也认为只能回兵。孙中山决定班师回粤。4月8日，大本营由桂林起程，先头部队于12日到了梧州。陈炯明想不到孙中山如此迅速回兵，慌了手脚，一面派廖仲恺、陈少白到梧州迎接，一面策划退路。孙中山对陈炯明破坏北伐的行为极为愤慨，要将陈炯明的总司令、陆军部长、内政部长、广东省长等职一概免去。胡汉民以为操之过急，主张先将他的内政部长及省长两职免去。同时，黄大伟、魏邦平等人也力劝孙中山息怒。孙中山听从劝告，再一次给了

陈炯明一次机会。

4月16日，孙中山在梧州召开扩大军事会议，决定“出师江西，悉命渚军集中韶关，以大本营设于韶关”。18日，廖仲恺由梧州到广东，劝陈炯明赴梧州与孙中山商讨北伐问题，孙中山也电召陈炯明前来面商。可是，陈炯明拒绝前往，并以辞职相要挟。4月21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内政部长、广东省长三职务，派伍廷芳任广东省长，仍给陈炯明保留了陆军部长一职，希望他能幡然悔悟，悬崖勒马。

可是孙中山再一次错了，陈炯明已不可能悬崖勒马，他拒绝孙中山的苦心争取，决心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加紧策划一场更大的叛变，欲令“北伐军首尾不能兼顾”，从而把北伐军一举消灭。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分三路进攻江西。一月间，北伐军迭获胜利，攻克赣南多地。6月13日，占领赣州。就在此时，陈炯明密令他所辖的熊式亮、熊略、陈炯光、杨坤如等50余营，从粤桂边境移向广州。20日，陈炯明嗾使其部将叶举致电孙中山，要求恢复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两职，并免去胡汉民职。同时，粤军蓄意向财政部闹索购风潮，当财政部勉为其难清还军饷后，又故意向省银行强迫兑现，掀起挤兑风潮，有意捣乱后方。

为稳定广州局势，孙中山应廖仲恺之请，于6月1日回到广州。他在观音山巡视时，发现陈炯明有谋叛布置，

于是在省城演说，警告陈炯明：“谁要叛逆，我就派飞机掷弹攻他，可以致他死命。”6月12日，孙中山又在广州举行茶话会，招待新闻记者，揭发陈炯明反对北伐的行径，说北伐“有阻力，系武人反对北伐，……耀武扬威，想再演武人的专制”，希望以舆论压力迫使陈炯明退回东江。13日，北伐军占领江西赣州，检获陈炯明与吴佩孚、陈光远图谋夹击北伐军的来往密电三件。已知陈炯明嘱陈光远固守赣州，以扼北伐诸军前进，而陈炯明将率兵袭击北伐诸军之后，故陈光远严饬所部据此死守以待。北伐诸军将领见此电报，已知陈炯明蓄谋凶险，祸在必发。

但是，孙中山并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他虽然已经知晓了这场酝酿已久的兵变，却过于自信自己的威望和过高估计在广州非陈炯明派的武装力量对他的拥护，他认为至少陈炯明的部下是不愿反抗他的。

6月12日，陈炯明接到吴佩孚的万急电报，内称：“彼已将徐（世昌）逼走，请即履行条件倒孙（中山），如再延不遵办，彼即宣布废除前约。”陈炯明于是横下心来，于6月13日下达了对总统府的总攻击令。14日，陈炯明将廖仲恺骗到石龙镇，予以拘禁。16日，在叶举的指挥下，在“促孙下野”的叫喊声中，由洪兆麟部首先炮轰总统府，企图置孙中山于死地。

就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之前，孙中山已得到陈炯明叛变的确切消息，可他仍不愿相信，直到叛军进攻总统府的号音隐隐传来时，才断定叛变是实。宋庆龄等人再三婉求

孙中山火速离开总统府，因为同行会给他带来不便，孙中山仍认为他可以向陈炯明部下晓以大义，制止叛变。孙中山的左右见情势不容再犹豫，便强挽他的手臂，离开总统府。夜已经深了，街上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但总统府四周已布满了叛军的岗哨。孙中山在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等的催促和保护下，化装成医生，从容自若地穿过叛军的队伍，来到海珠海军总司令部，登上停泊在白鹅潭的楚豫舰。

当叛军进攻总统府时，总统府卫士以少敌众。与叛军苦战 10 余小时，打退了叛军组织的 10 余次进攻，卫士伤亡约三分之一，而叛军陈亡者，数在 300 人以上。宋庆龄冒着密集的炮火，在卫士队长姚富顺及副官费惠龙、马湘的护卫下，冒着枪林弹雨冲出了总统府。第二天，历尽艰苦才与孙中山会合。

6 月 17 日，孙中山登上永丰舰，他决心率领舰队讨伐叛逆。他坚强不屈地表示：“今日我必率舰队，击破逆军，城平叛乱而已。”“如畏慑暴力，潜伏黄埔，不尽职守，徒为个人避难偷生之计，其将何以昭示中外乎？”他亲自率领 6 艘军舰，开到白鹅潭，以密集的炮火教训了陈炯明一顿。叛军死伤数百人，惊恐得很。叛军的炮弹虽然打穿了永丰舰，但孙中山毫无惧色，镇定自若地指挥着这场战斗。

然而，形势对孙中山却非常不利。陈炯明控制着广州，他的亲信钟声盗用省议会的名义，强迫广州各社团，

联名电促孙中山下野。在陈炯明的重金收买下，海军司令温树德心怀异志，于6月22日与叛军议和，旋即悍然表示“与粤军一致行动”，“请孙公下野”，并擅自率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驶离黄埔，从而拆除了孙中山倚以对抗陈炯明优势陆军的最大支柱。

叛变发生后，孙中山曾手书密令在江西前线的李烈钧、许崇智等人迅速回粤平乱。但他们能不能打回来，还需要时间，孙中山此时就只能围坐于永丰舰上耐心等待。陈炯明当然不会让孙中山在那里安心等待，他一会儿下令：谁捉到孙中山，重赏20万元；一会儿又重金收买孙中山周围的将领和卫士；一会儿又在永丰舰周围爆炸水雷。目的却是为了把孙中山赶走。

许崇智、李烈钧等人在获悉孙中山蒙难后，即于6月23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粤军第二军、滇军、福军之全部及粤军第一师迅速回师靖难。谁料梁鸿楷率领的粤军第一师不仅不南下讨叛，反而擅自退往连平，其他回师部队则遭到直系军队和陈炯明叛军的前后夹击，经过一翻苦战，终无法南进。到8月3日，北伐军被迫分成东西两路，撤退到福建和江西。北伐的大好形势因此葬送，平定陈炯明叛乱已不可能了。

8月9日，孙中山得知北伐军回师失利的确切消息，认识到孤守黄埔海面，已无济于事。他决定离开广州，积聚力量，再图勘乱。遂乘英舰“摩轩号”离黄埔到香港。8月10日，改乘“俄国皇后号”邮船赴上海。就这样，孙

中山以坚持黄埔和白鹅潭河面 50 多个昼夜的艰苦奋战的最后失败，宣告了第二次护法运动的结束。

孙中山第二次护法的失败，是因为陈炯明的叛变。这次失败，是孙中山一生中所遭受的最惨的失败之一。他没有想到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陈炯明，会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把枪口对准了他。他确实有些想不通：清朝政府曾用重金购买他的头，没有成功；而这一回，“祸患生于肺腑，干戈起于肺腑”，陈炯明这个叛徒却差一点置他于死地。革命怎么这么难？

回到上海，孙中山于 8 月 15 日之后陆续发表了《宣布粤变始末及统一主张》、《对外宣言》、《致海外同志书》等文告，对二次护法的失败进行了总结。他在《致海外同志》书中痛切地回顾说：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委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俛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印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

孙中山是一个愈挫愈奋的革命家，第二次护法活动的失败，并没有磨灭其志，他坚定地表示：革命党人应以“国民之前锋自任”，“其所自任者，本至险而至难”，只要信仰坚定，奋力以赴，就能排除万难；达到革命的目的。

他在《致海外同志书》中再次呼吁：“凡我同志，此时尤当艰贞蒙难、最后之胜利终归于最后之努力者，此则文所期望者也。”

蒋介石在广东起家

当1917年7月，孙中山前往广州，蒋介石留在上海时，蒋介石曾帮助孙中山制订进军福州和浙江的作战计划。9月这一计划已放在孙中山的写字台上。蒋介石受聘担任粤军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职务。当时陈炯明率该军正在福建南部作战。这支军队被认为是唯一一支忠于孙中山的军队。蒋介石担任新职的时间相当短暂：1917年9月26日，粤军司令委托蒋介石去指挥该军的一个支队。不久，他就直接参与了作战。可能，他与北方人在永泰一战的失败是对他的自尊心的一次沉重的打击。蒋介石的才能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起什么作用。粤军与当时的正规军有很大差距。迫切需要改组军队。

中国南方仍然是革命斗争的主要舞台：长江以南的地区要比北方发达。共和思想在这里找到了更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社会经济土壤。但是南方军阀在政治生活中仍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当时在广州居住的大都是穷苦人，他们在技术落后的工厂里做工。到处可以看到简陋的店铺和从事小手工劳动的作坊。这里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来是商人和高

利贷者，他们垄断着农产品的交易。把持着钱庄的高利贷者在奴役着当地的居民，倒卖外汇，通过兑换各种银行券大发不义之财。聚集在孙中山身边的不仅有忠于他和他的思想的人们，而且还有一大批军阀冒险分子、出卖灵魂的官僚。

迫于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孙中山不得不与南方军阀合作，共同创建直接隶属于政府的军队。而粤军就成了政府的基础。

每一个省的督军都拥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全靠从农民身上榨取血汗来供养，全靠那些为了寻找一点食物和栖身之地而在全国四处游荡的流氓来补充。破产农民、贫民结成盗匪团伙。城市笼罩在抢劫和恐怖之中；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成为司空见惯的常事。

粤军也是靠那些用以补充督军军队的“后备人员”来补充的，因此它根本不能成为真正革命军队的骨干力量。粤军司令就是军阀陈炯明。蒋介石对陈炯明的评价，不仅表明他个人对此人的厌恶，而且表明他把陈炯明看作是自己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军阀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同乡观念，是决定蒋介石和粤军司令陈炯明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粤军官兵的绝大部分是广东人。陈炯明部队进入广州时，就提出了“广东是广东人的”口号。一个人工作如何，对于升迁毫无意义。即使蒋介石很有才干，不分昼夜地为陈炯明卖命，诚如他的同乡们所说的那样，“为将军效犬马之劳”，那也没有用。

蒋介石抱怨说，为提高军队战斗力而要进行某种改革实在是太难了，他的任何建议都不被采纳。蒋介石在粤军任职时间并不长。桂系军阀战胜了国民党的支持者。1918年春，孙中山被迫放弃政权，出走上海。这个时候中国人已经听到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感受到了它的气息。来自北方的新移民——俄国白匪带来了各种信息。这些被俄国革命风暴驱逐的逃亡者，穿越西伯利亚，来到海参崴和哈尔滨，而后又进入上海。

上海与中国古老城市不同，它和广州、天津一样，在20世纪初已经显露出一些新的特征。工业增长速度虽然缓慢，但这里的工人阶级队伍还是扩大了，社会分化在加剧，民族资本得到加强。工人阶级融汇在苦力、失业者、乞丐等流氓群众之中。勉强可以糊口度日的小私有者（家庭手工业者、行会手工业者、副工长、小商贩、简陋作坊老板、小官吏）代表了各种市民阶层。正是这些群体成为孕育未来反对洋人运动的社会土壤。俄国革命的爆发，促进了这种运动的兴起。共同的外部敌人的存在，促使了大部分社会精英与“下层人”的暂时联合，这种趋势有助于实现后来的统一战线思想。

西方一些著作家认为，中国新一代革命者，是在日本的残酷政策（包括日本人占领山东）和巴黎和约中的侮辱性条款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然而，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有关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最初外交步骤的消息，不能不对中

国社会中民主力量的形成产生影响。一种新的相当强大的、推动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李大钊和陈独秀以及中国文学经典作家鲁迅，都在为捍卫民主思想和民族独立而大声疾呼。

在这个时期，孙中山及其聚集在中华革命党内的战友，都试图诉诸实力同军阀作斗争，于是他们就在南方军阀中寻找强大的同盟者。

蒋介石对于世界上所发生的政治事件并不特别感兴趣，在这一方面，他与孙中山的不同之处就是他的消极性，而孙中山却密切注视着革命事件，并在努力思考国际政治事件的意义。如果在那些善于投机钻营的商人和那些造反的知识分子中间作出选择的话，蒋介石则更愿意在前者中间寻找朋友。蒋介石与被称之为“浙江财团”的最大金融资产阶级集团保持着密切关系。

当时陈炯明要蒋介石到他那里去工作。蒋介石和陈炯明的关系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孙中山要求自己的“兄弟”（孙中山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这样称呼）同这位广东人和睦相处。蒋介石在写给陈炯明的信中作了自我批评。他写道：“我脾气不好，而且我平常缺乏修养……我知道我是个很可笑的人……我的不幸就在于我喜欢走极端。”蒋介石请求陈炯明原谅：如果他有什么出格的地方，那只能归咎于他那令人讨厌的脾气。蒋介石向自己的上海庇护人张人杰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因为患病他不能到粤军中去工作。当这位病人受到母亲照顾的时候，粤军正在

作战。

1919年4月底，帝国主义列强实际上在鼓励日本侵占德国在山东的租界。中国爆发五四运动。

军阀统治和军阀混战使中国人民蒙受很大损失。孙中山愤怒地揭露过封建军阀上层统治集团，发表过洋溢着现代解放思想的讲话。1919年10月8日，他在对上海青年联盟成员讲话时说：“……官僚和军阀统治国家已经8年，革命就是要反对他们；此外，革命还要向那些成为军阀手中工具的政客们复仇。”

孙中山揭露了中国官僚军阀上层集团所沾染的看来无法治愈的贪污腐化弊病。中国革命的这位思想家指着新建成的欧洲式的豪华独院住宅说：“这些住宅是我们的军阀们建造的。他们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他们横行霸道，抢劫民财，靠吸鸦片和打牌来消磨时光，他们无恶不作，吮吸民脂民膏，并且在这里建造欧洲式的别墅，养姘妇，打麻将，喝洋酒，吃美食，与此同时工人和农民却在忍饥挨饿，缺衣少穿。这就是中国将要灭亡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只要不消灭军阀就达不到任何目的的原因所在。”

蒋介石在密切关注着孙中山的行动。如孙中山在1921年在广州成立政府。

蒋介石提醒孙中山要慎重行事。他在1921年3月5日写给孙中山的信中指出：选举孙中山担任总统的进机还不成熟，广西的敌人还占有优势，西南地区尚未解决，国会还没有合适的落脚之地，而且也不是法定人数。蒋介石在

信的结尾写道，“在征服广西叛匪之后，我们才能从东北面向前推进，去进攻我们敌人的首府……统一中国也就不再是那么困难的任务了。”蒋介石再次提醒说：不可信任陈炯明。

1921年4月21日，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的指示，要他立即前往广州参加西征，可是他需要赶回家乡看望母亲：5月14日他的母亲在溪口病逝，享年58岁。

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似乎完全置身于新的潮流之中。1921年6月23日孙中山又致电蒋介石，要求他立即去广州。但是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前往。只是在西征战役结束后，他才于9月应召来到广州。1921年8月广西行政中心桂林被攻克。

孙中山企图在民族主义旗帜下统一全国，汉族高贵的理想在他的思想中显得特别突出。他写道：“现在应该发扬汉人的荣誉和尊严，就让和我们一起建设国家的那些民族熔汇在同一个熔炉里，汇流到汉族之中吧！他们将在亚洲的东方建立起中华民族的统一国家……以便让它的强大震撼着全世界。”

1922年3月21日，邓铿在广州火车站遇刺。蒋介石和邓铿十分友好，邓铿的突然被害，诱发了蒋介石以前在陈炯明司令部里所感受到的委屈和耻辱。蒋介石力主从桂林秘密增调部队到广东。这一计划已付诸实施。

当这些部队于4月抵达广州时，孙中山已免去陈炯明

在政府中所担任的职务。蒋介石表示，孙中山所属部队已做好进攻惠州的准备。1922年4月22日蒋介石写信给陈炯明，建议他重新和孙中山联合，参加北伐，但没有得到答复。

驻扎在广东北部的孙中山部队，开始转入进攻。但是北伐尚未开始，就遇到了挫折。北方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在与孙中山的同盟者奉系军阀的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在忠于孙中山的部队留驻江西的时候，为吴佩孚的胜利所鼓舞的陈炯明就采取了坚决行动。他声明：孙中山应该辞职。广东商人在暗中支持孙中山的。可是后来孙中山采取果断措施，即向富人征收越来越多的捐税，并常常以国家名义征用他们的财产时，商人们就转而支持陈炯明了。

陈炯明向其部下悬赏20万元取孙中山的头，并允许他们自由抢劫三日。孙中山在事件发生前几小时得到情报，只好听从朋友劝告逃走。他穿过危险的街道，前往海军司令部。这时候在总统府（这里存放他的书籍和手稿）上空已经喷出明亮的火舌。他的副官马湘忠实地完成了孙中山的委托：救出了孙夫人——宋庆龄。舰队司令请一批流亡者登上了沿黄浦江航行的永丰号巡洋舰。

同叛逆的武装斗争持续了50天。蒋介石于8月初加入这批流亡者行列。他和孙中山一起，在永丰号舰上渡过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总是向自己身边人的灌输忠诚、负责任的思想。孙中山，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他所提拔的陈炯明怎么会这样卑鄙无耻？要知道，即使是他的敌人

一般也不敢这样做。孙中山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我的最好的朋友陈炯明原来是个叛徒，他被吴佩孚收买了，被香港的英国人收买了。”

8月9日孙中山及其身边人员（其中包括蒋介石）乘坐英国护航舰经上海前往香港。蒋介石没有别的出路。从表面上看来，蒋介石与孙中山共患难是出于对革命领袖的忠诚。然而，事实上，一切都很简单。即没有军队又早与陈炯明不合的蒋介石，现在很疲惫和胆怯，而对危险局面已显得无能为力，因而决定逃走。蒋介石所采取的这种不得已的步骤，倒成为他与孙中山亲近的一个原因。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写道：“吾兄，你还记得我们在军舰上的那些日子吧？在那漫长的日子里，我们只能睡觉和进食，期待着好消息……不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论你经受什么样的考验，只要我还在进行斗争，你就会留在军中。”

孙中山现在准备依靠蒋介石向广州发动新的进攻，暂时躲在法租界，蒋介石奉他之命前往福建，同安福派的将领们洽谈，他寄希望他们能回到广州来。他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打着孙中山的旗号，进行投机（孙中山的名字对于稍微懂得一点政治的人来说是具有极大吸引力的）。

陈炯明的叛变极大地削弱了孙中山政府的军事力量。在武器装备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在陈炯明叛变期间，弹药厂被炸毁，所以，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炸药。英国人依靠自己在中国南部的堡垒，阻止向孙中山运送军用物

资。孙中山在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活动中，仍然像以前一样，首先依靠军事行动。因此，他很器重身边那些受过某种专门军事训练的人物。蒋介石就属此类人物。

蒋介石是从广东起家的。对于蒋介石来说，他的第一个政敌应是陈炯明。

国民党内，真正懂得军事的并不多，蒋介石是其中之一。

与陈炯明合作时，久历江湖之人，一般都具有明快的政治眼力，一看对方就知道对方有多大水平。1918年春，蒋介石从上海来到广州，与陈炯明一见面，两人就互相反感，憎恶。陈炯明认为蒋介石精明、能干，将来恐怕是一个真正的对手。蒋介石当下对陈炯明也有一股说不出的对手味道。

由于蒋介石感到军队地方派系观念很强，自己置身于粤籍军队之中，工作阻力很大，难以有所作为。于是7月底，他向陈炯明辞职，“拂然而去”。陈炯明立即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书信赶到潮安车站挽留蒋介石。他在信中称“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可见蒋介石当时的地位。但蒋主意已定，不愿回去。

1920年，蒋介石再度回到广州时。廖仲恺等力劝蒋介石尽弃前嫌与陈炯明和好，蒋介石依言而行。两个人见面后，不但前嫌未弃，而且因陈炯明下属广东军官叶举等人背地里拿孙中山取笑，两人进一步加深了反感。

此后，蒋介石多次在孙中山面前进言，说陈炯明不是

好东西，劝孙中山提防陈炯明。孙中山未听其言，几次还严厉批评了蒋介石。蒋介石见在广州无法立足，负气跑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蒋介石写信给陈炯明，指出陈之为人骄傲、违命犯上等缺点，希望陈炯明忠诚孙中山。陈炯明根本不理睬蒋介石，蒋介石信发十天之后，陈将蒋之信件原件返回，并在信封背面赫然写道：

“狂傲小子——嫉妒——暴躁——昏庸——自私自利的恶作剧者。”陈炯明的退信，激怒了蒋介石。蒋遂在上海向广州国民党要人频发函电，力主马上采取行动，驱逐陈炯明。一时间，广州驱逐陈炯明的舆论风言风语，遍布全城。胡汉民回信给蒋介石，指出广州的反陈流言，可能引起战祸。

事情发展到1922年6月18日，孙中山电报拍往上海蒋介石处，告之陈炯明叛变消息。

读完电报，蒋介石怒不可遏，愤怒地在地板上来回踱步，大声叫骂。暴怒之下，全身战栗。冷静下来，经过思考，蒋决定赴广州与孙中山共渡难关。6月20日，蒋介石从上海启程。历九天，抵达珠江。蒋介石见到孙中山时，孙中山泪水盈眶。之后，蒋介石接掌七艘炮舰的指挥，指挥全体避难人员闯过叛军的炮火向珠江上游退去。8月9日，孙中山赴香港，随后同蒋介石到上海。

为了集中力量消灭陈炯明叛军，孙中山决定利用直吴与皖段之间的矛盾，与皖系合作，利用段祺瑞势力驱逐投

直的福建军阀李厚基的时机，把留赣的许崇智等部，调往福建整训，然后伺机回粤讨逆。1922年10月，根据孙皖同盟的协议，许崇智、李福林、黄大伟等部在驻闽皖军王永泉部的配合下，多次打败了李厚基及增援的直军唐国模部，迅速占领了福州。并奉孙中山命，将北伐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黄大伟、李福林为第一、三军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计划取道闽南进攻潮汕。

早就密切注意着北伐军余部动向的陈炯明，见北伐军余部竟然在短期之内，攻破闽垣，声威大震，若待其布置既定，而始派兵堵其还粤，则势必难以防御。因而必须乘北伐军喘息未定，先发制人，派兵堵截，占据河漳，方能克敌制胜。为避免闽、桂双边同时开战，以分散实力，陈炯明提出了西和东战的策略。根据这一策略，陈炯明一方面派人分赴南京和北京，以疏通吴佩孚、曹錕、齐燮元和黎元洪，谋任两广巡阅使职，企图凭“巡阅之虚名，庶以后联结桂系”，而暂息来自桂边的隐患。另方面，陈炯明亲自秘密与直系军阀勾结，以争取直系军阀的继续支持。为迅速摧毁陈炯明在广东的军阀统治，孙中山认为东路讨贼军整补需时，难以立即回师广东，因此，计划以西路讨贼军先行东下讨贼。1922年12月26日，受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任的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杨希閔、中央直辖桂军第一路总司令沈鸿英、中央直辖佳军第二路总司令刘震寰以及拥护孙中山的粤军等各派代表，在广西大湟江白马庙

举行会议，会商讨陈战略和合作问题。“白马会盟”决定：滇军全部，由大河北岸，经人和直出梧州，进入广东；桂军刘震筹部由江南岸，驱逐藤县之敌，直取都城；桂军沈部担任攻击府河一带。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以兵力占绝对优势的陈炯明叛军，在滇、桂、粤联军的进攻下，竟然溃不成军，不堪一击。

1月16日，滇、桂、粤联军进入广州。20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魏邦平为广州卫戍司令，并以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邹鲁为全权委员，代行总统职权。陈炯明在广东建立的军阀政权，宣告彻底垮台。

腥风血雨中建立的蒋家王朝

蒋介石双喜临门：美人与权力

蒋介石自 1922 年 8 月 12 日辞职后，即回奉化故乡小住。他到澳回后，即移住雪窦寺，每天都有不少人前来拜访，当然也有外国记者。据说他有意出国考察五年，然后回军政界理掌中枢。

1922 年 12 月初，蒋介石参加了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家里举行的一次基督教晚会，会上蒋介石初次遇到了宋美龄。她那娇小的身材，娟秀的面庞，伶俐的神态，简直把蒋介石惊呆了。从此之后，蒋介石发誓“非美龄不要。”

蒋下野后，决心向宋美龄求婚；乘此机会，办成与宋的婚事。便于求婚前写信试探：

“余个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个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如举

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凸视之，谓如何耳？”

蒋决定赴日之时，先向宋家求婚（宋太夫人当时在日本神户），定下婚事后，再办对外事务。9月2日，蒋偕张群由溪口出发赴上海。次日到上海后，胡汉民、吴稚晖、何应钦均来拜访。次日，乘“上海龙”赴日，立即前往云仙。在仙台他表示将出游欧美。但日本政府不相信他能到欧美去。他发表了谈话：“余此次来日，乃欲观察及研究十三年以来进步足以警人之日本，以定未来之计划。”亦表示要与日本友人重温旧好。10月3日，他乘火车到神户，已有很多人举着青天白日旗到车站欢迎。然后又与宋子文一同到有马温泉大旅社。蒋到日本后又曾先电宋太夫人，得允婚后，蒋才到神户有马温泉大旅社拜见宋太夫人。并表示本人对基督教也有信仰，今后更当信奉该教。宋太夫人当即允婚。他很顺利地通过了岳母这一关。

这一年，宋美龄三十一岁。她生于1897年3月5月（光绪二十三年旧历2月12日）蒋介石正是四十一岁，相差十岁。这对蒋来说，真是高兴极了。据中川龙夫所著《蒋介石总统逸事之地》说：“刚由隔壁宋大夫人房间回来的蒋总统，显露平常所没有的兴奋神情说：‘老板娘，成功了！成功了！婚约成功了！哦！对了！给你写字吧！来！来！马上替我磨墨。’好像等不及把墨磨好，就乘兴挥毫了。”这自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非同一般，当天，就将订婚戒指送上宋太夫人。

蒋介石追求宋美龄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他想要成为中

国的军事领导人，并且要将全中国统一于一个政府之下。显然，光有军事力量而没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是不能成功的。早在上海搞股票投机生意时，蒋介石就深知江浙财团的重要性。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的重要性已人人皆知，而宋家大小姐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更是著名的大财阀之一。他深知有这个大财团作后盾，对他将来统一中国将会有多么重大的作用！所以，他必须穷追宋美龄，把宋、蒋联为一家。

与宋美龄订婚后，蒋开始了在日本的漫游，并开始在日本的社交活动。10月11日他记有分析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日记：

“日本对华政策之错误：

- （一）以为中国革命成功，其东亚地位动摇。
- （二）利用中国南北分裂，从中操纵。
- （三）利用无知军阀，压制民众。

其政治家之识力，乃如是乎？

13日又记：“研究日本对华方针，归纳其观念共五点：

- 一，满蒙经济发展。
- 二，满蒙为日俄战争所得来；日俄之战，为东亚存亡之战。日本之侵略中国，即基于此观念之误，而漠视中国革命进步之环境。

三，投资满洲交通实业，谓中国人皆受其惠。

四，不在政治上吞并满洲，致担负义务。

五，须保留其在满洲之权利。

他对日本的对华政策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是深刻的。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是始终不忘侵略二字，但又从不承认，一边掳你的财物，一边大讲友谊和帮助，蒋对此是心中有数。并且对于日本特意制造中国内乱和分裂，进行了抨击。但是蒋以后也成了内乱的军阀，“先安内而后攘外”了。这改变的动力，是他的君位独尊的权位观。

11月5日下午，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田中私宅会谈约两小时。蒋之翻译为张群。这次会谈，是蒋第一次见田中。蒋很重视这次会谈。这时田中已上密奏与天皇，即《田中奏折》已经出手。这个奏折是日本侵华的纲领。会议是在争论中进行的：

蒋：“中日两国将来之关系，可为决定东亚前途之祸福，阁下以为如何？”

田中：“愿先闻阁下来日抱负。”

蒋：“我的意思有三点：

第一，中日必须精诚团结，以真正平等为基点，方能共存共荣；此则须视日本以后对华政策之改善，不可以再以腐败军阀为对象，应以求自由平等之国民党为对象。换言之，不可在中国制造奴隶，应择有志爱国者为朋友。——必如此，中日乃能真正携手合作。

第二，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助之。

第三，日本对中国之政策，必须放弃武力，而以经济

为合作之根本。我此来贵国，对于中日两国之合作政策，甚愿与阁下交换意见，且希望获得一结果，希望以友朋敬之。”

田中：“阁下应以南京为目标，统一长江为宗旨，何以急急北伐？”

蒋：“中国革命志在统一全国。太平天国之覆辙，不可再蹈乎？故非从速完成北伐不可。中国如不能统一，则东亚不能安定，此为中国之大患，亦非日本之福。”

田中闻此统一中国之论，勃然变色，表现出日本军阀将设法阻止中国革命的进行和统一。接着田中作答。

田中：“为了先要使长江以南的基础巩固下来，似可以不必急于北伐，而专心于南方统一，如何？”

蒋：“如果不继续北伐，则南方反而会有发生祸乱之虞。”

对于中共问题，双方意见一致，“都认为非予清除不可”。

经与田中会谈后，落在日记中写下当时的感想，认为田中毫无诚意，一定会阻挠中国革命的进行和中国统一。他于当日日记中说：“综核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更灼然可见矣！”

他对田中的认识和分析完全正确。但他未对他与裕仁天皇的默契有丝毫披露。故此日记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内心

活动。

这期间，唐生智被李宗仁击败下野；李宗仁又于9月16日组织中央特委会；但不能团结汪精卫以及其他国民党元老，遭到两者反对。汪即致电蒋介石请其回国，以取代李宗仁桂系势力；冯玉祥、阎锡山均感奉军压力太大，也需请蒋归来，领导全军，对李宗仁等人不表拥护。而蒋也认为讨伐大业，必须迅速进行，以防日本干涉，故以汪、冯通电为由，决定返国复职。11月8日自神户登轮回上海。

11月10日下午1时，蒋回到上海。这时宋太夫人和宋美龄已先期一个月自有马温泉回上海，正在筹划婚事；11月26日，刊登结婚启事，定于12月1日举行婚礼，下午3时，蒋于宋宅举行基督教婚仪，由牧师余田章主持。观礼者只有少数近亲。然后于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结婚典礼。证婚人为蔡元培，介绍人为谭延闿、王正廷。此时蒋的第二个妻子陈洁如正孤独地一个人留居在美国。

婚礼场面上，中堂悬挂孙中山先生大幅画像。像两面为党旗和国旗。下午4时50分蒋和宋各同孔祥熙、宋子文作各自俟相出场。蒋和宋先向孙中山画像一鞠躬，然后向党旗、国旗各鞠一躬。主婚人宣读结婚证书后，蒋、宋互相一鞠躬，再向证婚人一鞠躬，最后向来宾鞠一躬。躬毕便在美国男高音歌手霍尔唱的《哦，我答应你》的歌声中，双双通过彩带鲜花组成大钟下面。这时彩带拉开，千百朵玫瑰花从空而降，撒落在蒋、宋身上。蒋和宋美龄便

在乐声歌声和花丛中退出，乘车回西摩路换装。

蒋为此次结婚，快慰异常，此时宋庆龄正在莫斯科，听到这个消息后甚为不悦，因为宋庆龄对蒋介石之所为，深为反感，故未致祝贺。

李宗仁则对蒋的得意忘形颇为不满，认为为一女而忘掉“数万革命烈士”，故一气之下不予送礼。

对于蒋宋联姻，国内外政界、新闻界、史学界多有评论，现举几例以见一斑：

《大公报》创始人之一胡霖分析说：

“蒋介石的再婚，是一项有预谋的政治行动。他希望藉此赢得孙逸仙夫人和宋子文的支持……蒋介石也开始觉得有必要寻求西方的支持。娶美龄为妻之后，他便有了与西方人交涉的‘嘴巴和耳朵’。此外，他非常推崇子文是一个财政专家。但如果说蒋介石不爱宋美龄，那是不公平的。蒋介石显然把自己看成是英雄。在中国历史上，英雄爱美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了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还有一位外国历史学家唐良利评论说：“蒋介石渴望全盘继承孙逸仙的遗产，不容别人分享。”就连宋庆龄也认为宋美龄同蒋介石的婚姻是“有安排的。”斯诺报道说：“在我第一次见到庆龄时，她说对这个婚姻，双方都是出自机会主义，没有爱情。”10年以后，庆龄又同斯诺讲到这件事：“开始并没有爱情，但是我认为现在有爱情了。美龄真诚地爱蒋，蒋也真诚地爱她。”“要是没有美龄，他

的情况大概会糟得多。”

《宋家王朝》一书的作者西格雷夫，较为全面地评论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合的原因。他写道：

“不能看轻孙逸仙的形象的重要性。他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半神化的人物。……政治家或将军只要同孙有一丝关系，也就带上了某种神奇的色彩。……青帮的阴谋是，蒋必须能把自己打扮成孙将士的世俗代表，是接受了孙的超自然的重托。”

“如果说通过同宋家联姻使他得到孙博士神秘的权威是十分重要的话，那么得到西方财政和物质支持也同样重要。蒋极需西方支持他的政权。青帮不能承担他的全部费用，敲诈勒索总是有限度的。……他需要一个有保证的岁人来源。虽然光靠外国援助决不能支撑住他的政权，但它是南京赖以维持的几个支撑之一。”“蒋得到外国财富——私人的投资资本和外国政府的官方援助——的捷径是通过宋家，特别是宋子文。宋子文在外国银行、外国公司、外国政府和诸多。在华盛顿有影响的美国传教士组织之类的特殊团体中，有一定的声望。”西格雷夫写道：“宋氏家族同孙逸仙有直接关系，能得到外国的财政支持，宋子文和孔祥熙还可以在财政上作出贡献。”

蒋宋联姻，把孙、宋、蒋三家联系起来，真是一举多得。蒋介石又何乐而不为呢！

宋美龄为什么要嫁给再婚的蒋介石？

原因大概有三个：

一、宋美龄自幼崇拜英雄，成年后希望借助一位铁腕人物的权力来施展自己的抱负。司马春秋写道：“和一个看来命定要统一中国，并把它提高到大国的地位的人物共同生活，这种前景可能吸引着宋美龄，她知道蒋中正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美国作家埃米莉·哈恩在《宋氏家族》一书中说：“如果说美龄嫁给总司令是出于一种义务感，那是不公平的，因为她绝不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不过她确实期待着能够协助蒋介石统一中国，这无疑也是她与蒋介石结合的原因之一。”

二、宋美龄觉得蒋介石有军人气质，她曾在给外国友人的一封信中说：蒋介石“具军人的胆略，又有词客的温柔。”

三、宋美龄也考虑到宋氏家族的家族利益，借助蒋介石的权势，使宋家兴旺发达，成为统治中国的大家族之一。

蒋之蜜月，是于山光潮影之间度过的，婚后第三天，12月3日，中央执监委员三十多人在他的新居上海拉都路311号举行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汪精卫亦从广州来沪参加。李济深同来。会议一致要求蒋介石复职。同时议决和苏联断绝关系，将俄领事馆、商业机关一律封闭。蒋说，革命成功后，再与俄国复交；而革命成功以前一定要与俄国断交。

1928年11月15日，张发奎、黄演翔举行广州兵变，进而举兵入桂，欲平广西。正当此时，因广州空虚，前第

四军将领叶挺、叶剑英在张太雷领导下，于11日举行广州起义。张、黄二人狼狈回军镇压，李济深听说后，十分气愤，知是中了汪精卫欲占领两广重立中央的阴谋。汪精卫遂成众矢之的。这时陈济棠、徐景唐、钱大均和驻福建的蒋光鼐第十一军，桂省第十五军，分路向广州出击，围攻第四军。张发奎、黄演翔辞职，朱晖日任第四军军长。双方战斗激烈，为粤桂人所痛心。结果第四军惨败，汪之梦想完全破灭。于此情况下，汪精卫已完全无资格领导中国国民党，又因李宗仁南京相逼恨犹在心，便大力鼓吹迎蒋复职，自己只言人旁相助。25日，汪宣言隐退，旋出国赴法。汪氏一走，蒋介石成为第一号中国国民党人，地位远在李宗仁之上。而且上海财界也不支持李宗仁，拒绝贷款给李、白的“特委会”，李、白自然难于支持。加之冯玉祥、阎锡山未被南京特委会委以重任，当然也不支持李、白等人。因此，蒋介石复职已成定局。

中共的起义和暴动，使本来宁汉分裂的南京政府雪上加霜。由于中共有影响的起义都与武汉有关，尤其是南昌起义主力秋收起义主动，原都是武汉的军队，这样就把汪精卫摆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在国民党内部，由于汪氏的客共而导致的这种后果的议论，更是置汪精卫于众口指责的地位。汪氏一走，武汉方面更无力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了。宁粤双方两败俱伤，谁也控制不了局面，而这正是蒋介石重新上台的好机会。

1928年元月2日，南京政府致电蒋介石。电云“……

请立即旋都复职，共党革命全功。“元月4日，蒋自沪赴宁。同行者有谭延闿、杨树庄、何成浚、陈立夫等人，因沿途各站有人欢迎，傍晚始到南京。7月蒋正式复职。向国民政府呈报复职书。

2月2日，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丁字桥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出席的中央执监委员共二十九人，蒋与谭延闿。于右任等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蒋代表主席团发言，蒋望望主席台，声若洪钟，说到筋骨处，叱咤叫喊，旁若无人，完全陶醉个人的成功和对权力的欲望之中。最后顾目四周，特别强调说：“可以说今天的会是本党中央的一个会，亦是中国中央的一个机会。”在这个会上，正式结束了孙中山联共联俄政策。凡是以前与联俄中共有关的政策，一律取消。

此次选出军事委员会委员七十三人，蒋任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与常委蔡元培、李烈钧、张人杰、丁惟汾共同主持政策。蒋又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谭为无权圆滑人物，蒋则大权独揽。同时设立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主席。此时云、贵、四川各省军队，亦先后归附，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务军。只有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为征讨对象，形势较先更为有利。

蒋以闪电旋风的速度爬上了党政军的最高位，出其不意，坐视汪桂争斗而渔人得利。

这一次较量，李宗仁、白崇禧遭到彻底的失败。而蒋介石冷眼旁观，仍为众望所归；以致汪精卫肯拥蒋也不支持李宗仁；其他元老们也是如此。这说明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人仍斗不过蒋介石一人。这是蒋氏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胜利（第一次胜利自然是“中山舰”事件）。

2月13日，蒋介石重新编组国民革命军为四个集团军。总参谋长为何应钦。蒋从此取走何氏兵权。

政局的混乱和战事的紧迫，在客观上为蒋介石重新提供了良机。蒋下野后，一直积极活动准备重新登台。与宋家的联姻，东渡扶桑，在得到日、美、帝国主义支持之后立即返回国内，利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抓住了时机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

蒋氏复职后，“CC”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中央执委会组织部于1927年设调查科。1935年调查科升编为调查处。1938年，由陈果夫、陈立夫负责中央调查统计局。以二陈的英文拼音的第一个字头为C，仍称“CC”。不过这个“CC”已不是“俱乐部”而是特务机构的代称，也就是“中统”的代称了。

蒋介石夺权之后，他的目标就转向了北伐。

张作霖被换马已势在必行

1928年4月16日，日本驻济南陆军武官酒井隆少校即呈请日本军部出兵中国。青岛总领事济南总领事于同时向日本政府建议马上出兵中国。他们说：“出兵时期，业已到来。”4月17日，日本政府举行内阁会议，由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提出出兵山东议案，即时通过。

4月21日，国民政府由外交部长黄部署名，对日本田中政府提出抗议，谴责日本出兵中国为分割中国领土主权，践踏国际公法的不法行为。

同时派张群前往日本，负责和日本政府交涉。张群知道田中义一不会有什么诚意，便通过日本朋友们进行疏通。但是田中不同意讼请外交途径解决。在日本留学的主官学生们，也为日本政府的干涉和出兵举行抗议运动。曹瑞群等二十五人更以退学回国表示强烈抗议。25日，田中同意派松井石根到济南进行交涉，张亦归国。中国反日情绪更是高涨。各报均刊载抗议和谴责文章。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软弱，致使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当5月1日北伐蒋军开进济南时，日军挑衅闹事，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3日又向中国军队驻地大举进攻，收缴了国民党军队的军械，而蒋此时却命令部队不准进击，撤出济南。日军在济南奸

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达一万余人，这就是济南惨案。

但蒋介石却一再忍辱偷生。一面又说：“如有一毫人心，岂能忘此辱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

因此，日本军国主义者更视中国如无人，而“九·一八”、“一·二八”、“华北事变”、“七·七事变”，接踵而来，欺人于不能抬头之辱境，最后终不免于一战。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于讨桂，讨冯、阎，“剿共”之战，则是接二连三，勇往直前。咄咄逼人。其对内对外之姿态实有天壤之别。愿吾中华子孙，能从此接受血的教训，内而为统一祖国，开诚相见，心心相连；对外强之压迫，当同胞共济，团结如一，全力反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不让，寸利必争，虽一同胞而受损受辱，亦必使强敌受到实质性惩罚。如此则任何强国亦不必小视于我。否则一让再让，则终至于论亡。悲能大矣！

1927年，日本天皇欲不费一枪一弹而获取我国东三省，为此发动了一次外交攻势。天皇裕仁的党羽，在中国和蒋介石进行了秘密磋商。裕仁提出支持蒋介石反共，但要蒋只统治长城以南的中国领土；长城以北的满蒙地区则由日本控制。等蒋介石的个人的统治建立后，裕仁还希望蒋把西方的企业家赶出上海，以独占中国。

蒋介石虽口头答应了裕仁的要求，但并不甘心卖国，在他看来，口头答应只是策略问题，裕仁则认为这项计划已经成功，就着手进行第二步计划，即实施占领东三省计划，叫张作霖不得干涉。这就是放弃张作霖，利用蒋介

石。为此，他需要一个更强硬的日本内阁，于是裕仁选取了田中义一组阁，来推行他的强硬的侵华政策。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日本外交要由裕仁的小集团少壮军人和阁员负责。

当裕仁集团正准备侵华报告时，田中义一已劝张作霖从华北撤回东北。张则非常生气，他愤然地质问田中：

“我自己向北京进军，并正在向共产党势力开火。我进行的战争就是日本要打的战争。尽管事实是这样，但日本帮助已经赤化的蒋介石，又劝我回满洲去，叫我如何能相信日本的诚意哟？”

张作霖已知日本要转而支持蒋介石，他已不再相信日本，便独立地自行其是，欲在军事上摧毁国民革命军，以保己位，使日本无法换马，也无法将他抛弃。这时，蒋介石为使日本不以武力干涉他的北伐（仍怕日本武力），便假意答应裕仁条件，而张作霖又深恐自己失败被日本放弃和踢开，就独立行事，向南京进军，而不能互相团结，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这真是中国之大悲剧。双方均以依靠外国为立足点，便必然对外屈服，而对内火并，如同木偶之受制于人，令人痛心不已。

张作霖安国军向南京进军时期，日本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自6月27日至7月7日），参加会议的是各地殖民总督、驻中国公使馆请报人员等。7月25日，田中义一根据东方会议的精神，写了一个奏折，上奏天皇，提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

个《奏折》，是田中上奏的，是东方会议的精神，也是裕仁的意思。

田中欲保留张作霖统治东北、作为傀儡，他对他的“老友”张作霖显然更为信任。但裕仁则要换掉张作霖，欲完全占领东三省。在这个问题上，裕仁天皇和田中首相发生了矛盾，田中坚持不让步。故当蒋介石于本年12月在日本访问他时，他明白表示，反对蒋介石打过长江。并以后于1928年派兵于济南制造了大惨案，企图使蒋屈服。蒋因和裕仁有以长城为界的暗诺，就强抑忍辱，继续北上。

蒋介石进军的胜利，使裕仁急于换掉张作霖。1926年5月18日，天皇授意向关东军（侵驻我国东三省军队）发出一道命令，准备夺取东三省铁路系统，如张作霖军队撤回关外，就解除其武装。当然这无疑是很困难的。田中义一坚决反对。最后，裕仁又改变主意：炸死老张帅，控制小张帅。因为他认为，张学良很敬佩蒋介石，可以理解蒋介石和裕仁的默契，而甘当日本傀儡，又会和蒋介石和睦相处。这就是裕仁天皇的如意算盘。

决定此计之后，裕仁就委派裕仁党羽建川美次少将执行。他这时在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任职。建川应即派随员到东北送计划给关东军司令官。河本大作主动要求执行这次爆炸任务。建川又命田中隆吉大尉，于北京火车站调车场了解各车次与线路情况。5月30日，田中隆吉向河本发出电报，告知张作霖的车次。

张作霖因怕出意外，就专门找来闲院官的思仆义贺信也少佐陪同坐车。他以为有他在身边可保无虞。但义贺于爆炸前夕，就逃出了张的车厢，跑到公务车上躲避起来。结果张作霖等被炸死，他却安然无恙。

日本人放弃了张作霖， 东北问题是个隐患

绕过济南，蒋介石的北伐军第一集团第四军团沿津浦东沿北进。第二军团掩护第四军团渡河，沿津浦西侧北进。第三军团向德州东北进击。

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在长清，平阳渡河，向德州攻击前进。

第三集团军占领石家庄。并和第二集团军并进保定。第二集团军张维空军 7 日到山东武城，和刘镇华部共向德州北部前进。第一集团军扫荡德州以南敌军和孙传芳残部。

北伐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于 6 月 1 日命令各军全线进攻。同日，白崇禧部自保定北上，直捣北京。6 月 2 日，津浦方面北伐军占领沧州。6 月 1 日，张作霖离北京，并向蒋发电讲和，共同对日，4 日晨 5 时 23 分被炸死于皇姑屯。北京由王世珍维持治安。张宗昌、孙传芳部向天津东北退却。9 日，蒋上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文。11 日又上辞

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职呈文，表示自己功成身退之意。这当然是表示谦让，但并非出自真心，更是欲进而退，以退求进。同日，阎锡山和白崇禧一同进入北京，阎就任平津卫戍总司令职务；傅作义任天津卫戍司令。

6月21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改北京为北平，与天津同为特别市。

张作霖被炸死，东三省受到了强烈震动。在危难之际，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稳定了东北局势，但摆在张学良眼前的，只有联蒋抗日一条路可走。

7月1日，张学良电告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表示东北军绝无妨害统一之意。并希望速开国民会议，解决目下一切问题。

于是蒋决定北上，蒋到北平时，前门车站高招彩棚迎接蒋氏，以阎锡山为首到车站迎蒋。当时蒋着军装，披黑披风，留有短髯，风度翩翩，与新夫人拾成一对“神仙眷属”。

第二天，蒋与冯、阎、李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此时，蒋于孙中山灵前“抚棺偷哭”，冯、阎、李也频频抹泪。蒋谒陵后，即居含青舍，自言“不忍远离吾师之灵体也”。他对棺感怀，一倾此前各种艰困和此次下野之苦衷。他对孙中山是有较深感情的，尤其黄埔重任，使蒋自此掌握了国民党军权的命脉，从而才有今日之荣耀。

收复平、津之后，余下的就是东北问题。为了接受

“济南惨案”的教训，落在北平善后会议中决定和平解决东北问题。但会中冯玉祥、阎锡山二人则认为东北军群龙失首，可以一举歼灭。即报以住夙怨，亦可平定东北，蒋心中自有打算，决定和平解决东北，东北易帜之事遂定。

但东北易帜并非一帆风顺，日本从中作梗，对张学良日益加强高压政策，坚决阻止张归顺中央。

7月19日，田中派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送张学良一信，内容为：

（一）南京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殊无与其联系之必要。

（二）如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

（三）如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之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这是明显地把东北当成日本“保护领地”或附属来对待，田中严然以宗主国自居。对此，张反问林久治郎：“是否可以将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报告？”林久治郎无言以对。最后张又补充一句，“东三省政治一以民意决定。”

蒋得知消息以后，通电张学良：“外人干涉内政，勿再为所愚。”但在日本的威逼引诱之下，张学良终于又将原定于7月24日易帜日期推迟。

张学良对此严重事态，也不得不加考虑，便召开东北保安委员会，于8月13日，决定延期三个月易帜，以为缓

冲之计。日方所以有如此强硬和咄咄逼人之态，是因为事前田中义一有文件指示，张学良如不听话，就予以威吓和搞垮张学良，重建亲日的东北政权。

8月13日以后，易帜之事暂时搁置。双方进入加强实质性关系阶段。10月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依照国民政府组织法，改组国民政府，成立五院。选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10日蒋于中央大礼堂宣誓就职。发表立国大纲：

- 一、发育国民强毅体力，以挽救萎靡文弱之颓风。
- 二、保持中国固有之德性，以铲除苟且自私之恶习。
- 三、光科学必须之常识，以辟除愚昧遮蔽之迷信
- 四、灌输世界最新之文化，以力求国家社会之进步。

以上为蒋氏治国之大纲，其根本原则，一直未变。蒋介石为了使张学良及早易帜，决定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有人怕张学良不就职。蒋则认为不就也不妨，更可以借此揭露日本对东北阴谋。但张学良则很快表示接受任命。但易帜之事，仍无音讯。拖到12月29日，张学良乘日本不备，断然易帜，在全东北改挂青天白日旗。并发通电云：

先大元帅临终以力主和平，促成统一为嘱。……

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某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蒋介石即电复表示嘉慰。这一天上午7时东三省易帜。张学良又接着在省府大礼堂举行易帜典礼。中央派方

本仁监誓。欧美各国领事也均应邀参加，惟独日本领事未到。接着张学良发表讲话。他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效法某先进国的作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害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志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

这个所谓某先进国，也就是指日本。12月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并将热河省加入东北，成为东四省。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官。

东北易帜后，日本政府极为恼火。12月31日傍晚，林久治郎秉承田中义一意旨，拜会张学良，林捶着桌子责难张学良“突然易帜，等于宣告断交。日本方面现在看你的态度，必要时有采取断然措施的可能。”张学良则答以“没法子”。林则逼迫张学良答应日本在满蒙建立铁路的权益。张答以外交属于中央，予以推开。这是天经地义的作法。对此要求，中国政府当然不能答应。

11月，国民党又撤销军事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改设国民政府之下的军政部、参谋一部、训练总监部。1929年改海军署为海军司令部，增设军事参议院。军政部长为冯玉祥；参谋总长为李济深；训练总监为何应钦；海军总司令为陈绍宽；军事参议院长为李宗仁。

国民政府主席府又设有参军长（何成俊），辅佐蒋介石办理军务。

至此，蒋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国民党三大：蒋家天下陈家党

国民党早期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政治上多元性和分裂性。国民党内部派出林立、矛盾重重，各派之间勾心斗争、尔虞我诈、权势相倾，以至混战不已。在变幻离合的角逐之后，蒋介石集团确立了它在国民党内部的优势地位，但国民党分裂性的特点仍然存在着。

宁汉合流后，经过半年多的角逐，到1928年2月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前后，国民党内并存的实力集团便剩下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派。蒋控制中央，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阎、李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他们在反对旧军阀的大目标下，形成暂时的联合，并取得二次北伐占领京津的胜利。但是，当奉系势力被赶出关外后，由于共同作战目标的失去，由于蒋介石排斥异己和其它集团也各怀异志，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立即尖锐起来。

矛盾从地盘、军队、党权三个问题上表现出来。

当时国民党各派占据地盘的情况是：蒋介石据有南京、上海及东南各省；冯玉祥据有陕、甘、宁、青、豫、鲁；阎锡山据有晋、冀、绥、察和平津两市；桂系据有两湖、广西。冯玉祥地盘虽广，但多为贫瘠之区，山东的济

南和胶东又在日人的控制之下；冯军在河北对奉军作战中出力甚大，冯本想能占有河北和北京、天津，但蒋介石采取联阎制冯的策略，在国民党军进入北京之前，就同阎商定由阎统辖这一省二市。对此，冯极为不满，加大了他同蒋的裂痕。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认为自己地盘小，又没有出海口，也对当时的地盘分配情况不满。阎锡山占有了河北和平、津，当然满意，但他要把平津两市税收全部据为已有，又为蒋所忌恨。

为了消弱其它军事集团的力量，国民党军占领北京后，蒋介石即提出裁兵的主张，大讲“裁兵救国”。1928年6月下旬和7月上旬相继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在宋子文的主持下，都把裁兵作为主要议题之一，经济会议专门通过了《请政府克期裁兵从事建设案》，1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全国编遣会议条例》，限定编遣工作于半年内完成。蒋介石借编遣军队之名来削弱他人的用心，非常明显，但他的节省军事开支以进行经济建设的理由，又使其它军事将领们不能公开反对。于是，全国编遣会议得以在1929年1月正式召开。

军队编遣会议正式成立“编遣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会长。会议从开始到结束，都大力强调“以至公大信精神”，“不偏私，不欺饰，不假借，不中辍”，而这正好反映了各派军阀的偏私、欺诈和他们之间的矛盾重重。争斗突出表现在势力最大的蒋冯两派之间。

当时四派拥有的军队，蒋50万，冯40万，阎20万，

李 20 万，另有东北军和西南各军，总计约 200 余万。蒋以“中央”的名义强调统一与集中，要求各集团军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长、萨、土、肥四藩“功成不居”、“归命中央”的精神和做法。冯玉祥则想方设法对自己的军队少遣多编。预备会上冯提出 4 项编遣原则：“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冯无疑是说第二集团军素质最好，训练最精，战功最大，理应少遣多编。据此，冯提出一个把蒋冯两军数额拉平而压低其它集团军数额的编军方案，但被蒋所支持的阎锡山的方案所否定。阎案抬蒋压冯，既提高自己地位，又离间蒋冯关系。至此，冯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他称病不再出席编遣会议，2 月初离开行政院副院长、军政部长职务，回到河南。编遣会议最后通过一个体现蒋介石中央政府意志的《国军编造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但这个大纲只是一纸空文。编遣会议加剧了各军事集团的矛盾，特别是蒋冯间的矛盾。

蒋介石在策划剥夺其它实力派军权的同时，又采取措施，加强他对中央的控制。编遣会议后，蒋介石操纵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规定会议代表以指派、圈定、选举三种办法产生，其中指派、圈定两项共占代表总数的 82%，地方选出者仅占 18%。这种一手把持国民党三大的做法，激起强烈的反对，特别是汪精卫、陈公博领导的改组派、发起了反圈定指派代表的运动。但会议还是于 1929 年 3 月下半月在南京召开。会议处分了汪

精卫的改组派和已公开反蒋的桂系将领，汪被书面警告，汪派的陈公博、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3年，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以及李济深也被永远开除党籍。会议又专门通过嘉慰蒋介石案。中央执委会，于3月底三届一中全会，选蒋为中央常委。4月8日，蒋被推为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叶楚论为宣传部长；戴传贤为训练部长，何应钦副。蒋操纵了中央常部。有一次中央党部开会，形成一个决议还不算数，陈立夫还说：“还得问问蒋介石的意思。”蒋这样一手包办了国民党三大，会后形成“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但是，蒋的权势愈张，被蒋排斥者的反蒋之心愈切。

混战终于一场接一场地爆发。

冯玉祥和李宗仁等，均对蒋不服气，他们共同憎恨蒋的地方，就是蒋太专断独行和偏私不公。例如对军队，他就只顾着他的部队，而不管其他各集团军的军需，只是利用他们。例如，李宗仁曾说北伐的结果，却换来了“蒋中正个人的独裁政治！”所以号召大家“踏着北伐牺牲的先烈血迹，去打倒蒋中正！”

同样阎锡山也谴责蒋介石独裁专权。“党国不幸三全大会指定过半数的代表，致使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变向为蒋氏一人三化身，走制独裁为所欲为……”

编遣会议一结束，李宗仁、白崇禧便酝酿反蒋。蒋、桂的力量不相上下，但桂系势力纵贯大半个中国，军事上缺乏纵深配备，极易遭截击，一旦有事，首尾不能相顾，

实为兵家所忌。李宗仁急欲完全控制要冲地的湖南，祛除内部隐患。湖南主席鲁涤平原为谭延闿的第二军副军长，以后升为第3军军长，为谭之嫡系。谭、蒋勾结得很紧，鲁就是楔入两湖的一个亲蒋卒子。卧榻之侧，难容他人酣睡，桂系驱鲁已刻不容缓。

此时李宗仁便秘密指示在武汉主持局面的第18军军长胡宗南，以武汉政治分令名义，作出罢免鲁涤平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决定。鲁涤平泞不及防，他仓皇逃离，率部撤入江西。桂军控制湖南。落在奉化得悉湘变消息之后，心中忿恨不已，但为避免打草惊蛇，对李、不动声色，“欲擒故纵”。

1929年3月25日，蒋介石撕下了宽容的面具，对李、白桂系明令讨伐。

说桂系“最大者厥有五项：

- (1) 投机取巧，以扩张一系势力；
- (2) 阴谋毒计，以消灭革命武力；
- (3) 挑拨离间，以分裂革命袍泽；
- (4) 贪残掠夺，以剥削民众利益；
- (5) 违背中央，以破坏中国统一。

蒋正式开始使用武力剪除桂系。

蒋介石削藩

蒋桂战争爆发之前，当时西方是支持蒋介石的统一战争的。1929年4月17日，蒋与美国签订了《中美航空邮务合同》；6月20日，又与英国签订了海军援助协定。他们均要依靠落在中国获取利益。航空合同允许美国经营自南京至汉口、北平，自汉口至广州的三条航线的邮政业务。并给邮件运输专利权。海军援助协定规定英国帮助蒋训练海军。

西方的许多学者，在评论蒋介石时，也多为蒋未完成军事统一中国而抱憾。如摩伊斯的《中国现代史》，（英文版）就有如此论调：

“他原可在公开战争中击败任何军阀，或其联合部队，但他没有力量在各战线中同时采取行动，以歼灭全国的军阀。他只得吸收军阀的部队而不去消灭他们。”

珍森在《日本与中国》说：

“日本进侵华的前夕，蒋介石正致力以军事统一中国，在军事战役进展中，他推进有效控制的地区。但是有些地区仍然抗拒到底。”

这些论调，都是支持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未想到民主统一中国，其实质性目的；是从蒋政权中获取特权和利益。只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最后避免内战。各军阀

相峙中，或者可以演化出民主政治，而统一的军事政府，则难以出现民主政治。

在编遣中，蒋介石既专制、独裁，又偏私而不顾舆论；对外帝国主义者，又百般屈辱忍让，不敢一争主权，确定也很难率众望，难于为人拥戴。当时和冯、李、阎比较起来，冯过于封建，阎略微开化，李宗仁则新思想较多，也宽厚得多，又深和新的潮流，实为蒋之最大对手。李如战胜蒋，或者中国局面会稍有不同。但李既无雄厚财力，也不善于广纳贤士；而阎、冯、李和唐生智又各怀异志，也不能完全齐心协力，一致对蒋，结果为蒋各个击破。这就是说，李、冯、阎以至于汪精卫，均斗不过老蒋。一个要削藩，几个人则反对削藩，新军阀的内战，终于又不可避免。

3月29日，蒋亲往九江督战。大战在即武汉方面主帅却均不在场，李宗仁困处上海，李济深被扣南京，白崇禧远在乎、津，黄绍竑据守广洲，正是群龙无首状态。故未经多少战斗，至4月4日桂军失败退却，李宗仁通电下野。残部退往鄂西和湖南。

同时落策动原唐生智旧部于平津地区突然袭击白崇禧。白崇禧于4月下旬匆匆返回广西。此时上海中委因反对蒋氏包办国民党三全大会，组织反蒋运动，倡言“护党救国”。李宗仁亦参加。就任二届中委所委任之南路护党救国讨贼军总司令职。8日向广东进军。东江徐唐响应李军；广州海军亦响应李宗仁。但5月21日，桂军进攻广州

失败。

局势渐趋于明朗。蒋介石解决了桂系之后，自觉无需再拉拢冯玉祥，于是不再履行讨桂之前的诺言，即向冯要两湖地盘及武汉政权。

这使冯玉祥难以容忍。

蒋介石又发表了《和平统一为国府惟一之政府》一文，宣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冯玉祥便致电蒋介石，指责蒋对一、二集团军发饷不公。蒋复电，谓“一集团军士兵向来生活水平较高，二集团军士兵向来生活水平较低，二集团军士兵习劳耐苦惯了”。蒋还利用特务制造谣言，攻击冯将攻晋谋出乎津，由外蒙勾对苏联，云云。

冯玉祥见蒋介石“削藩”要搞到自己头上，兵戎相见已不可避免。于是便采取果断措施，即刻令韩复榘、石友三从信阳、襄樊撤退，并炸毁武胜关隧道，同时令原在鲁、豫两省孙良诚、马鸿逵、庞炳勋向潼关以西撤退，并将洛阳以东的铁轨拆毁，以阻蒋方进兵路。冯计划在潼关、华阴集结兵力，缩短战线，并压迫阎锡山一道反蒋。

蒋介石感到冯玉祥的行动飘忽迷离，他知道冯玉祥要反，但为什么又向后撤兵呢？于是发份试探性电报，要冯玉祥赴南京共商国是。冯对蒋电置之不理。冯部将领刘郁芬等发出铣电，请冯“统50万武装同志，与蒋周旋。”

蒋即致冯电说：“我兄行谊磊落，众所周知，是何人斯，竟敢言兄之称兵叛党？吾甚怒之。此为诬弟不相容事

小，诬兄革命人格之罪大。”

冯玉祥通电成立“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反蒋战幕揭开。于是，蒋介石遂以“背叛中央”的名义开除冯玉祥的党籍，下达讨伐命令。

就在即将开战前夕，冯的心腹将领韩复榘满心迷惑，他在冯召集的华阴会上，说道：

“全军退入陕甘贫瘠之地，给养不足，怎么生存？况且，全军将士刚由贫寒地区打出，谁也不愿退入穷地方受苦，若为环境所迫倒也罢了，如今这是为啥？”

冯玉祥说出与蒋介石难以共存，蒋的下一个进攻目标便是我军。韩复榘一听，即向冯请缨率10万兵沿平汉铁路，攻取武汉，愿立军令状，如不成功，甘受死刑；并建议另由孙良诚率10万兵，沿津浦铁路直取浦口、南京；再以石友三统10万兵沿铁路线分驻郑州至徐州一带，作为韩、孙两路的总预备队；最后，留宋哲元、刘郁芬部在后方，严密监视阎锡山；如按此计划行事，必获全胜。

冯玉祥摇头认为这个主张太冒险，不予采纳。

韩复榘十分激动，面红耳赤，反问道：“当初五原誓师，人不足10万，装备也差，奋勇向前，不是成了大功？如今兵多将广，周倍于昔，枪炮军械，也是全国无比，何以不进攻而只退守？”

冯玉祥道：“以前本钱少，不得已而冒险；如今本钱大了，就得行万全之策。”

韩复榘又要求准许他的部队驻防洛阳至同阳一带。冯

也坚决不允许。

韩复榘是冯一手提拔起来的，韩在冯手下当过司书生、司务长等，成为冯的亲信，被人称为冯的“十三太保”之一。但韩在南口战败后，曾投降阎锡山。冯在五原誓师后，以宽容的态度将他召回，并表示既往不咎，但韩对冯存有戒心，韩复榘虽然作战勇敢，但当了河南省主席后，常瞒着冯去嫖赌玩乐，出巡时娶了个以唱坠子书闻名一时的女子纪甘青为妾。冯对手下高级将领管束得特别严，要求他们保持简朴的生活。他对韩的情况隐约得知，便在河南省府军政人员会上，不指名地批评韩说：“现在许多军政高级人员，生活很腐化，吸烟、喝酒、打牌还不算，有的人打了几个胜仗，自己以为了不起，你弄个唱戏的，他弄个说书的……”韩复榘对冯的管束很反感。

在蒋桂战时，韩的部队挺进到花园。他嫌河南省穷苦，想借机得到湖北地盘，当湖北省主席，想率部直扑武汉，冯却把他大骂一顿，说他“太不懂事”，令他原地待命。韩为此对冯极为不满，加上蒋介石的收买，使韩产生了叛冯之心。

韩复榘在华阴会议之后回到甘棠，满眼含泪说道：“把整个河南省放弃，部队全撤到潼关以西，这不是自取灭亡吗？以后我们吃什么？穿什么？靠什么激励将士跟着我们？”

韩复榘便联络在洛阳的石友三一起叛冯投蒋。

石友三当过冯的马夫、警卫，也是冯的“十三太保”

之一，曾同韩一起投降阎锡山。石友三胆较小，且多疑。他多年来战功赫赫，居功自傲，因未能列上封疆，甚为不满。他瞒着冯吸食鸦片，妻妾成群，一向追随韩复榘。蒋介石在蒋桂战争时，派钱大钧赴襄樊慰劳石友三部，给石30万元。石也接收了蒋的拉拢。

5月22日，蒋介石正在惊恐疑虑之际，忽接到韩、石表示投靠的电报，真是喜出望外，立刻复电嘉奖，并许所有驻陕甘部队概归韩指挥。派石友三为讨逆军第13路总指挥，立即送现款1000万元作为犒赏。又任命韩为河南省主席，石友三为安徽省主席。

韩、石倒戈时，冯住在华阴，最初听到这个消息尚不相信，等到证实以后，感到痛心无以复加，韩、石为冯的最精锐部队，二人一变，冯对于其他未倒戈的将领都失掉了信心，日夜哭泣，咒骂自己，不停地猛打自己的嘴巴，又拔出手枪欲自杀，幸被卫士抱住。

由于冯、蒋间隔着韩、石两部，而韩、石新叛离冯，不敢同冯部作战，战事暂告中断。冯受到意外的严重打击，于5月27日通电下野入华山。

真是祸不单行，冯部刚出了2名叛将，又有阎锡山来欺冯，将其骗去山西软禁起来。

老奸巨滑的阎锡山，看到老蒋采用各个击破的手法“削藩”，已对付了桂系和冯玉祥，眼下就会轮到自己头上，于是便施政治阴谋，扶冯自重。他委托原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与冯又有旧交的李书城，去见冯玉祥，劝冯同

阎一起出洋。冯遂决定离华山，偕妻女随李书城过黄河，赴山西。

冯到太原后，即同阎联名发出出洋通电。阎将冯安排在太原附近的晋祠居住，在太原给冯设立了办事处，还给冯安了对外联系的电台，每隔三五天，必去看冯一次，礼遇极优。阎常与冯商讨反蒋办法，同时也准备些出洋的服装用具。

蒋以为阎、冯结合在一起了，于是即派吴稚晖、孔祥熙去山西，劝阎不要出洋，并邀阎赴北平同蒋会面。

阎同蒋在北平密谈后，返回山西，再也不谈出洋、反蒋的事了。冯见阎迟迟不准备出洋，表示自己要单独出洋。但阎对冯说：“大哥，你如不等我，就叫我人格破产了。”

冯只好收回单独出洋的打算，这正好中了阎将冯软禁在山西的圈套。冯在晋祠住了3个月后，移至五台县居住。10月5日，阎又将冯迁移到建安村，并在冯住房周围、房顶上部署了武装岗哨，村外围有铁丝网。李书城因为是奉阎委托劝冯来山西的，现在冯被阎软禁，李心中不安，决心陪冯一同“坐监”。

冯要见阎，阎总托词不见。冯忍无可忍，有一天坐上汽车开出建安村外，声言要去太原见阎。卫队师师长杜春沂阻拦无效，跪在冯的车前，求冯不要出村，冯怒而不理，仍命开车前行。杜赶忙电话令沿途驻军，把公路挖了一条大沟，使冯的汽车无法通过而被折回。冯怒发冲冠，

大呼上当。冯的私人医生陈崇寿同冯的身材相貌有些相似，冯计划化装成陈崇寿出逃，后感到这太冒险而作罢。

阎锡山备有两套人马，一套专接南京代表，表示竭诚拥蒋；另一套则专接各方面的反蒋代表，大谈其关于以阎、冯为中心的反蒋问题。南京来的代表人物越大，蒋介石给的代价越高，则看守冯玉祥的部署就越紧；南京代表离开后，看守冯玉祥的情况就稍松些。冯本想联阎反蒋，反被阎作为人质而软禁起来，被阎作为政治上的法码来要挟蒋介石。

蒋、冯中原大战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将领看到阎锡山趁火打劫，非常愤怒，就活动通蒋压阎。8月间，代理冯玉祥任军政部长的鹿钟俄、外交次长唐悦良、卫生部长薛笃弼，应蒋方邀请去南京复职。冯部宋哲元派他的参谋长陈琢如去南京见蒋介石，弄到一些给养补弃。阎锡山见此情形，大为着慌，深怕冯部将领与蒋恢复了往来，惟恐对自己不利，便急忙改变手法，在中秋节之夜赶往冯的住地，非常客气地拜见冯玉祥，答应与冯联合反蒋，让冯命令西北军先发难；山西的部队马上跟上。

在阎锡山的鼓动下，冯立即电令宋哲元、刘郁芬等克期举兵。阎锡山又派人和冯部将领接洽，答应对冯军粮秣

等方面充分供应，信誓旦旦。冯部官兵早已看透了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毒辣手段，在阎锡山的鼓动下，酝酿讨蒋计划遂起。宋哲元一面应付蒋介石方面派来的编遣委员，不露痕迹，一面调动部队暗中准备；同时电告南京的鹿钟群、刘郁芬等脱身赴沪。

10月10日，西北军出兵潼关，讨伐蒋介石。这次由刘郁芬、石敬亭、宋哲元、孙良诚等27位将领联名通电讨蒋，宣布蒋介石毁党、误国等6大罪状。推戴阎锡山、冯玉祥为总、副司令。冯部所有军队共编8路，分路出发，各将领公推宋哲元为西北军总司令，孙良城为前敌总指挥。

蒋介石大怒，以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讨冯誓师词》，大骂冯玉祥：“好乱成性，勾结暴俄、祸国殃民。”

双方在交战中，西北军连打胜仗，进展甚快。蒋介石一面对冯部用兵，一面派人到山西拉拢阎锡山，命令阎锡山部属朱级先代理军政部长职，阎锡山立即作了反应，于10月15日电南京政府，表示对宋哲元等人的行动，当尽力制止。这完全暴露了阎锡山反复无常两面三刀的态度。

由于阎锡山将冯军的军事机密向蒋报告，并接受蒋介石委任他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命令，冯军受到阎锡山和蒋军的夹击之中，失败终成定局。11月21日，在郾城督师的蒋介石因需要回南京主持对广西方面张发奎、俞作柏的战事，电请阎锡山赴郑州坐镇指挥对西北的军

务，令唐生智代理总司令职权，进行善后事宜。至此，反蒋军事暂告一段落。

被软禁在建安村的冯玉祥，得知因阎锡山背约，使西北军 20 万官兵陷于绝境，愤而绝食，冯绝食 100 余小时，经李书城等苦苦相劝，才复食。12 月中旬，冯玉祥强烈要求亲往太原当面责问阎锡山，被阎派的驻兵拦车挡回。

鹿钟麟化装成某要人的勤务兵，随某要人入建安村见冯。冯将用米汤在《三国演义》书内密书手令交给鹿，即免去宋哲元的代总司令兼职，另以鹿钟麟代理总司令职务，并令宋哲元、鹿钟麟等部将：“勿以我为念，设法联合韩复榘、石友三部，甚至不惜与南京方面修好，对付阎锡山，救他脱险。”

鹿钟麟返回冯军总部所在地西安，立即提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口号，冯亦派员向中央大员报告蒋冯战争的真相，使蒋得知阎是阴谋挑起冯军第二次反蒋的祸首。蒋即派人向西北军表示，希望“合力倒阎”，蒋还致电阎锡山“恢复冯之自由”。鹿密派代表赴南京见何应钦，表示：如能给一批军火，即愿开往山西讨阎。这与蒋介石“联甲制乙”政策相符，因此一拍即合。鹿又派人与韩复榘、石友三联系，韩、石两人回话：“阎锡山好使用权诈，搬弄是非，如不把他打倒，国家就不会太平。”

蒋的“削藩”使阎不寒而栗，加上历年来各方的反蒋活动大都与阎有牵连，使阎担忧。蒋、阎矛盾日益尖锐。这时，占据北平的唐生智又率部讨蒋，想争取阎的支持。

他吸取冯的教训，要求阎锡山代拟讨蒋通电以坚盟言。阎氏答应了他的要求。但等唐起兵后，阎又联蒋反唐，使唐一败涂地。

蒋介石见阎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严重威胁着南京政府，便开始对阎动刀，从阎手中接收天津海关和长芦盐运使署等税务机关。阎大为不满，要求南京批准发行公债以资弥补，又遭蒋拒绝。阎得知蒋在北平秘密会见张学良，内心恐慌。阎锡山从郑州返回太原前，蒋曾密令韩复榘逮捕阎，走漏消息，使阎得以逃回山西。激起阎反蒋的决心，于是阎派王鸿一到建安村请冯玉祥来太原，共商讨蒋大计。冯求答应去太原，他忠告阎：“毒蛇螫手，壮士断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又批评阎的“骑墙政策”。

阎锡山于1930年2月10日发出通电，以“礼让为国”之名，请蒋下野。阎通电反蒋后，得到各方反蒋派别的支持，国内反蒋势力派出代表云集太原，形成空前的倒蒋统一战线。这些中人有国民党改组派陈公博、顾孟余等，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冯玉祥的代表李书城、李兴中，桂系代表潘宜之，四川刘文辉的代表胡畏三、刘湘的代表袁鸿吉，张学良的代表葛光庭，唐生智的代表袁华选，另外还有何键、石友三、韩复榘、万选才、马鸿连、张发奎、陈调元、金树仁等，几乎包括了全部非落系各派势力的代表。他们不满于蒋之“三假政策”（假清党以篡党，假统一以窃政，假编遣以扩军），纷纷揭竿。他们在太原拟订了倒蒋的军事计划。

阎锡山亲自到建安村访冯玉祥。阎用诚恳的态度对冯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讨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反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可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的话，我决不还击一弹。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一律待遇，决不歧视，此心耿耿，唯天可表。”

言毕，抱着冯玉祥的肩痛哭，冯亦痛哭。彼此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并歃血为盟。阎立即送冯现款 50 万元，花筒手提机枪 200 支，面粉 2000 袋，作为欢送的礼物。冯也慨然表示：对于已往之事决无芥蒂，此后彼此一德一心，共同反蒋。

3 月 14 日，冯玉祥秘密抵达潼关。同一天，阎、冯以及鹿钟麟、商震、张发奎、李宗仁等 57 人联名发出讨蒋通电，并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副总司令。

但是，冯部高级将领却认为从战略着眼，应当联蒋伐阎，因为阎的为人奸诈，阴险，不可与之共事，只有首先把阎打垮，西北军才能巩固西北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冯不以为然，他说：“首先打垮蒋介石最重要，而要讨伐蒋介石就必须联合阎锡山。你们不愿干，我和鹿钟麟两人

一人一枝手枪也要和蒋介石打到底。”

冯部将领见冯决心联阎，只有表示服从。在此次反蒋联合阵营中，冯玉祥的兵力最强，但反蒋的主帅却是阎锡山，而不是冯玉祥。

4月1日，阎锡山、冯玉祥和自香港返回的李宗仁分别在太原、潼关、桂平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其他将领也分别通电就职。但张学良不作表示，何键、刘文辉暗中接受委任，不肯公开通电就职。

蒋介石采用一手软一手硬的对策。

所谓一手软便是争取冯、阎不反蒋。蒋电告第三集团将领说：“切劝百川兄及早自拔，公私两全，固党国所倚赖。”同时指使吴稚晖致电冯玉祥，劝冯摒弃干戈下。蒋介石又派方本仁、何成浚、吴铁城等到太原，劝阎锡山不要发动战事，对阎进行拉拢。蒋又派阎锡山推荐去南京任监察院院长的赵戴文回太原劝阎锡山。

阎锡山对讨蒋又发生了动摇。原来拟妥的讨蒋通电送给张学良征求同意，并请张学良署名后由沈阳发出，阎现在听赵戴文这么一说，便赶紧电告张学良暂行停发通电。张学良不知道阎锡山在搞什么鬼，就派他的秘书长王树翰到太原察看动静，认为阎是拿他耍着玩，对阎深为不满。后来阎再决心反蒋时，派人到沈阳向张学良解释，此时蒋介石早已抢先派吴铁城、何成浚、方本仁到了沈阳做了多方面的拉拢工作，阎派去的代表不再受张学良重视了。

蒋的一手硬对策，就是以军事力量打垮阎冯。

4月6日，中原大战拉开序幕，但战事一开始，反蒋联军就暴露出各怀异志的要害问题，且有指挥不统一的弱点，各部队均以保存实力抢夺地盘为目的，不肯努力作战。而蒋军方面攻势甚猛，且有空军配合作战，战争一开始，阎锡山在军事上受了失利。

9月9日上午9时，在北平怀仁堂举行了国民政府主席就职典礼。阎曾在7月13日在北平召开了由各反蒋政治派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并发表了《扩大会议宣言》。会后，阎派陈公博、邹舍前往天津迎接由香港返回的汪精卫。汪精卫抵北平后便筹组以阎锡山为首的新的国民政府，他召开北平扩大会议，确定了筹备国民会议、倡导地方自治，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等7项基本原则，并推举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唐绍仪、谢持7人为国府委员，以阎为主席，汪精卫、张学良、谢持为副主席。

不料，骑墙的张学良于9月18日发出通电，东北军大举入关，支持蒋介石。

蒋介石为了拉拢张学良，曾在6月3日派李石曾到沈阳为年龄刚30岁的张学良祝寿，接着又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由张群将委任状及印信送到沈阳，劝张立即出兵入关。张学良抱着坐以观变的态度，希望由于局势的演变，或能使双方息争言和，停止内战。后来，张学良到北戴河避暑，蒋介石又派李石曾、张群同往。张学良名义上服从中央，举动上却以东北四省利益为前提而慎重考虑。

在张群、吴铁城等不断催促下，张迫不得已，曾以口头向张、吴表示，如蒋军能将济南攻下，东北即可出兵，并以此意告知阎锡山的代表贾景德。蒋军攻下济南，阎军退至黄河以北时，张学良表示：“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业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业已攻下济南，我方似应实践出兵关内的诺言。”遂发出巧电，拥护中央，呼呈和平，进兵关内。

张学良的巧电一发出，对反蒋阵线是一致命打击。9月19日，北平扩大会议决定将阎记国民政府迁往太原，匆匆忙忙制定了一部《约法草案》借以收场，倒蒋运动就此结束。各派政客如鸟兽散。

中原大战结束。蒋得胜而归，在车子里不停地哼小曲。10月25日，蒋经过一度极为紧张的战斗生活后，便偕宋美龄回到奉化。次日，回到溪口家乡，游雪窦寺，并与宋氏在小桥之畔留影纪念，于此暂洗征尘和恢复体力。

在这场史称“中原大战”的军阀混战当中，蒋的手段，是金钱收买，封官许愿，引人入彀，似资私用，但他的确使东部避开了一个凶险的关隘，并最终在中原奠定了胜局，这是蒋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光，也是他一生权力的顶峰。

黄埔建军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孙中山思想上以极大的震动。经过反复思考和借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后，孙中山终于明白了俄国革命所以很快成功，就在于有革命军队做革命党的后援，他逐步产生了以苏俄红军为榜样，来改造军队和建立革命武装的想法。

之后，他在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达林等人的会见时，多次详细询问苏俄红军的人数、其组织和政治教育等多方面的情况；还希望在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下改组军队；又派蒋介石等人专程去考试苏俄的政治、党务及红军的组织制度。

在筹备国民党“一大”一时，建立革命军和革命军校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在国民党恳亲会上提出建立陆军讲武堂的建议；16日，他在国民党党务会议的演说中再次强调：“党之基础”全“在于军队”，应“效法俄人”，“以党治国”和速建党军。党务会议讨论通过了“设陆军讲武堂于广州，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俾成军事人材，拥护共和案”。

11月23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第10次会议决定将军校定名为“国民军官学校”，拟由“孙总理担任校长

一席”。随后，廖仲恺受命与孙中山聘请的苏联顾问鲍罗庭共商军校人员配备诸事宜，着手开展创办军校的一些筹备工作。

1924年1月24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议决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8日，孙中山又亲自勘定以原黄埔海军学校和陆军小学旧址为新办军校的校址。

国民党“一大”以后，国共两党共同为创办新型的军校而努力。在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又指派廖仲恺、蒋介石分任军校党代表和校长；他亲自过问建校的大政方针和委任各部的正副主任及主要教官等。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得力臂助，在蒋介石丢下工作去粤期间，实际上肩负了筹备军校的全责。军校筹备委员会在苏俄军事顾问小组的领导下，严格搞好招生和建校等各项工作。

在共产党方面，李大钊指派党员张申府到广州，协助开展军校的筹备事宜，他因此而成为军校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张申府又向廖仲恺推荐周恩来等人来军校任职。不少跨党的国民党“一大”代表中的中共党员返回原地后，不负军校筹备委员会所托，在各省区市积极为军校选拔学员。如毛泽东就在委托何叔衡搞好湖南招生的同时，亲自在上海主持了“长江流域及以北各省考生的复试”工作。广州、北京、武汉、济南的共产党组织，都选送了一批优秀青年报考军校，从而保证了第一期学员的质

量。

黄埔军校的筹备并非一帆风顺。驻扎在广州的滇、桂军队，对孙中山 1923 年重返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是有功劳的，但这些旧军队根本不“可以居革命军的地位”，他们为保持个人私利，不愿意孙中山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因此，对黄埔军校的建立，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在当时最有战斗力的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就当面奚落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说：“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营人就可以完全缴你的械”。

蒋介石受此当面侮辱，不敢哼一声，回到黄埔岛上即提心吊胆。他既担心在广州的军阀，其中包括滇系军阀，不赞成创办黄埔军校，因而解除军校学生的武装，最后会跟他算帐；又害怕共产党人的革命威望，因为他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有一次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

苏联政府对孙中山的黄埔建校与建军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派来了既有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军事顾问数十人。在军校开办以后，苏联派来的顾问小组不仅为军校提供苏联红军的最新资料，重新编订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与交通通讯五大教程，努力指导军校的政治、军事训练，还大力协助军校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必要的制度，从而保证了军校政治、军事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苏联政府还为军校运来大批的武器弹药，保证了军校的军事训练以及孙中山“党军”的肇建。

1923年5月5日，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黄埔军校正式开学，新生入校接受学前的编队整训等工作。第一期共录取新生350人，编为第一、二、三大队。7日，备取生120人又入校，编为第四大队。

6月16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出席了黄埔军官学校正式成立典礼。孙中山作了关于军校创办目的及希望的长篇演讲。他说：“今天是本学校开学的日期。我们为什么有了这个学校呢？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学校呢？诸君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

孙中山以俄国的经验来进行对照比较。他说：“中国和俄国革命的结果不同，推求当中原因，便是我们的一个大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候，……因为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继续去奋斗，所以就是遇到了好多大障碍，还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大告成功。……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

孙中山对黄埔军校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他说：“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

天在这里开这个军盲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孙中山勉励黄埔学生继承先烈精神，学习好本领，立志担负起救国救民与建设新民国的大任。他说：“要从今天起，重新来做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上的革命军”，这种革命军必须象俄国的革命军一样明白革命的宗旨，立革命的志气，“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

孙中山的演讲长达一个小时。之后，由胡汉民代孙中山宣读军校训词，内容为：“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所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孙中山十分重视办好黄埔军校，亲自为军校确定了创建革命武装，以武力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反动统治，挽救国家危亡的办校宗旨。为切实贯彻这个办校宗旨，孙中山不仅亲自抓黄埔军校的大政方针，还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

孙中山亲自审定选派军校政治、教练、军医、教授、军需、管理等各部的正副主任。为了保证政治教育的进行，黄埔军校设立了政治部。孙中山对政治部特别重视，他指派戴季陶、邵元冲先后出任政治部主任，稍后又同意共产党员周恩来、包惠僧、熊雄、鲁易等先后出任军校政治部正副主任。孙中山还大力支持军校政治部建立必要的

政治工作规章制度。军校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保证了黄埔军校学员的政治素质。

1924年1月，蒋介石返回广州。孙中山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蒋介石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军校筹建工作。

2月8日，召开校务筹备会议，10日，分配各省区预定招生名额。

然而，就在军校筹备工作顺利进展之时，蒋介石突然向孙中山提出辞职并宣布解散筹备委员会令，随后离开广州，返回奉化。

蒋介石之所以突然辞职，是有原因的。原来孙中山虽然决定由蒋介石筹办军校，却未决定由他出任军校校长，而是根据内部商定，由程潜任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其次，孙中山虽然相信蒋介石忠实可靠，但是他深知蒋介石主观好性，脾气暴戾，动辄与人争吵，在军中缺乏威望，所以孙中山一直没有让蒋介石在军中担任要职，尤其是刚刚结束的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只任命蒋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并要他专心筹办军校，不必过问党务和军政大事。这无疑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因此，他以辞职来表达自己心中的不满。

孙中山将建立自己军队的希望，完全放在创办军校上面，而蒋介石的辞职，使孙中山甚感焦急。2月23日，他委派廖仲恺代理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抓紧筹备工作。同时致电蒋介石，盼其速归。

蒋介石于3月2日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重提昔日永丰舰上“共患难同生死”，希望孙中山要象当年对陈其美那样深信和重用他，不但要让他专心办学，而且要让他过问军事政治。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不介意，并满足他的一些要求。3月21日黄埔军校入学考试时，孙中山仍任命蒋为入学考试委员会委员长。蒋不在广州，暂由李济深代替，同时派许崇智到奉化劝蒋。

孙中山之所如此器重蒋介石，固然是因为缺乏军事人才，况且蒋已受命考察过苏联军事；再就是永丰舰蒙难之时，蒋介石的出色表现深得孙中山的好感。

后来蒋介石发现若再不赴广州上任，其职位就可能被他人占去，于是动身，4月21日到达广州，26日入军校办公。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任粤军参谋长。9日廖仲恺被任命为军校国民党党代表。校长和党代表之下，分设政治、教练、教授三个部和军需、管理、军医三个处。从5月5日新生开始陆续入学。

蒋介石是靠办黄埔军校起家的，但是在军校刚刚建立之初，在军事技术、经费、军械等方面都要靠苏联的支持，所以他不便站在右派一边，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而常以不偏不倚的中间面目出现。与国民党一些元老们相比，蒋介石算资历最浅的了，而这些元老正是蒋通向党、政、军权力道路的绊脚石。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与国民党元老们一决雌雄，蒋介石迫切需要得到苏联顾问

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因此，蒋介石往往又以比较左的面目出现。

黄埔初创，异常艰难，因为广州的重要税收多半控制在滇桂军阀范石生和杨希閔手里。党代表廖仲恺于是苦口婆心地劝慰他：“介石，你专心管好学生吧，经费的问题，都由我负责。”被誉为“黄埔的慈母”的廖仲恺，常常在夜半三更的时候来到范石生杨希閔吸食鸦片的床前，曲意周旋。老烟鬼要在烟瘾过足后才肯签定，让他领到有限的军校用款。

黄埔军校实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的方针，特设党代表和政治部。军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须由党代表部署方能生效；政治部负责军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在特殊情况下可行使党代表职权。政治教官被视为军校灵魂，对学生起极大的影响。开始，孙中山任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一要职。

可是戴季陶辜负了孙中山的期望，他反对国共合作，歪曲三民主义。说什么“总理的思想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断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儒家的正统思想的发扬光大。三民主义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总理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他经常在军校发表这样又长又臭的演说，引起学生们的哄笑，孙中山对他也甚为不满。

有一天，戴季陶在国民党中央执委邹鲁家里闲谈中无

意地说了句国共合作的公道话，在场的“西山会议派”骨干分子张继怒不可遏，大骂戴季陶是共产党的走狗。戴季陶因受了冤枉而反唇相讥，说张继是北洋军阀的走卒。张继暴跳如雷，一面怒斥戴季陶反复无常，从保皇党干到共产党；一面拳脚交加打他。形销骨立的戴季陶无力还手，当场痛哭。夜里，他感到十分委屈，又想起在黄埔狼狈不堪的样子。天刚亮，他便心灰意懒，悄然溜回上海。

戴主任“失踪”，副主任邵元冲代理。这位国民党要员原是前清举人，封建思想浓厚，根本不懂革命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不联系学生，不接近下级军官，与党代表、苏联顾问也极少来往，只是每隔几天从广州乘船到黄埔走一趟，看一看例行的文件。偶尔的演讲也因口才极差、内容无聊而被学生们戏诊为“催眠术”。

军校总理孙中山食不甘味，忧心如焚。因为政治部不能发挥作用，黄埔建军的心血将付诸东流。就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临难受命，就任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出生在江苏淮安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中。他出世不久，任淮安知县的祖父去世，家道中落。父亲忠厚老实，在外省任小职员。

9岁，生母和嗣母不幸先后病逝。周恩来作为长子，担负起家庭的重担。辛酸的生活和炎凉的世态，使小恩来感受到现实社会的冷酷。

12岁那年春天，周恩来随伯父离开淮安到东北。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就读期间，他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还利

用课余时间，阅读大量进步书刊，努力探求人生真谛，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上修身课时，老校长问道：“诸生为何读书？”“为明礼”、“为光耀门楣”、“为家父”，学生们纷纷回答，老校长无动于衷。这时，周恩来响亮回答：“为中华之崛起。”掷地有声的江南口音，老校长不由得一怔，并激动得大声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1913年夏天，周恩来考进天津南开学校。在张伯苓校长的支持下，19岁的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3年后回国，1920年12月，周恩来由上海抵达法国巴黎，参加勤工俭学。他来到巴黎，立即吸引了那些先期到达法国的中国青年，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他是一位颇有名气的青年领袖。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这个消息过了很久才传到巴黎。然而，有意思的是，思想相同的人，彼此相隔万里，竟会几乎同时考虑采取相同的行动。同年3月，周恩来和在欧洲的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它和其他国内外的共产主义小组一样都在积极活动，目的都是为着建立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周恩来是中共的始人之一。

1923年初开始，周恩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积极从事国共合作。他因协助国民党特派员王京岐筹建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绩斐然，而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1924年初，他又建立了国民党巴黎通讯处。他的卓越才能引起了孙中山和廖仲恺的瞩目。不久，廖仲恺与中共有关部门协商后，请周恩来的旅欧老朋友张申府写信并汇

款到巴黎，特邀周恩来回国参加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工作。

秋天，周恩来从法国返回广州。就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孙中山十分器重他，亲自委任他为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11月初，为挽救黄埔军校的政治危机，经与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商定，孙中山又任命他为军校政治部主任。

廖仲恺亲自把周恩来接到黄埔。码头上，38岁的蒋介石和26岁的周恩来握手，好像彼此要从对方的手中汲取力量，去迎接未来的战斗。

不久，周恩来就雷厉风行的对军校政治工作进行革故鼎新，使几乎瘫痪的军校政治部有如前进的车轮一样转动起来。

黄埔，这块走出共和国四位元帅三位大将、国民党十五个一级上将十九个二级上将以及成百上千其他将领的神奇土地，如果没有当年千百名热血青年的集聚，没有国共两方面的血乳交融，没有将士慷慨用命，便不会如此闻于名世。八大金刚也不会这样快地脱颖而出，并成为后来蒋介石军事大厦的八根顶梁之柱。

所谓八大金刚，是指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刘峙、张治中等八人。他们都是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教官出身而起家的。在蒋介石集团中掌握兵权的，大都是八大金刚门下黄埔一、二、三期的学生。八大金刚皆由蒋一手提拔，次第由带兵官佐跃升为封疆大吏。

这八个人是：

何应钦：曾任黄埔军校军事总教官、教导团第一团团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教育长。1948年6月任国防部长，一级上将。全国解放前夕，随蒋介石到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87年10月，病逝于台北。

顾祝同：曾任黄埔军校军事教官兼管理部主任、教导团第一团第一营营长，第九军军长，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后升任陆军总司令。1950年3月，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四川西昌被解放军攻占后，才逃往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级上将。1987年病逝于台湾。

钱大钧：曾任黄埔军校军事教官、代理总教官、代理教育长，国民革命军二十师师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中將加上将衔。1946年3月被蒋介石免职，回苏州家居。1950年到台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田径委员会主任、航空公司董事长等闲职，1982年7月病逝台北。

蒋鼎文：黄埔军校区队长。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部副官。北伐时跟随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行动，后任第一师师长。对红军第五次“围剿”时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二路军总指挥。1938年6月改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二级上将衔。逃台后任总统府顾问等职。1974年1月病逝台北。

陈诚：黄埔军校特别官佐。曾任军校炮兵营长，十一师师长，十八军军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军政部长，参谋总长，官至一级上将。1949年7月兼台湾省政府主席和台湾警备总司令。1954年3月以后连任两届“副总统”，1957年10月以后又担任国民党副总裁，是国民党黄埔系中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1965年3月，因肝癌逝世于台北。

陈继承：黄埔军校教官。教导团第二营营长，二十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抗战后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兼任军训部次长。1948年10月调任首都（南京）卫戍总司令，中将衔。到台后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招商局顾问等职，1971年12月病逝于台北。

刘峙：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校本部参谋处科长，教导一团二营营长，二十师师长，第一军军长，第一军团总指挥。因同红军作战有功，蒋介石特将一个新集设为“经扶县”（刘峙字经扶）。后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二级上将衔。淮海战役后，因战败被解职，调任总统府顾问，到香港、印尼养病，1953年11月返回台湾，1971年1月病逝于台中。

张治中：曾任黄埔军校入伍生代理总队长，武汉分校教育长，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京沪警备司令长官，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长，曾授国民党中将加上将衔。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69年4月6日在北京

病逝。

蒋无论在政、党、军各方面，任人唯嫡系为亲。这八大金刚后来成了蒋介石军事集团的显赫人物。蒋介石亲手培养了他们，给他们以高官厚爵，在历次的政治风险中，蒋介石依靠着他的这些军事党羽，一次次涉险过关。

但是在真正的军事对抗上，八大金刚就不那么货真价实了。

在人民解放战争过程中，以八大金刚为代表，以黄埔军校学生率领的蒋介石的军队精锐，被人民解放军一再打败。据黄埔一期的邓文仪统计：各级被俘的十数万军官与三万政工人员，其中十分之八均为黄埔学生。

被俘的最高军衔是上将——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另有非黄埔出身的中将三十二名，少将一百多名。这些战犯在大陆看押改造，自1959年12月4日开始，分七批特赦，至1975年3月19日全部处理完毕。只过了半个月，适逢清明节，蒋介石在台北去世。蒋介石和他的文臣武将们的那个时代，已经成了翻不回的历史。

国共两党分分合合的历史，曾酿出黄埔多少曲曲折折的故事！高山流水，冰雪炭火。蒋介石多次想拉周恩来为己所用，而周却信仰毛泽东；在蒋逃台之后，屡生出追杀周恩来的计划；周恩来在困境中苦撑着航船，搭救落难者。忧虑使他说起了恽代英当年爱说的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在周恩来等中共党员的影响下，与蒋介石在黄埔培植

党羽的同时，中共也在黄埔发展和影响了一批赞同共产党的高级将领。

其中之一便是有名的张治中。

另有三个人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他们四人当时被国民党右派称为“红色教官”，喊作“黄埔四凶”。

邓演达：参加筹备黄埔军校。曾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教育长。北伐时，任国民革命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武汉行营主任。曾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负责人等职。后秘密策动反蒋被捕，1931年11月29日被秘密杀害。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恽代英：早期著名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等职。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年3月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监狱壮烈牺牲。

高语罕：曾在芜湖创办工人夜校，1920年到上海，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加入共产党。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之后曾参加托派组织的“无产者社”，曾以中共党员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二大，并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后因参加托陈取消派活动被开除中共党员党籍。1948年春在南京病故。

此外，由黄埔直接毕业的中共将领，有徐向前、陈赓

等。

历史常常会开人类的玩笑。早逝的孙中山先生绝对不会想到国共合作缔造的黄埔军校会在公元 1927 年演出如此惨痛的悲剧；校长叛变革命，滥杀昔日学生；血流成河之下，人们只能痛苦地呻吟：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随之而来的便是黄埔军校和国共两党的彻底分裂。于是一夜之间，兄弟成仇，师生忘情，乡党交恶，同窗反目！

其间虽有“兄弟阋于墙而共御其侮”的八年抗战，然而，胜利伊始，辉煌而又沉重的解放战争，这场国共两党全面决战的战争，便开始了。

于是硝烟弥漫、烽火遍地的华夏大地上，周恩来、蒋介石、林彪、徐向前、陈赓、许光达、杜聿明、胡宗南、郑洞国、胡璉等等，这些昔日的黄埔人便在各个战场、各条战线上，为着各自的信仰、不同的信念，书写了悲喜的人生，奏响了各异的乐章。

鲜血在流，母亲在哭。为了这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搏斗，中华民族在新世界临盆前的阵痛中忍受煎熬！

群雄逐鹿，鼎归何处？

——军事对垒的结果，再一次展示了千百年颠扑不破的真理：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南昌起义， 打向反动派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

1927年7月20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抵武汉，鲍罗廷和罗易离开武汉返回苏联，临时中央五人常委召开会议，与会者除陈独秀外，对前段时期的革命工作，作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早在7月4日，鲍罗廷就曾提出：“建议独秀平山赴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泰、太雷、维汉、李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常委，”在新的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下，临时中央从7月下旬到8月初作了两项重要决策：

第一，决定发动秋收起义。7月20日，临时中央、中央农民部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指出：“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农民武装在合法与秘密“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24日，中央要求全党在“今年秋收时，积极做广大的减租抗租运动以鼓励农民夺取乡村政权，实行没收大地主的土地”。随

后，中央把秋收暴动具体落实在湘、粤、赣、鄂四省。8月3日，临时中央发布《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要求四省的党组织立即组织秋收暴动，并规定了秋收暴动的战略。

第二，决定南昌起义。中央于7月25日之前即正式做出南昌起义的决定，并派周恩来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前敌委员会“以恩来、立三、代英、彭湃四人组织之”。

7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以后，为了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争夺地盘，继续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的第一方面军沿长江北岸向南京方向进发；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沿长江南岸向南京方向进发。由于武汉政府内部派别关系复杂，张发奎和唐生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张发奎出于本身利害考虑，对“东征”并不积极，而是打算“第一步按兵不动，第二步渐次往南昌移动回粤。”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利用“东征”名义，将由共产党员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由北伐时期的“叶挺独立团”扩编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以及倾向革命的第二十军，由武汉、鄂东一带向九江、南昌集中。同时酝酿和提出联合张发奎回广东徐图发展的计划。

早在1927年6月9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曾提出：“在我们控制下和在同情我们的革命军官控制下的军队，必须派往南方，回到广东。……在征服广东的过程中，要

发展一支自觉的革命军队，如果我们在武汉失败了，广东将成为革命的基地。”7月16日，《中央致广东省委信》中，要求广东省委“须有政治军事上种种准备。”鉴于张发奎当时尚未积极反共，并表示“第二方面军无论如何决不反对共产党，不与共产党分家”，中共中央对张发奎犹未绝望，以为可以使之左倾，同到广东，于是，制定了“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的计划。

7月19日，中共中央派常委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长邓中夏前往九江，着手准备组织力量回广东，并指示：“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与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关系。”同时，派聂荣臻等三人组织前敌军委，到第二方面军开展工作。

李立三等相继到达九江后，发现形势有变，张发奎明显右转，7月20日，在九江的党的负责干部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召开会议，一致认为，就当时形势，“南昌暴动”已经是我党必然应取的政策，提出南昌起义的主张。与此同时，党的另一位领导干部蔡和森也在武汉向中央提出“在张发奎军中准备独立动作”的主张。23日，恽代英等到达九江。翌日，在九江的领导干部举行第二次会议，进一步研究和落实起义计划。

7月20日以后，共产国际新派出的代表罗明纳兹到达武汉。瞿秋白也从九江赶到武汉。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同意李立三等同志的建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会议参加者张太雷，于1927年10月15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

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中央决定南昌八一暴动，是决定在四省秋收暴动以后”，“当时秋白把南昌的决议由河带到汉口，中央……造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会议另一个参加者张国焘，于1927年11月8日《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中说：“当7月20日至25日之间，中央常委得悉南浔同志主张在南浔一带发动暴动的信，中央常委及国际代表都表示赞成。

……具体的准备一切暴动的需要。准备事件如下：

一、经费的筹措；

二、许多同志及俄顾问陆续派往九江；

三、实际赞助国民党左派在九江的会议和结合。

后来决定派恩来同志去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其任务是去指导前敌方面工作，准备于必要时，在南浔起义。”

7月25日，周恩来由武汉到九江，立即召集在九江的负责干部开会。周恩来报告了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并表示：“中央的意见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会后，“遂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

在党中央酝酿和决定南昌起义的过程中，敌我双方军事上也都开始行动。7月下旬，张发奎日益倾向汪精卫，他感觉叶挺、贺龙部队“太红”，一方面下令调叶、贺部向德安一带集中，同时，令第二方面军其他部队从九江自北面而南，第五路军从南昌、樟树自南而北布防，形成对

叶、贺部夹击之势。另一方面又准备召叶、贺赴庐山开会，企图或施以拉拢，或施以威逼，以便控制这两支部队。7月23日，贺龙到达九江，翌日，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甘棠湖的烟水亭举行宴会，参加宴会的有朱培德、贺龙、叶挺以及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第一方面军部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等。在宴会上，朱培德要贺龙、叶挺速去庐山开会。待朱培德走后，叶挺乘机邀贺龙、叶剑英、廖乾五、高语罕到甘棠湖上划船，实则分析形势商量对策。贺龙后来在回忆此事时说：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个人在湖中小划子上开了一个会。

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情：

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

第二、张发奎命令部队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到南昌去。

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先让给叶挺。

甘棠湖上的磋商，为南昌起义的决定，从军事行动上迈出第一步。

南昌起义造就的中共领导人

1927年7月27日，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到达南昌。住在花园角2号（今4号）朱德寓所，当即听取朱德介绍南昌敌情，并一起商讨起义的准备工作。

共产党员朱德在大革命时期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军官教育团名义上隶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滇军），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学校。

1927年6月，江西省长、第五路军部指挥朱培德实行“清共”，“礼送”共产党员出境，教育团的大部分学员被遣散，朱德出走武汉。7月21日，朱德受党的委派，借机公开返回南昌。

7月26日和27日，叶挺和贺龙部相继到达南昌，按朱德安排进入驻地。

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约五千五百人，作战力强，是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当年的二十四教导队干部粟裕回忆说：“二十四师是我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叶挺同志是师长。当时各地的进步学生多遭通缉或追捕，为了收容两湖地区的被迫害的青年，在二十四师成立了教导队，不到半个月，就有了一千多名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团员”，“组织上对政治教育极为重视。除了上政治课以外，还经常请负责同志如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叶

挺等同志来作报告。”第二十四师到达南昌后，司令部设在百花洲东湖畔的心远中学，所属部队驻扎在城东南方向一带。

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是南昌起义的另一支主力部队，辖两个师和一个直属队，共7500多人。军长贺龙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民国初年，他靠两把菜刀举义缴获盐局税警枪支，十几年来带着队伍东征西战。

北伐战争中，共产党员周逸群来到他的部队，贺龙在周逸群的帮助下，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倾向革命。他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由于很早就接近了共产党，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绝不是偶然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政治上没有出路，看到国民党革什么命呢？尽是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化堕落，感到个人政治上没有出路，整个军队也没有出路。另方面却看到共产党的主张好，有办法，能够救中国。”在第二十军内部，一方面有周逸群等共产党员和许许多多的革命青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以参谋长陈浴新为头子的反动分子和旧势力。贺龙旗帜鲜明地支持进步力量，他批评某些旧军官说：“你们不要反对什么共产党，共产党是革命的，……如果你们要怀疑这个，排斥那个，说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我若是见了是不能随便饶恕的。”第二十军到达南昌后，军部设在江西省政府附近的一所中华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所属部队大部驻在城西方向。

其时，党的一批领导干部陆续到达南昌。他们是：恽

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郭亮、方维夏、徐特立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彭泽民、张暖时等也来到南昌。刘伯承到达较晚。他是在四川领导顺（庆）泸（州）起义失败后，转道陕豫，历经艰险，于7月11日到达武汉的。

7月12日汉口《民国日报》刊登了这一消息：“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昨十一号始由郑州搭车抵汉，刘氏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此来对于四川省今后军事，必有伟大计划。”实际上刘伯承此行的“伟大计划”并不在四川，而是在南昌。到武汉不久，刘即按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以“有病”为名，向当局“请假调养”，悄悄奔赴南昌。

7月27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大旅社成立，委员会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经计议，“定于三十日晚举行暴动”，起义军的指挥机关设在江西大旅社，而前敌委员会的秘密指挥所则设在女子职业学校，代号为“炮兵连”。

28日，周恩来亲自前往第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把党中央和前委关于要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决定和具体行动计划，告诉了他，并征求他的意见。贺龙当即表示：“我完全听从党的指挥，党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无论南昌暴动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就上山。”

南昌起义的准备活动，为敌人察觉。7月29日，汪精卫、孙科、张发奎、朱培德等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决

定：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党”，逮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及高语罕等人。叶剑英预闻此事，立即通知廖乾五、高语罕转移。廖乾五等于30日离开九江到南昌，向前委作了报告。

在此紧急关头，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从九江给前委连发两份电报，主张“暴动直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认为：“暴动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

7月30日，周恩来召开起义军领导干部会议，阐明起义的重大意义，并公布起义计划和部队编组。当日下午，各部队分别召开营、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起义决定，进行具体部署。

正当武装起义已准备就绪，即将进入行动阶段时，张国焘于7月30日从九江赶到南昌，竭力阻止起义。在前委召集的紧急会议上，展开一场激烈争论。张国焘说：“国际电报说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周恩来当即指出：“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意思不符”，表示“还是干”。张国焘又提议，暴动需要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发动。当时，恩、代、立、湃等一致反对此项意见，谓暴动断不能延误，更不能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会议开了几个小时，仍争持不下。到三十一日晨，再开会议，又辩论数小时之多，才一致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意见，张本人“最后表示服从

多数”。前委会定于八月一日上午四时动作。于是由叶起草命令；用贺之名义（代总指挥）发表。作战命令如下：“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明（一）日四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升之！”由于二十军一姓赵的副营长叛变，行动计划为敌人所知。前委“乃临时改变，提早两小时”，于8月1日凌晨2时起义。

从敌我双方态势来看，在南昌市内和近郊，革命力量占绝对优势，包围着敌人；而敌人在南昌四周的吉安、东乡、进贤、九江部署了大量军队，包围着南昌。这种错综复杂的军事态势，要求起义部队必须速战速决，在敌人来不及增援的情况下，夺取胜利，然后撤出南昌。

起义军规定的口令是“河山统一”。起义军的识别标志是，颈上系红领带，左臂扎白毛巾，手电、马灯都贴上红十字。

在各部队利用露营、借东西、拜访等方式，侦察敌情，接近攻击目标的同时，南昌地方党组织也进行了紧急动员，在盐义仓女子师范学校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组织学生、妇女参加巡逻、联络等工作。

南昌起义由朱德“请客”拉开序幕。7月对日晚，朱德奉前委指示，利用他和滇军军官们的旧谊，把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第二十四团团长肖胡子和一个姓蒋的副团长，请到离他们驻地很远的大上院街口嘉宾楼饭店。盛宴款待。酒足饭饱之后，又借打麻将牌“尽情消

遣”。由于朱德拖住了这几个军官，使敌军一时指挥不灵，从而为起义军解除第三军两个团的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

敌人对起义军的活动有所察觉和准备。因此，“至晚二十时半，即发现枪声”。而大规模的战斗，则是从八月一日午前二时开始的。

贺龙、刘伯承指挥第二十军第一师，向朱培德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发起进攻。迫使敌人全团缴械投降。

在松柏巷一带，叶挺指挥的第二十四师一部，与敌第六军第五十七团展开激战。

在顺化门外，第二十军教导团、第六团和第十一军第十师，对小营房和老营房的敌第九军所部，发动突然围攻，迅速解决战斗。

在新营房，第二十四师一部与广东农民并肩作战，进攻第三军第二十四团营房。敌人从梦中惊醒，还来不及摸枪，就当了俘虏。

对于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叶挺在《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中做了如下记述：

贺龙所部获枪约二千支、子弹十余万发，我们所部获枪二千余支，共五千支，子弹七十万发，大炮数门。起义胜利了！革命的旗帜在总指挥部的五层大楼上高高升起。

驻在南得铁路线上马回岭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由于当晚总指挥部来不及通知他们，到第二天中午，看到从南昌开来一列火车——总指挥部预定的起义信号，才在聂荣

臻主持下行动起来。午后，他们为了遮掩反动军官的耳目，以“打野食”名义，不带辎重行李，分别将部队拉出驻地。

黄昏，全部到达德安县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和第二十五师长李汉魂，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带着卫队营，乘火车追来。他们遭到起义军的鸣枪阻截，张发奎、李汉魂见大势已去，跳车而逃。卫队营被起义军团团围住，全部缴械。第二十五师参加起义的部队，经过一夜的行军，抵达南昌城下，正是第二天拂晓。天刚刚亮，与其他主力部队胜利会合。

南昌起义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当国民党赶紧调集军队进行反扑时，8月3日至6日，起义军接原计划主动撤离南昌，向广州进发。

蒋介石的认识

同毛泽东几次交手失败后，蒋介石认识到：“我们现在和赤匪打仗，并不是打仗军队数目的多寡，也不是枪炮弹药的精粉和购械粮服的接济，如果是打这几项，那么，我们都胜过赤匪，我们早就应当剿灭赤匪了。须知我们和他打的，第一是组织，尤其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就是训练士兵和民众的方法；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动军民的精神；第四是纪律，就是使官

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胜利。大概赤匪比我们长的地方也就在这几点上……现在我们就可以就这几点来研究我们今后剿匪的战术和战略”。

在第五次“围剿”之前，蒋介石为了能消灭红军，把赌本已经下好，发誓非在新的“围剿”时“消灭赤匪”不可。

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主要作战地区是赣省中部、南部和闽赣、湘赣、浙赣各边区。

蒋介石调动了六十四个师和七个旅、六个团；另有空军十一个队，飞机共一〇五架。按每师平均九千人计算，总计约有六十余万人用于此次内战。而蒋之用于上海、长城抗战摘系军队却仅仅第五军和十七军两个军。

这次蒋介石亲自到南昌指挥第五次“围剿”，又特别强调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基本作战原则。同时采用保甲、团练制和废苛捐、惩土劣、整饬吏治、复兴战区经济措施。曾办理生产、消费合作社，也想解决土地问题。但这些政策，并未能真正实行，只是纸上空文。

其次，蒋对其军队又实行思想教育，他叫做心理建设。为此，他处处大讲特讲“安内攘外”、“诚”和“仁义礼智”、“智仁勇”以及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事迹。在这些讲话中，他一方面宣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封建道德，一方面宣讲“先安内后攘外”的对外妥协，对内镇压

的老洋务派理论，把复兴中华民族的关键归之于歼灭中央红军。号召军人学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以其镇压太平天国的精神、思想和魄力来消灭中央红军。至此，他已完全站在清朝和曾国藩的立场上，敌视太平天国了。这就和孙中山已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了。

蒋在《军人精神教育精义》中，特别系统地提出了军人的精神是智仁勇，而以仁为中心，仁即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或称之为礼义廉耻。这是蒋氏自 1924 年以来，封建私有制军事思想的基本完成。所以他更大力地宣传曾国藩、胡林翼的政治军事思想并命他的军官学习曾、胡和左宗棠。但在战略和战术上，蒋则吸收了巴尔克、克劳塞维茨等的原则，以丰富其孙、吴至曾、胡的战略战术原则。此时，他对军中政治工作则已不重视，将中心放在军人精神和军事训练中。到 1945 年，因 1944 年的抗战大溃败，才又想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此前 1932 年 6 月 22 日，蒋介石在对鄂豫皖军政长官的讲话中，就特别提出了学习曾国藩的问题。他说：“至于风气，更是一种大事业所不可缺少的基础，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所谓换朝代的时候，都有土匪发生，而且土匪的力量都是极其强大的。现在的匪患正是同样的现象。现在赤匪许多组织的方法，亦不过是很粗浅地抄袭洪、杨时代的方法罢了。可是太平天国虽有极严密的组织与纪律，终究却被曾国藩、胡林翼等打败。曾、胡之所以能打败洪、杨，就是用着风气的力量。现时的共匪朱、毛，决比

不上太平天国的洪、杨，难道我们自己就连曾国藩、胡林翼都比不上吗？”

这可以作为蒋介石在军事、政治上正式复辟封建王朝的标志。

于此同时，他又到处解说“先安内”政策的必要性，宣传消灭红军是中国存亡的关键。他在1932年6月22日讲话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次剿匪，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为什么呢？他说：“在外患日迫，帝国主义严重压迫之下，中国内部若是仍无办法整理，则中国必不能继续苟延存在。”为什么不能整理内部中国就无法存在呢？他的回答是：“现时的匪区，是中国的中心区域，中心区域的匪患，直是国家心腹之患，此时如果不能立即肃清，中国就决不能够复兴，惟有灭亡而已。”这就是说，日寇在边远，红军在中心区域，放必先行解决红军。这就表明他所指的国家是他的王朝，决非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国家。这和曾国藩、西太后的语言完全相同。为王朝自身利益，必对内镇压以保位。对外妥协还是为了保位，决非为保中华民族之利益。这应当无需什么论证了。

1933年7月，落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专门为第五次“围剿”训练军官。蒋兼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召集全国军官轮流受训。训练的宗旨，是灌注“攘外必先安内”和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思想。一提蒋委员长或领袖就必须立正的规定或风气，也就是从此开始的。

同时要高级将领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或礼义廉耻为

军人精神，忠诚于统帅，绝对服从命令。这是蒋氏在进一步以封建专制主义原则训练和治理军队，使国民革命军进一步封建化。他说：“忠孝，就是要忠于党国，忠于朋友，忠于上官和部下。”忠于部下是假，忠于上官，忠于他本人是真。

同时落印发《剿匪手本》，颁发给受训军官和参加第五次“围剿”的军官。

此书共六篇，中心内容为军官必备的素质和“品德”以及作战韬略。此外还发有：《军人精神教育》、《孙吴兵略问答》、《步兵操典纲领》、《曾国藩剿捻实录》、《增补曾胡治兵语录》、《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新颁党政军条规及行营第四厅新颁各条规则》、《剿匪部队训练要旨》、《封锁法规汇编》、《碉寨图说》、《军人必读》、《匪军文件汇编》，共十二种。其总精神是要其军官、将领们，以杀身成仁的决心和必要的战略战术，消灭红军。可见蒋介石为此次“围剿”所下的力气是多么大，真是全力以赴。

而对日寇的侵逼，则一再作揖、屈服、忍辱含垢而不辞。以上这些文件的中心内容，是贯彻他的一系列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洋务派思想和诸战略战术原则。

然后，蒋介石于10月2日在南昌行营对各高级将领面授机宜。战略原则是四项：严密封锁中央苏区，断绝中央红军和苏区人民生活资料供应；发展作战地区交通；以加快运兵时间。他认为：“战争就是争取时间，谁能节省时间，行动迅速，谁就胜利。”注重机动作战，对付红军

游击战，争取主动，操纵战局，而不令红军操纵战局。他说：“凡能依自己的计划，支配整个战局演变者，便是主动，便谓之立于主动地位。”他和任何一个将领一样，在历史上都想自己操纵战局演变，但是能否做到这点，却是另一回事。

中共和蒋介石各请军事顾问

历史常常跟人开玩笑。博古等人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但无论博古也好，张闻天、王稼祥、凯丰等几位执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也好，却一个也不懂得军事。而朱德、周恩来等在前线又按过去毛提出的那套办法指挥打仗，并在政治上同情和支持毛泽东，因此又不能取得博古等人的完全信任。就在这时，共产国际派来了一名军事顾问，他就是出身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奥托·布劳恩。

奥托·布劳恩（1900～1974），中国的化名李德，笔名华夫。1918年年底加入德国共产党，曾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斗争和德国中部的工人武装起义，1926年被捕入狱，1928年越狱逃至苏联。1929年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1932年毕业后，就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任中共军事顾问。1933年9月，化装成牧师进入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其实，这个军事顾问既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又缺

乏对蒋介石军事力量的研究，他与博古等人的看法倒是不谋而合。博古等人既缺乏军事常识，又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现在有这么一位洋军事顾问，从天而降，就把他奉为上宾，视之“太上皇”，把苏区红军的军事战略决策和战略战术的指挥大权，统统交给了李德。

中共这里来了一个德国人作军事顾问，蒋介石那里也请了一个德国人作他的军事顾问。此人名叫封·赛克特（1866～1936），这个赛克特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德国军界名将。他曾任德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后来又担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国防军总司令等职。1926年退役后，仍不忘过问军旅之事。他的到来，就是为蒋介石“剿共”战争出谋划策的。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越发认定江西的红军是他最主要的敌手了。1933年5月下旬，蒋正式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作为“剿共”战争的最高统帅部。6月8日，蒋介石在这里召开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共”军事会议，由军、师、旅长及行营各厅长五十余人参加。蒋总结了四度“围剿”仍无实效的经验教训，痛感过去那种“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行不通了，他要求与会者提方案，谋求新的途径。于是，一个被毛泽东称之为反动将领的名叫柳维垣的人和第一次反“围剿”中漏了网的旅长戴岳，提出了所谓“堡垒主义政策”的新军事原则。这个新的军事原则被蒋介石采纳了。

堡垒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用所谓“彻底封锁”，即“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作战方针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的战略原则来对付共产党的军队。

蒋介石得此新招，于7月间特邀封·赛克特同上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赛克特对“堡垒主义”的新战法十分赞同，并表示愿助一臂之力。

1933年9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六十六师，一百万马，配备了二百架飞机，向共产党领导的各苏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以一半兵力用于江西中央苏区。

显然，蒋介石的这次“围剿”比过去更严重，更残酷。但此时中央苏区已更加巩固。第四次反“围剿”后，闽浙赣苏区已经联成一片，地跨赣、闽、粤、湘，拥有五万平方公里，三百万人口，红军发展到四、五万，地方武装的五万人，号称十万之众。同时，中央红军又有几次反“围剿”作战的丰富经验，拥有比过去更加充分的取得胜利的许多有利条件。只要指挥得当，战胜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是完全有把握的。

9月上旬，蒋介石“进剿”部队的四路大军已集结完毕：北路以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共二十二个师另一个旅；西路为湖南军阀何健的十四个师另一个旅；南路是广东军阀陈济棠部十四个师另两个旅；东部则是被蒋介石强令从淞沪战场调往福建的十九路军的三个

师。

首当其冲的是北路军，他们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这次“围剿”的主力。

9月25日凌晨，密集的炮声划破了赣东上空，炮弹怪叫着飞向黎川，蒋介石北路军第八纵队第五、六、五十六、九十六四个师，首先向红七军团守备的黎川发动突然袭击。

红七军团是在四次反“围剿”后成立的部队，人员新、武器差，尽管全军团指战员进行了英勇的抗击，终因敌众我寡，坚守了整整三天后，被迫撤离黎川。

捷报传到南昌，蒋介石继续给部下打气。10月1日，蒋在南昌行营召集各部队高级将领，进行战斗总动员，他声称：“各人拿出本钱来拼，否则就不是我的部下，而是我的敌人，那么各人最好早一点滚蛋，早一点去另找路子，我并不依靠你们剿匪，我自己最后还有办法剿灭共匪，我今年还只有四十七岁，至少还有二十年好干。”

十分明显，蒋介石此次定下了狠心，丢下了赌注。整个战场的敌我态势，蒋军兵力雄厚，来势凶猛。处于劣势的红军，“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实行有计划战略退却。

然而，现在同蒋介石较量的，已经不是毛泽东了，正好于此时执掌了红军全部指挥大权的李德，成了蒋介石的主要对手。这个洋军事家，与博古等人一鼻孔出气，共同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原则，

指斥这些原则是“游击主义”。在他们看来，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经正规化了，我们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对国家作战。大军一和大军作战。因此，他们要全部抛弃“游击主义”的东西，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先发制人”。

当黎川失守的消息传来，李德、博古等人极为震惊，他们堂而皇之地提出了“不让敌人踩踏一寸苏区土地”，“不打烂坛坛罐罐”的口号，命令远在福建中部的红军主力火速回师，夺回黎川。

为扫清黎川外围，红军主力奉命进击敌人的坚固阵地硝石，未能成功，又转而向敌另一个坚固阵地资溪桥发起攻势，又未克。接着奔袭价湾，再次折兵损将。就这样，红军主力“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正如后来毛泽东批评的那样，他们“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这种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给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投下了失败的阴影。

一个半月后，蒋介石得意地注视着“剿共”战事的进展，忽然驻守福建的十九路军于12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竖起了一面“联共、反蒋、抗日”的旗帜，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连连直叫：“糟了，糟了！”

的确，蒋面临的局势是够糟的。南路陈济棠虽派兵参加“围剿”，但深知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局势一变，他就将大部分兵力抽回老家，只留三个师守备于粤赣

边界的要冲之地，佯装“围剿”并且还敲了蒋一百万元竹杠；西路军何键也在为保住自己的势力打算盘，寻出路；北路军主力原是第四次“围剿”时被红军打败的中路军，虽经半年的整训，添了兵马，但官兵们“回首前尘，犹有余悸”，局势一乱，对前途更感渺茫。

这一切，怎能不使蒋介石大伤脑筋呢？他深知如不迅速解决“福建事变”，“剿共”剿不了，还会危及他的统治地位。因此，他在南昌行营与熊式辉、顾祝同、陈诚等商讨了好几天，决定以武力讨伐闽变。

蒋把嫡系部队从南京、江浙一带和北路军中抽调出来，投入讨闽战场后，密令陈诚在战略上对红军采取守势，在战术上仍然要摆出进攻的架势，以便咬住、拖住红军，然后等闽变结束后，再回过头来对付红军。

这么一个作战方案，既狠毒但同时也冒了不少风险。当时在南京、上海等几个重要城市，只有几个宪兵团守着，腹地十分空虚，如果红军“窜往皖浙苏”去端他的老窝，如果十九路军“同共军结合起来”，形势就太严重了！蒋介石睁大眼睛，窥视着红军的行动。陈诚也诚惶诚恐，就害怕红军真的会像他们所预料的那样。

就在这时，已经被剥夺了军权的毛泽东，向临时中央提出了如下建议：

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

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

毛泽东用的是“围魏救赵”之计。可惜，这一扭转战局的主张，遭到了李德、博古等人的拒绝。因为他们认为，十九路军所代表的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福建人民政府同南京蒋介石政权毫无二致，那有猫儿不吃油，那有军阀不是反革命？他们把红军与十九路军结成抗日反蒋同盟，说成是“机会主义的策略”，因此，他们主张坐山观虎斗，对双方交战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谁知这种态度，正好适应了蒋介石的战略意图，中了他的奸计，红军主力终于被敌人钳制于中央苏区之间，与敌人相持了整整五十六天。

1934年1月14日，蒋介石如释重负，立即命令北路军转入攻势，调转枪口，集中力量“进剿”红军。

4月底，敌北路军打开了中央苏区的北面门户——广昌。

紧接着，敌人分兵六路，继续采取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策略，循序渐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逼近。按照毛泽东的打法，面对几十万敌军兵分六路进攻之际，仅有四万余的红军主力理应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拣弱的打，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毛泽东认为，“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但博古、李德

等人惧怕丧失土地，他们捧着消极防御当法宝，推行“全线抵御”的军事平均主义，敌人“六路分兵”，他们也来个分兵把口。

此后，四万主力红军在六个方向上，进行着艰苦的阵地抗击战。毛泽东指责这种打法，简直是乞丐与龙王比宝，完全是不自量力的笨劣之举。

结果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的伤亡越来越大。在这严重时刻，毛泽东又建议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就这样让蒋介石占了上风。但平心而论，蒋介石胜就胜在中共的军队脱离了毛泽东的指挥，假如毛与蒋这次仍能在战场相见，胜负之数，就会是另外一个结果。但历史不能“假如”，中共的第五次反“围剿”还是失败了。

五四运动的回忆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下午七时，“国民杂志社”循例举行社会会议：参加者是原有的十多个社员，议程也只是讨论杂志的出版事务。可是到会者不约而同的谈到中国在凡尔赛和会受屈辱的情形，以及曹汝霖等，山东及其他各地人民团体奋起救国等消息，气氛异常激昂。我首先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我并且说明：这次示威运动决不可再蹈去年请愿行动的覆辙；必定要做得有声有色，获得圆满的结果，时间愈快愈好。这次示威行动的意义是向日本使馆表示中国人民的抗议：唤醒民众，一致奋起，迫使在外交上准备屈服的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作为收回山东权益和取消二十一条的张本；并打击亲日卖国首领曹汝霖等人，以伸张民族正义。我这提议立即得到全体到会者的热烈赞同，大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有的说北京学生尚无学生会的组织，发动一次共同行动甚为不易，应当乘势组织各校学生会；有的认为向曹汝霖问罪，应该是这一行动的主要目标，因为这样才能具体的表示国民的公愤。

为了实现这些意见，这次会议以爱国责无旁贷的精神立即决定：由“国民杂志社”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次日

晚上七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学校派代表或热心分子参加；讨论目前救国应采的步骤。推定易克疑同学任大会主席；其他“国民杂志社”的同人在大会中发表演说。我们商定了具体进行办法，决定向各学校同学展开沟通意见的活动。根据这个决定，措词激昂慷慨的布告于第二天清晨在北大各公告牌上出现了；同学们群起响应，爱国的热情沸腾起来了。

五月三日下午七时，第三院大礼堂中挤满了人群。北大同学一千多人几乎是全体出席，其他各校热心同学赶来参加的也有几十人。在易克疑主席宣告开会，说明宗旨之后，我即登台发言，提出我上述的主张。这是我第一次在重要的群众大会中发表演说，情绪不免有些紧张。我的萍乡土音又很重，例如“群众运动”这个重要名词的发音，就与普通话有很大的区别，不容易为人所听懂；但还是博得了同学们热烈的鼓掌。后来一些同学由于这次演说，常亲切的笑我“群众运动”这四个字的发音，“群众运动”四字，几乎成为我的浑名。继我上台演说的是有名的“大炮”许德珩，他的讲话具有甚大的鼓动力量。还有同学谢绍敏则当场咬破中指，在一块白手巾上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更激起全场的愤慨。大会于是一致决定联络各校同学，于次日正午在天安门集合，举行示威游行；各校到会的同学们也当场表示热烈赞成。

五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当北大同学在马神庙第一

院集合，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元培校长出来劝止。他沉痛的向我们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那位文诌诌的易克疑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们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其他多数同学则颇感不耐，发出“嘘！”“轰！”吵嚷和怒骂的声音。看看时间已到正午，我即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我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的将蔡校长拥走，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蜂踊的向天安门出发了。

北大的学生队伍是最后达到天安门的。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队伍都如约先行到达了：总共有三千多人。经过简单宣布游行的主旨以后，队伍即浩浩荡荡的向东交民巷进发，准备先向日本使馆示威。口号和旗帜是形形色色的，其中主要的是“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拒绝签字和约”、“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等等。那时东交民巷口军警密布，我们的示威队伍无法通过，只得派代表向若干外国使馆说明示威的意图。按预定计划转赴赵家楼曹汝霖的寓所。

学生队伍到达曹宅时，北大同学钟巍所预先约集好的十几个同学，率先翻越窗户进入曹宅，打开大门，大队同

学即一拥而入，到处寻找曹汝霖不获；适另一亲日巨头、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那里，走避不及，被同学们痛殴了一顿。曹宅的什物也成了同学们泄愤的目标，大肆捣毁，少数同学并乘势将堆积在宅院中已经捣毁了的什物，放火焚烧。我和其他几位担任指挥的同学认为目的已达，于是分头通知乱作一团的同学们，迅速整队回校。我们刚启程离开，大队军警赶到，将火势迅即扑灭了，并开始捕人，未能赶上队伍的三十二个同学被陆续逮捕。这就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一幕。

这日北大同学们游行归来已近黄昏，虽已饥疲交加，但精神仍极抖擞，纷纷议论此后的对策。我们对赵家楼一幕的表演采引以为快，但对于三十二个同学的被捕和即将到来的压迫，深感危惧；几乎都一致认为大事临头，只有一不做二不休，再无退缩的余地。我们决定五日上午十时再举行学生大会，进行组织北大学生会及北京学生联合会，并将这一运动扩展到全国去。

五日清晨，京畿警备总司令段芝贵（这个老军阀是段祺瑞的亲信，是严厉镇压学生的实际执行者）为了探听学生的虚实，派遣他的军法处长虞维铎来到北大。虞是一个旧官僚，虽然头脑顽固，但也不愿事态扩大。他来到北大，开始声势汹汹，指责学生闯了大祸，声称如再不悬崖勒马，将明令解散学校，闹事者将被处严刑。同学优锡朋挺身与之抗辩，表示学生不怕恐吓和压迫，决心再接再厉的干下去；如政府不接纳学生要求，改弦更张，全国将大

乱不已。这个官僚竟为学生们理直气壮的声势所屈改以较温和的口吻说了些希望学生不再出街闹事，安心上课，听候政府解决等语，就离校而去。

五日上午十时左右，北大学生会大在十分热烈的情绪中决定：立即成立北大学生干事会，并发起组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共同组织，要求各校一致参加；推举段锡朋、方豪为北大学生会参加这个共同组织的代表；并推举狄君武、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险剑修、鲁士毅、钟巍和我等分别担任北大学生干事会的文书、总务、讲演等各部门的工作。

当天下午又在北大举行各校学生第一次代表会议，约有二十个学校的代表参加，通过决议：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京学生联合会）。后来清华学校和其他教会学校以及女高师等女子学校也纷纷组织学生会，并先后加入学生联合会。这样，这个共同组织就名符其实的包括了北京全部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会。

这次会议还决定：学生联合会以“内除国贼，外争国权”为主旨，提出“收回青岛”，“惩办卖国贼”等具体要求；并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各界一致响应。这个代表会议后来根据学生联合会章程改名为评议会，负责决定政策方针。评议会由每校推派两位代表组成，其议事程序的符合民主旨义，以及处事的敏捷果断，确表现出它是指导爱国运动的重心；所以当时舆论誉之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最优良的“雏型国会”。

这次会议为了迅赴事机起见又决定：以北大学生干事会代行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的职权；因此，北大就成为这次运动的总枢纽。我这个素来重视平民教育提倡讲演的人，也就成为学生联合会第一任的讲演部长；所有学生联合会的讲演团，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组织民众团体、发行传单报刊等实际工作，都由我所领导的这个单位来执行，事实上此后学生会许多轰轰烈烈的活动也以这一单位为骨干。

五月四日北京所发生的这件大事，像风暴似的震动着全国；声势愈来愈烈，范围愈来愈大。各大城市的学生们纷纷起来组织学生会，发通电宣言，游行讲演，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连篇累牍的用大字标题刊载这类新闻，并发表评论；认为：是纯洁的爱国运动，是全国人民公意的表现。工商界、各种民众团体、国内外知名人士，以及海外留学生等都先后响应，支持学生主张，要求政府罢免亲日派官员，反对压迫学生的爱国运动。

五月七日，被捕的三十二个同学终于释放了。当时段祺瑞这亲日巨头并未直接执政，虽不愿轻轻放过这些学生，但究不能为所欲为。全国舆论都站在学生方面，亲日派显得孤立了，曹、陆、章三人成为众矢之的。北京政治圈子里多数官僚政客，一时为爱国心所支配，也或多或少的同情学生。这一切使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钱能训无法完全听从段祺瑞的摆布。这样，安福系、新交通系摧残学

校的计划不能顺利实现，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以平民愤。

然而拥有实力和日本支援的亲日派是不肯干休的。他们痛恨北大，集中目标攻击蔡元培校长，非迫令去职不可。蔡氏事先虽曾劝阻学生的示威行动，但事后却完全站在学生方面，抗拒各种摧残学生的压力，对于释放学生一事，奔走尤力。但他为缓和亲日派的愤怒，不愿因个人的去留使事态再行扩大；终于五月九日下告别信，悄然辞职出京。

蔡氏被逼出京一事，又进一步激起同学们的愤慨。一般同学认为蔡氏的出走是政府摧残教育的明证；如果学生不据理力争，将使亲日派气焰更加嚣张，各学校以至整个爱国运动势必受到摧残。北京学生联合会经过多方的奔走呼吁仍无结果之后，不得已乃决定于五月十九日实行罢课，力促政府接纳学生的爱国要求，挽留蔡校长，并惩办曹、陆、章等亲日分子。北京各校这一罢课举动，又获得了全国各地学生响应。

五四运动也影响了那时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平会议。五月十三日，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在和平会议上提出了有名的八条件，其要点是：中国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取消中日间的密约；惩办负责签约的亲日派；取消参战军等。这八条与当时学生爱国运动的主张是一致的，博得了国人广泛的赞词。

我所主持的讲演部，是各校积极分子荟集的场所，人

数极多，单是北大就有八百多左右同学参加，因此对于学生联合会的决策影响很大。这些参加者分别组成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分布在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镇集，进行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及张贴印制品，并进行组织民众团体。这些讲演团是当时学生活动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我们向市民、军队、警察宣讲爱国反日的道理，毫无顾忌的攻击北京政府和亲日派，造成了人心愤慨、满城风雨的形势。

我们的讲演方法也日有改进。有一次批带着一次讲演团在一个街口高举旗子，发表演说。围着听讲者约一百多人。夏天的烈日并没有减低他们听讲的热情。他们送茶水给我们；鼓掌声和发问声此起彼伏。我和同伴们都满头大汗，声音虽已嘶哑，但仍是在大声疾呼。这种爱国情绪感动了一位在场的老牧师。他等我们讲演告一段落后，约我们到他的住所去研讨讲演的技术。他指出我们的讲词不够通俗，没有从人民切身问题说起，也没有将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爱国运动联在一起，因此，我们虽卖了很大的气力，老百姓却还不能完全领悟。他具有很大的热忱，似乎要将他一生传教的演说经验一口气传授给我们。这使我们大为感动，尽力接受他的指教，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五四运动也和历次的反日运动一样，以抵制日货为一个重要的节目；这也是能够在经济上打击日本的实际行动。这次在北京发动的抵制日货运动，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商会协议一致行动。我们的讲演团对于这件工作非常积极；到

处发动“救国十人团”的组织。这个新兴的组织对抵制日货发生了可观的作用。团员们相约不买卖日货，并劝告商店不卖日货，市民不买日货，也发生了捣毁日货的事件，抵制日货是当局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北京政府受不住日本外交上的压力，更害怕因此引起民众与日本人的冲突。

于是当局积极禁止学生讲演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学生方面因尚希望政府能够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不愿过分与之决裂。当军警禁止学生讲演时，我们讲演团的工作就停顿几天，还将抵制日货的口号改为提倡国货。我们出去活动时大多背着一个上书“提倡国货”四字的布袋，以挨家挨户推销国货的姿态，来执行讲演团原来的任务。但这种较温和的活动也遭到军警的横蛮干涉。六月一日，徐世昌又颁布两个命令，一为曹、陆、章三人辩护，一为重申禁止学生罢课滋事。学生看到政府是要根本摧毁这一爱国运动，乃激起更大的悲愤。

六月二日，我所主持的讲演部职员会议通过决议：不服从禁令，恢复大张旗鼓的讲演活动。这决议立即得到评议会的认可。讲演部立即执行这个决议，发挥以身作则的精神，首先由我和十几位本部的重要职员出发，经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这一带中心区域，高举旗帜恢复讲演。我们不顾警察的制止，向听众大声疾呼，终于与警察发生冲突。我和其他六位同学于当日下午六时左右被警察逮捕，拘禁在警局的监房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铁窗风味。

我们被捕的消息，像电流似的激起了各学校学生的公愤。使大规模恢复露天讲演的决议，执行得更为热烈。六月三日晨，各校学生分队出动，布满北京城内外；讲演团的旗帜到处飘扬。“牺牲自由和身体来救国的时间到了”的声音在人群中传播着。六月四日，讲演人数更为增加。事先已有布置的军警在这两天内大捕讲演者，结果抓去了近千名的学生。因监狱不敷收容，又临时以北大第三院做禁闭学生的拘留所。这种压迫学生的手段引起了北京市民的惊慌和不满，一部分商店并闭店门，停止营业，以表示对学生的同情。各女学校的女学生也都跑到街头游行讲演起来了，城外兵营里一部分士兵也有响应学生的风声。军警当局不得不关闭城市，防止更大混乱。

北京政府“六三”大捕讲演学生之举，震动了全国。上海、天津等重要城市的学生、商人、工人首先响应，纷纷罢课、罢市、罢工。其他各地也随着有同样的表示，輿情鼎沸，举国骚然。

顛覆的当局到此时才认识到事态的严重；不得不于六月五日下令释放学生，并按纳学生要求，于六月十日明令将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三人免职。北京政府被逼让步的事实，更鼓励了同学们不愿轻易干休的心情。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号召举国继续奋斗，非做到拒绝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止。巴黎的中同留学生也同样热烈，强力阻止中国代表陆徵祥等出席和会。中国代表团和民众的压力之下，终于在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向和会表示拒绝签

字。至此，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是胜利的告一段落了。

如果我们更广泛的理解到中国多年受屈辱的经历和当时的处境，那末我们将更能认识五四运动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为欧战和日本侵略所诱发，直接受着新文化运动的滋润；在内政上表示了人民的力量，在外交上表示了中国的意志，使举世开始认识中国的民意不可轻侮。这一青年运动能够摆脱过去中国政治恶习的束缚，以崭新的姿态、近代的思想、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有效的组织方法，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中国觉醒的标志。

回忆李大钊先生

革命先烈李大钊先生是我的故交，是至熟至熟之友，通常都称呼他“守常”——这是他习惯用的别号和笔名。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和其后那些年，我每次到北京大学讲课，在上海之前和下课之后，必定去他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盘桓十分钟至二十分钟。因为彼此很熟，他忙他的事，我进门或离去，均不打招呼。他主编的《每周评论》，我顺手取阅。他有时主动地要我看什么书刊，便顺手递给我，亦不加说明。我接过翻阅后，往往亦无表示。遇有重要书刊，我就声明带回家去看，下次来时交还。总之，彼此十分随便，没有什么客气俗套。

但我们相识稍先于北京大学同事之时，彼时（一九一六年）他在北京《晨钟报》（后改名《晨报》）任职。曾记得一次他宴客于南城瑞记饭庄，我和陈仲甫（独秀）在座上初次相遇。陈当时是为东亚图书馆募股来京的。恰值蔡元培先生方接任北大校长，蔡、陈早相熟，立即邀陈入北大担任文学学长（后改称文学学院院长）。同时，我亦受印度哲学讲席之聘，而守常则是以章行严（士钊）先生之荐接任图书馆主任的——此职原由章任之，章离京南去。于是，我们便同聚于北大了。

一九二一年冬月，我走访守常于其家，告诉他我即将结婚。他笑着说，这在他已是过去二十年前的事了。因而自述生在父死之后，而母亲又在生他之后不久亦死去，所以他竟没有见到父母的面，全靠祖父母抚养长大。《光有日报》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纪念李大钊一文，说他两岁丧父，三岁丧母，全不对。另见人民出版社出的《李大钊传》一书，说他尚未生而父先死，他生后十六个月母亦故去，与我所闻于守常自述者尚差不远。祖父母自顾年老，便为他早早成婚。婚后不太久，祖父母就故去，只余他和他的赵氏夫人。赵年长于他好几岁——似是他十一二岁，而赵十八九岁。赵夫人甚贤惠，白原守在家园而促他去永平府中学求学。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科学，后又去日常留学。这些是后话，非当时所谈及。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为首的是陈独秀、李大钊两先生，一时曾有“南陈北李”之称。我记得一九二七年春，有一天去东交民巷旧俄国使馆内访看守常，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扰他，随即退出。不多日后就闻知他全家被捕的消息，原来他家大小同住一起，还有些同志亦同住，因而被拘捕时一同遭难者颇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门而幸免于难者。当时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和执政于北京之时。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张的亲信参谋长杨宇霆相熟，他将去见杨，可保守常亦

不死。其结果，直至守常死时，不知道他的家属儿女有没有受到连累；熟友如我未得尽小小之力，抱憾于衷。

当我闻悉守常被害，立即从西效赶入城内，一面看望其家属情况，一面看他装殓的情况。他家属已回到西城朝阳里旧居。我望见守常夫人卧床哀泣不起。我随即留下十元钱，退出来，改往下斜街长椿寺——据闻守常遗体停柩在此。我到达寺门时，门外一警察对我说：“你们亲友到来，我有交代，我就走了。”我点首应承，随即入内巡视。只见棺材菲薄不堪，即从寺内通电话于章宅吴弱男夫人。盖我夙知守常曾为其子女章可、章用、章因的家庭教师，宾主甚相得。弱男夫人来到时，各方面人士亦陆续而来，共议改行装殓之事。

我出寺门，路遇陈博生走来。他是福建人，与守常同主《晨钟报》笔政。其他的人今天尽记忆。

守常当年的熟友，眼前现有张申府（崧年）、于树德（永滋）和我几个人。张、于两位原与守常同为中国共产党人，但有始无终。我则根本是个党外人。今天回首思索起来，奇妙的是守常他们各位朋友全不曾介绍我入党——连半点意向亦不见。于此，虽然我这个人条件不合。守常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和领袖，终且为党捐躯，而我则根本不在党，那么尽管友好相熟，究不便冒昧地自居于交谊深挚之列了。此点应当先自己坦白的。

提起正当五四运动时代的那些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我十分惭愧没有能象守常那样勇往地和诸同学们在一起，

甚至可以说，他是居于领导而我则追随亦不力。因此，许多事就记忆不清，现在亦就说不清楚了。再则，事情过去且将六十年之久，而今脑力衰颓的我，就只能点点滴滴列举其目如次：

（一）少年中国学会组织的发起成立，守常实为骨干。此会在当年十分重要，会员包含了南北许多青年有志之士，其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有些人就是从此会分袭出来的。倾左的有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等人；倾右的有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人。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各自表现不同，而却是具有一定的分量的，虽然分量大小轻重不同。

我仿佛未曾参加此会为一成员，却曾应邀为此会的田汉和曾琦两成员之间在宗教问题上的争论作过一长篇讲演（讲词大意可见旧著《东北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二）当年守常先生的活动繁忙，有些群众大会开在前门大街，我亦曾去过。有一次在总统府门外的集会，我没有参加。类乎此者，现在记忆不清。

（三）记得守常和我两人曾致力于裁兵运动倡导。当时蒋百里（方震）先生且曾写出裁兵计划一书问世。可厌的南北军阀混战既多年不休，在洛阳的吴佩孚颇有势力，恰好守常的同学白坚武正在吴的幕府。守常因白的殷勤介绍，走访洛阳，似乎不止一次。访吴谈一谈是次要的，根本要造成舆论，发动广大社会力量才行。我们曾想联络上海、天津的工商界人士，而就近人手则在眼前的知识阶

层。正在要邀请北京八校同人聚谈，不料被胡适、陶孟和等几位抢先召集，且又转变出“好人政府主义”一场戏来。随后果然出现王宠惠、罗文干为首的政府。我们二人只有苦笑！王、罗二位即是参加了胡适那次集会者。

（四）一九一九年秋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因学生李超自杀身死开追悼会，守常和我亦偕往参加。在蔡元培、陈独秀、蒋梦麟各位讲话后，守常和我亦各有发言。后来我的发言录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内。

（五）我与守常既然相熟，有时便一同游息。今承中国革命博物馆出示一张有守常、张申府、雷国能和梁□溟四人在中央公园照的像片，推计其时间当距今五十年以上。五十多年来，既有日寇入侵，世局动乱剧烈，此照片我手无存，展视之余，不胜追怀感叹之情。